

E9404001

專案研究報告

西部大開發之藏區現代化研究 ~以西藏自治區為例

研究主持人：楊開煌教授

協同主持人：馬彥斌教授

協同主持人：李國瑜教授

本報告純為學術研究，不代表委託單位立場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

專案研究報告

西部大開發之藏區現代化研究

~以西藏自治區為例

研究主持人：楊開煌教授

協同主持人：馬彥斌教授

協同主持人：李國瑜教授

研究助理：范瓊文小姐

本報告純為學術研究，不代表委託單位立場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

目 次

摘 要.....	3
緒 言.....	5
第一章 敘述邏輯之研究方法.....	7
第一節 前言.....	7
第二節 敘述研究.....	8
第二節 敘述方法.....	11
第四節 文本敘述法.....	16
第二章 大開發之前的西藏.....	20
第一節 基本情況.....	20
第二節 歷史論述之對比.....	24
第三節 中共統治時代論述之對比.....	26
第四節 中共治藏之評述.....	30
第三章 西藏民族區政治現代化之評析.....	34
第一節 前言.....	34
第二節 白皮書之發表與內容評述.....	35
第三節 重要內容詮釋.....	40
第四節 達賴流亡組織對白皮書的攻擊.....	45
第五節 中共藏族自治區之綜合評估.....	49
第六節 小結.....	57
第四章 西藏經濟現代化歷程之評述.....	59
第一節 前言.....	59
第二節 西藏的基本情況.....	60

第三節	西部大開發前的開發構想.....	62
第四節	西藏現代化發展白皮書之敘述.....	70
第五節	西藏宗教經濟特色.....	81
第五章	西藏社會現代化之評述.....	88
第一節	前言.....	88
第二節	文本中的西藏傳統社會.....	89
第三節	達賴流亡組織的看法.....	95
第四節	現代藏族社會的變化.....	99
第五節	小結.....	111
第六章	藏區開發中中共與達賴互動.....	113
第一節	達賴特使訪問大陸之分析.....	113
第二節	達賴特使二次訪大陸之分析.....	126
第三節	達賴特使三訪大陸之分析.....	141
第七章	西部大開發與中、印關係之戰略分析.....	149
第一節	中印關係之評析.....	150
第二節	西部大開發與中共南亞戰略.....	161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175
第一節	研究發現.....	175
第二節	宗教經濟之必要性.....	177
第三節	建議事項.....	180
參考書目.....		181
附錄一:藏區旅行見聞.....		186
附錄二:訪問摘要.....		190

摘 要

中共號召西部大開發已經屆時五年，客觀而論，由於中共中央財政和政策的大幅傾斜，已確實在中國大陸的西部地區形成強大的發展趨勢，其中藏區的開發，則是在近幾年尤其顯得進步快速，然而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對中共的攻擊變化有限，特別是集中在藏人入藏、發展失衡、貧窮日懸、生態脆弱、文化凋零、宗教變調、人權淪喪等各方面，而這些攻擊，中共又紛紛以「白皮書」的方式加以反擊。本計畫以衝突「文本分析法」，再佐以觀察訪問，以第三者的觀點來檢證自治區的變化，有以下的心得，西藏的發展到目前為止，悉按現代化、國家理論的觀點來規劃。因此，不論是行為者(中共政權)或攻擊者(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其背後的標準是一致的，只是立場的不同而已，是以按此邏輯，不論是中共政權號召的「西部大開發」或是由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所嚮往的「西式現代化」，其實對西藏地區來說，都是一種破壞，是以本文提出「宗教經濟」的發展途徑作為超越現代化的標準。

「宗教經濟」是全社會經濟的一個次經濟系統，也是全社會經濟的一環，具有經濟學理所講的一切特性，不過相對而言，「宗教經濟」應具有自己的特點：即以宗教為對象的一切經濟行為，一般而言包括了傳教經濟、寺廟經濟到經營宗教三個階段，在傳教經濟時期，是屬於一般商品經濟的廣告時期，先行投入資金、人力和技術，吾人可以視為傳教成本，此時的投入是為了在當他發現和創造出宗教需求，而且由於宗教本身的特性，因此該「需求」一旦開發成功它就形成「排它性」，這是沒有其它「商品」可以替代的，於是其中的「供、需關係」就是一種相對封閉的系統，甚至是一個長時期的封閉的系統；在寺廟經濟時期，基本上就形成一種以宗教場所為中心的經濟時期，此一時期開始形成一定經濟規模，此時的宗教與信徒之間，形成複雜的、多元的經濟關係，宗教一方面提供了信徒精神和心理的需求，同時也還提供物質的需求。反之，信徒也必須付出「信教成本」和「信仰成本」，初步可以將「信教成本」定義為：信徒

為其固定的宗教場所所付出的有形和無形的一切精神和物質的成本；至於「信仰成本」則是指信徒因其信仰所產生，在其固定宗教場所以外的付出成本。綜合而言，包括了宗教活動、宗教節目和宗教觀光等圍繞宗教場所、宗教場合所產生的各種消費行為，都可以稱之為「寺廟經濟」，也因為「寺廟經濟」有了信教和信仰成本的供給，因此，也就促成了具有規模性的「宗教經濟」；到了「宗教經濟」時期，其經濟活動的範圍也大大地擴增，它不僅僅可以涵蓋上述的「寺廟經濟」，而有能力發展新的「傳教經濟」，在此一時期的活動就包括宗教學校、宗教醫院、宗教書局、宗教媒體、宗教公司等全面性的經濟活動。

我們將此一概念引入西藏地區的發展和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就有可能將西藏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從目前政府推動轉而成為藏傳佛教自身的需要，則藏教自身也必需開始研究新的教義，以便在宗教教義上，重新發現藏佛教在世俗上必要的經濟基礎，取得藏傳佛教和西藏經濟之間的互補性，結果就能使二者均得到相互辯證地發展。而西藏的經濟發展就真正找回藏胞在因應現代化時，特有的自信，又能按藏胞的自然需要與時俱進地保留自己民族的特色，實現現代化與後現代化的結合與超越。

緒 言

車子從青海、西寧經青海湖、茶卡到格爾木往南，開始進入青藏高原，這時如果你讀過清代史，車子他馳騁在無邊無際的大地上，我感受到：

《悠久》在此一神聖的土地上，藏漢民族在此寫過他們歷史，歷史中有和諧、有戰爭，有和親、有鬥爭，這是事實也是過程，沒有人能其實也無需評價他們的是非，地理的歷史太久了，久到可以讓各自的認知和評價並存，也悠久到可以讓是非辯證地發展，但是當下的人反而執著地想在他們的手中把是非決定下來，甚至為此而戰爭，豈不短視。

《寧靜》在此土地無論是路過或駐蹕，不論是留守或客居，你都可以完全體會出地理的「詩」、地質的「詩」、土地的「詩」，它的美就在於地不言、不語，它的寧靜使得它能靜靜的傾聽所有的過客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心靈、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肢體去表達他們驚嘆，他們的感動，所有的詮釋他都接受，都不反駁。

《雄偉》當你仰視這裡的山脈、這裡的藍天、這裡的顏色，它在展示所謂雄偉，垂示所謂自然的雄偉，這種雄偉不是人間的偉大，不是人所能所語說的偉大，是自然的雄偉，這樣雄偉必須是一種心靈的感動和超精神的接觸，這些山脈、藍天未曾變化，但是它是呈現出來的景緻，又是時時在變、天天不同，所以是一種以不變為基礎不斷變化的偉大，是一種構想、是一種完滿。

《壯闊》這裡的氣勢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氣勢，是一種胸襟，是一種器度，是一種令人渺小、令爭者慚愧的壯闊，更是一份無法形容的豁達，還是一份令人敬仰的寬大，容忍一切、包含一切，容忍永恆也包含剎那，永恆不增，剎那不減。

《美麗》接近它你就能感受到一股令人屏息的優雅，令人不敢直視的素樸，這種的景緻僅僅只能以真摯誠實的情感去接近它，沒有語言，只有以人、以動物般的純真去迷戀，用自己的赤子之心去描繪，則我們不但感到美麗，而且我們也因而美麗。

《繁榮》大地承載了所有的「有」和所有「空」，因此我們有了此片土地，所以萬物生焉、萬有存焉、萬空忽焉，年復一年，這裡有生命悸動的喜悅，有生活成熟的奉獻，有生存茁壯的昌隆，這種繁榮是可持續的、可發展的、可循環的、可再生的，是有序的選擇，這種繁榮就是一種現代化，一種後現代化，一種超現代的繁榮，一種實踐的繁榮，一種理論的昇華。

《和諧》這片土地是天堂與地獄的交會處，它有最美的風景，也有最致命的天氣，但它們不是完全分開的，它們不是完全隔離的，而一種互見的、一種互動的交會，一種難以置信的和諧，一種人間無法呈現的融合，它是一種動、靜的交會所，我們的動和它的靜能如此完美的妥協，動靜之間不需要談判、不需要統治，它們是互相借見的方式來和諧，它是一種人與自然的和樂，是一種前所未見互靜式的和諧，它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所有的人在這辯證的和諧、不斷的和諧中，它也是一種人和動物的和諧，來到這你自然尊敬一種生命，你會體會出相互依賴的和諧，開發和自然、文明和野蠻、東方和西方、偏見和客觀，一切差異在這裡都是互見的、互諒的、互存的、和諧的。

第一章 敘述邏輯之研究方法

第一節 前言

研究藏人地區的現代化與其他的西部地區大開發的研究並不相同，首先在中國大陸的西部的十二個省市自治區中，除青海、西藏自治區之外，大致都以漢人為主體、或是完全漢人社會的地區、或是漢化極深如廣西的壯族自治區。因此，除了局部地區如新疆的南疆以維吾爾族為主的地區之外，其現代化的過程在觀念、價值和文化上的衝突比較小，而藏族則是在中國大陸境內少數具有自己文化、文字、宗教傳統的民族，是以藏族現代化的過程中，似乎不宜用普遍化的標準來認識和討論，雖然以「現代化」一詞來觀察時已經不可避免地帶有普遍化的事後設標準，然而吾人仍應「變遷、變化」這些相對中立的尺度來敘述，而「現代化」在本文中僅指藏人社會變遷的方向來理解；其次藏族是中國境內少數的宗教民族之一，所謂「宗教民族」是指以宗教為真理的民族，這樣的民族其生活、文化、藝術、規範都是以宗教教義為依歸，討論該民族的任何事務都離不開宗教，因此，內含基督教內在價值的現代化和藏傳佛教民族之間的緊張往往就不僅是生活方式和制度層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價值和觀念層次的差異；其三是從地理的角度來看，中國大陸主要的藏族生活聚居群在青藏高原，這就是說他們是生活在海拔三千五百公尺到四千五百公尺，甚至更高的地區，這些地方的氣溫、氣壓、空氣含氧量、地形地貌和漢人生活的丘陵、平原存在巨大的差異，中共稱之為地球的「第三極」，因此在這種地方現代化建設固然可以參照其他地方的經驗進行現代化規畫，也理應不同於大陸的其他地區。

基於以上的不同，個人對藏人現代化的研究亦不採取一般學術界研究常遵循的典範，如問題意識、研究方法、理論學理，以便分析現象、尋求結論的制

式傳統，而採取直接敘事的方式來呈現。

第二節 敘述研究

所謂「敘事」就是敘述事件，按此一字義敘述就涉及兩個層次：一是觀察參與；二是利用語言、影像。前者是敘述的必要條件，觀察是走近現場、留在現場，然後從自己的角度立場，以自己以前的理解、去理解現場，所謂「立場」「角度」是指觀察者進行觀察的時間、方法和位置，不同的人、不同的時間、不同的觀察方式及不同的位置必定影響到觀察的結果，所謂「前在理解」不是將主觀合法化，而是指觀察者的基本立足點，因為任何一個人都是社會人都有自己的成長的歷程，於是「此一歷程」就自然而然成為我們去理解外在事物的立足點，從詮釋學的角度來看，此一「立足點」即是我們認識外在事物的唯一基礎，假如我們沒有此一「立足點」則我們對外在事物便完全不可能理解，當然此一「立足點」也使得觀察者在理解外在事物時，受到一定的侷限，因此也會有一定的盲點，然而這是無法克服的問題，只能「存而不論」。「參與」是指外在事物無法以觀察方式接近時，則必須以訪問、口述、筆錄、座談等方式介入事件中。所有「參與」是指研究者受時、空條件的限制，無法以在現場或在事件方式觀察時，則透過二手傳播方式來參與現場或事件方法。總之，敘述的首要條件是研究者必須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進入現場或事件之後的敘述才能有血有肉、有真實感、有臨場感，沒有一般學術論文一樣地冰冷和距離，只有少數的同行有資格成為讀者，但敘述又不同於小說和故事，因此也不是虛構的、純想像的小說，一樣可以開放讀者自行詮釋，這是敘述的必要條件。

至於後者則是敘述的充分條件，任何的敘述都必須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其中，最普遍的形式就是言語或是影像，然而絕大多數的影像還是必須輔以言語，才能真正而準確地傳達研究者的思想，而言語的表達方式就包含了二種侷

限，言語者本身的意識形態、認知侷限、時間侷限等，意識型態的侷限來自「立場」，認知侷限來自「前在解釋」，時間侷限是指介入事物或現場的時間點，是以這一部分的侷限與上述必要條件部分十分雷同。至於語言侷限包括了邏輯和限制，所謂言語邏輯的侷限是指言語本身能成為某一社會溝通的工具，主要是源自於使用者都熟悉言語的「所指」，「所指」是言語的語言邏輯，即所謂的「文法」結構，「言語」作為社會溝通的主要工具，包含了二個主要部分：一是「言語」作為符號所對應的「意義」；二是由於人類社會生活的複雜性是在表達溝通之際，不可能只是應用單一符號，而必須借用一連串的符號，這就有了符號間組合以構成複雜意義的問題，而符號以相對固定方式組合有意義溝通工具，此一固定方式即是「文法」。而「言語」邏輯的侷限即來自上述兩個方面，綜合而言，在言語的「所指」部份，由於言語作為符號，與其所指之間具有任意性、俗成性的本質，所以「所指」也具有變動性、歧異性是以敘述者在使用時，是否與事件中的使用者意義相同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特別是環境改變的情況下，言語的「所指」有可能出現不同的意義，此其一。另外，言語的「所指」常常有詞窮的感覺，以至於吾人無法完整而細緻地表示出我們對「現場」「事件」的全部看法，在此情況下，上述的歧異性和變動性所形成的問題可能更加嚴重。一旦抽離原來的時空情境，語詞所提供的信息可能完全不同，此其二。至於言語的邏輯所遭遇的侷限性，則會發生在不同言語之間邏輯的差異性以及言語的邏輯與事件的邏輯的差異性，前者的困難有時可以透過不同言語翻譯呈現其相似性和理解性，但是不同言語邏輯所引導出的思維的邏輯，則很難共享其真正體會，當然任何一個民族思維邏輯不僅僅來自言語，也來自其文化和環境，而言語總是其思惟邏輯表現的主要和最有效的方式，例如有些言語十分重視詞彙的陰性、陽性，時態、名詞、動詞的差別，有些言語則不太重視上述的差異，是以在理解上就十分不容易，特別是當我們去言語翻譯兩個民族的思想或是意識形態的事件時，就更加不易，當然人們對此有時以「音譯」來取代「意譯」，使用「音譯」就必須和複雜的解說相連，這就必然產生更多

的問題;後者的差異性是存在在「言語 V.S 事件」的公式中，必然遭遇的困難，由於言語的邏輯是單一的、固定的、持續的，而事件的邏輯往往是複雜的、變動的和偶發的，而我們在敘述中就不得不以言語的邏輯去規範事件的邏輯，因為如果不是如此則我們便無法敘述，言語邏輯對事件的敘述既是一種便利也是一種限制，面對此種兩難的困境，我們並沒有真正的解決之道。但是影像的加入多元化的敘述方式是可以發生若干彌補的作用，但無論如何敘述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企圖以符號、言語來重現事件，當我們釐清兩者之間必然的落差，我們便可以嘗試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來重現事件、理解事件，則可以避免上一部份所提及的立場角度，去理解所導正的必然主觀和偏見。

從以上對敘述的論述，我們有可能將敘述和記錄混為一談，誠然敘述和記錄者有其共通性，例如本文上述的侷限，則是對敘述和紀錄二種言語式的表述的共通的困境，但是敘述畢竟不是記錄，否則我們也就無需另外創新名詞，我們以為敘述和記錄存在著顯著的差異:第一記錄是研究的素材而敘述是研究的成果，通常訪談記錄、觀察的記錄，只能是研究者所蒐集的第一手資料，所以是研究的素材，而敘述是事件的重現是經過研究的立場和角度所呈現出的事件，所以是研究成果，而非素材;第二記錄是相對客觀的事件樣態，而敘述則是相對主觀的事件再現，記錄之所以是素材，是因為它是在事件現場或當下立即以言語「忠實」的錄製，在此情況下，研究者的立場和前在理解，只在認知層次上提供功能以便於「錄實」，所以在過程中，客觀狀態是起主要作用的因素，研究者在不定變化、複雜多元的事件之前，只能以儘可能快的速度加以複製，而敘述是必須重組複製的方式，有意識地篩選可用和不可用的記錄，加以編排，研究者在敘述時，不在「呈現」而在「再現」，記錄是以客為尊，而敘述是以主觀再現;第三記錄是現場的白描，而敘述則是記憶和客觀的事後對話，記錄作為現場對話是研究者與事件的平等對話的現場，而敘述的對話是由研究者所主宰的對話是不平等的對話，因此記錄的呈現可以是多元的、非系統的、雜繁的是有助研究者回憶的提示，記錄的呈現雖然是主客對話的產物，但是在運用和

閱讀則是十分封閉，只能是研究個人文本。反之，敘述是主觀的產物，然而一旦完成，則是提供給所有人的作品，是對所有人開放的作品，由此可見敘述和記錄不論是製作過程或是成品的功能、效果都存在巨大的差別，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第三節 敘述方法

一般而言，敘述方法的使用在故事、電影、口述歷史，但是各種敘述方式與學術成果的表現是否互通呢？

以小說的敘述而言，「敘述，就是把人物的經歷、言行和事物發展變化的過程表達出來。這是一種最常用的表達方法。敘述包括人物、事件、時間、地點和為甚麼（原因與結果）五個要素。這決定了敘述的作用：刻劃人物形象（敘述人物的外形容貌和經歷言行）；交待故事情節（敘述事件的時間、背景及發展過程）；聯貫文章線索（敘述交待，貫串事件與事件、場面與場面之間的聯繫）；提供事實論據（敘述具體實例，用以證明論點）。敘述的方式多種多樣。常見的如順敘、倒敘、插敘、補敘、散敘、分敘、環敘與交敘¹。」小說或故事性在研究工作中，一般而言是無法完全照搬，因為小說或故事的不完全真實性和虛擬性，其與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真實性和客觀性等是相互背離，是以長期以來學術研究和小說或故事敘述就不可能進行對話，但是小說或故事性敘述，其結果的吸引性、趣味性和啟示性，則並不遜於學術研究差，甚至是更具有創意，也更具創見。假如學術研究的目的之一也在於創意的展現和創見的提出，則小說與故事的敘述就有學術研究可以借鑑的地方。從吸引性的角度來看，小說或故事的吸引性在於它的創見，因為創見能勾起好奇，動了好奇之念，就會

¹ 〈怎麼寫小說？——三個基本架構：敘述（一）〉，本文參考江曉華編《寫作方法十講》；
資料來源：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eworks_learning/030814-002/index.phtml?print=1

希望尋得答案，是以小說或故事不論在題目、內容都考驗作者的創意，而學術研究更同樣需要創見，如果一項學術研究不能引起人們的好奇，則是否具有研究的價值，能否獲得研究的經費，就是很大的困擾，同樣的研究方向，不同的創見代表了研究者的睿見和調察力，其得到的結果必然大不相同，「創見」是學術研究的重要生命和價值的所在。

從趣味性的角度來看，小說或故事的內容鋪陳，敘述的手法就是作者創意的表現，創意使人們看到相同事件的不同和價值所在，不同的可能在小說和故事的敘述中，創意的重要性甚至超過創見，因為人們的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受到同一時代「典範」的制約，創見的突顯並不容易而創意則是作品存在的必要條件，否則此一小說或故事就不會為大眾所接受，對學術的研究而言，也是同樣的意義，真正推動學術變化的研究並不常見。然而，同樣的研究課題不同的創意的包裝和角度就可以獲得不同的社會效應。總之，創意是學術研究的重要目標，當然小說與故事尚有提供歡娛方面的趣味性，在這一部份對學術敘述而言，就是一種可望而難及的層次，如果能做得到則是錦上添花，不然也是心嚮往之。

從啟示性的角度來看，小說或故事的社會效果和功能，常常就決定在他們的啟示性，透過他人的經驗敘述提供讀者另一種生命參照，這就是啟示，啟示如同生命之燈，有可能突然察覺或是醒悟某些事物，因而對我們的理解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至於學術研究就其效果而言，不論是引起爭辯、或是引起反駁，都可以說已經有了初步的啟示。反之，如果學術研究，完全沒有引起反應，則是學術研究最為難堪的結局。

其實，如果我們在深入分析，我們也可以發現縱使是小說、故事中的虛構在學術界其實也常常借用的解答問題的方法，以幾何學為例，在證明某些理論時，研究者常常使用「補助線」來協助證明某些理論和事實，而「補助線」是虛的、不存在的，但在解答幾何問題時常常表現為必要的「虛」，一旦缺少這種虛構的勇氣，則不但問題不能解答，甚至連科學也很難成立；其次小說或故事

中的虛擬常常表現為混同在真實和虛構之間，相互建構出來的情節，其實類似的方式在社會科學的典範中也是隨手可得，其中以韋伯(Max Weber)的理念型(Ideal Type)最為著名，理念型的官僚制度就是界乎理想和現實之間所建構出來的評價現實政治的標準方法，政治學中很多烏托邦(Utopia)的理想制度，其推論過程中演繹的論述也都以虛擬和現實的對立和互補為基礎，才有可能得到確切的結論。綜合以上的分析，因此我們就對目前的學術典範提出新的問題，學術敘述是否也可以類似小說、故事的方式來達成學術預期的效果，相信此一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其實在學術界類似成品也很不少，最早在人類學、民族誌中，其後在政治學，特別是基層的政治行為討論和描述作品中，如「金翼」「林村的故事」「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及「選舉事件與村莊政治」等都是學術敘述的成功作品²。總而言之，學術研究必須在研究的過程和研究成果的表現上提出若干超越典範的嘗試，才有可能展現不同與其他同行的成果。

至於「口述歷史」則是在史學界早就十分流行的一種敘述方式，它先是一種收集史料的方法，而早期的口述歷史多半以精英為對象，在此一時期，口述歷史和記錄並沒有差別，是一種被研究被運用的素材而已，直到史學界對歷史的真實性問題不再集中極少數的精英，而注意到歷史的新主體「社會大眾」，這時人們打開了歷史另一扇門，史學家便提出了「口述研究的主要意義並不在於它是什麼真實的歷史或作為社會團體政治意圖的表達手段，而在於證明人們的歷史意識是怎樣形成的。因為人們的歷史意識決定著當時作用於個人生活的

² “講故事”似乎是一種簡單的寫作方式，但是，講好一個故事並不容易；尤其是一部學術著作，並非為講故事而講故事，它講故事的目的是為要展現作者的分析意圖、建構一種理論。優秀的學術著作，不僅在於它本身的理論創見，同時也離不開它的寫作藝術，即如何生動、淺顯而不乏深刻地表達這個理論創見，讓讀者也可以去分享作者“發現”理論的愉悅。早期的如林耀華先生的經典之作《金翼》，就是這樣一部故事講得好的優秀學術著作；隨後一代，有黃樹民先生的知名著作《林村的故事》，以及當代年輕學者應星的出色著作《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等等，都是這樣一些優秀的學術作品。學習時報/民主法制 黨的建設/其他 吳理財，〈在“故事”中呈現理論〉，學習時報第 242 期。

資料來源: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xsb/602340.htm>

更深刻的結構和過程。」大陸學者也認為「儘管這一主體性範疇有礙于史學家客觀地再現往事，但它有助於史學家揭示那些被認為是自然的、靜止的，而實際卻是文化的、運動著的現象³。歷史研究只有弄清楚這一深層結構，才能使歷史學真正成為一門科學。當代西方口述史學家的口述研究實踐證明：口述史學方法確實能夠在揭示深層結構方面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對此，美國口述史學家威廉姆斯(T. Harry Williams)體會得最早。早在 60 年代初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休伊·朗》一書後就深有感觸地說：「我越來越相信口述史的價值，它不僅是一種編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還可以為研究過去提供一個不同尋常的視角，即它可以使人們從內心深處審視過去⁴。」上一世紀「70 年代以後，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從簡單地確定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態，深入到探討歷史過程的參與者本身的歷史意識，特別是把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勞動群眾的願望、情感和心態等精神交往活動當作口述歷史研究的主題，這一研究視角的變化，無論是在史學本體論上，還是在史學認識論方面，都對歷史學的發展和史學觀念的進步做出了一定的貢獻。第一，它給了普通人一個機會，把歷史恢復成普通人的歷史。這樣，不僅可以糾正各種史料中遺留下來的統治階級上層人物的偏見，使歷史學更加全面地反映人類社會的歷史；而且可以增強普通人的主體意識，從而有助於歷史學的教育和啟發功能的實現。第二，西方當代口述史學家們把口述研究的目的從往事的簡單再現深入到大眾歷史意識的重建，把關注的焦點從「真實的過去」轉移到「記住的過去」，不僅增加了歷史認識的深度，而且擴大了歷史認識的廣度。另一方面，研究大眾歷史意識的形成過程，可以使人們認識到「過去」、「現在」和「未來」三者之間並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種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歷史關係。因為人們在口述回憶中所陳述的歷

³ 帕塞裏尼，《大眾記憶中的法西斯主義：都靈工人階級的文化經歷》(Luisa Passerlin, *Fascism in Popular Memory: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Turin Working Class*)，劍橋大學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 頁。

⁴ 《從往事的簡單再現到大眾歷史意識的重建——西方口述史學方法述評》，龐玉潔，中國經濟史論壇，2003 年 12 月 24 日。資料來源：
<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ReadNews.asp?NewsID=2224&BigClassID=27&SmallClassID=64&SpecialID=112>

史事件似乎只是「往事的再現」，但是口述者所流露出的情感或願望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人們的情緒，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反映人們對現實社會所持的態度以及對未來社會的夢想。另一方面，研究大眾歷史意識的形成過程，可以打破個性與共性之間靜止不動的對立關係。由於生活在同一社會環境中的人們的物質生產實踐活動，甚至精神交往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相似之處，因而口述者在口述回憶中所暴露出來的個性並不是絕對的個性，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口述者所生存的那個社會階層乃至整個階級中人們所共有的性格⁵。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研究者完全可以將口述歷史的定位和後設思考轉而成為口述社會和口述當代的政治來服務，首先當我們在做當代狀況的研究是以往我們多半依賴文件、文獻為探尋的基礎，此一研究的典範顯然是受到科學歷史學者蘭克(Leopold Von Ranke)「沒有文獻便沒有史學」的影響，事實上口述資料反而在真正了解事件上比文獻更加有用，同理在研究社會、政治以觀察現場的階段所採的口述記錄，其重要性也不能忽視；其次在口述政治和口述社會同樣可以藉由一般民眾的口述理解當代的政治意識和社會意識，而不是只有官方的意識和少數精英的意識；其三記憶歷史這就是對客觀歷史主觀呈現合法性的承認，而且此種承認是開放性的承認，因為記憶歷史是有別於真實歷史，則記憶歷史相對於真實歷史必然是部份真實，因此每一個紀錄都有部分的真實是以沒有人能獨佔全部的真實，因此官方的歷史、口述的歷史和精英的歷史都是平等的，這樣記憶歷史便提供了我們各種的可能。

綜合以上相關的討論，我們以為小說或故事的敘述以及口述歷史的敘述對文本而言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但並不能直接使用在本研究之中：

第一、「留在現場」的時間不足，從小說、故事或口述歷史的敘述的首要條件是「留在現場」，必須有足夠的時間，才能對人物、事件的始末、關係、結果、影響有所理解，這才有可能以自己的邏輯加以敘述，這才能呈現小說或

⁵ 同註 2

故事的期待，至於口述歷史則需要的時間可能更長，特別是從藏人地區現代化的口述歷史。

第二、存在著語言的障礙，則比時間的因素就更加重要，敘述的是離不開語言，如果我們作口述資料，或是「留在現場」的觀察和紀錄，對當地語言的理解自然是一種必要條件，沒有語言的理解，只能依賴翻譯，則在資料的真實性上就可能有問題，而且大大地增加時間成本。

第三、民族、宗教、文化的差異，從小說、故事和口述歷史的敘述，其背後的文化基礎十分重要，文化的差異很容易使得研究者在敘述中出現過度主觀，過度詮釋，而過度主觀和過度詮釋是正是敘述方式不易為主流學術圈接受的重要理由，因為過度的主觀必然傷害了客觀反映事件的平等權，過度詮釋則傷及記憶歷史的正確性，特別是以漢族去詮釋藏族的記憶歷史，其結果很可能是治絲益芬，是以吾人有必要在上述小說故事與口述歷史的基礎上提出本文以及地區研究可以運用的敘述法。

第四節 文本敘述法

一般的研究均不可避免提及文本分析，或是觀察法，從「敘述」的角度來看，「文本分析」只能表現為文本與我(研究者)的對話，從文本進行分析時，文本是研究對象，研究者為主體，研究者與文本之間其正常的邏輯關係位置是文本是告知者而研究者為被告知者，然而實際的關係位置往往是研究者是提問人而文本只是回答者，研究者作為文本的提問者兼閱讀者，其結果使得研究者面對文本時擁有太大的權威，因此可以對文件作出主觀的、需要的解釋，而文本本身則沒有反擊和拒絕的權利，是以文本分析不論是以何種方法:如內容分析法、紮根理論、詮釋學的分析都一種單向性的分析，是以文本分析法在研究的過程中，為了避免研究者對「文本」的過度牽制，是以多元文本的分析和實地

觀察、訪問等方法，在文本分析中是更必要的補救，多元化、多樣化的文本目的在糾正自己理解和解釋時，不自覺地過度詮釋，而觀察、訪問等進入現場的方法，從敘述的角度來看，這就形成了文本、觀察和研究者三者之間的新關係，觀察法的加入使得文本的答案多了「參照系」，因此任意性詮釋的空間自然受到局限，因為進入「現場」中觀察與訪問的方法，可以從具體、局部的答案與文本的整體，全面進行對話，從而獲得局部的和具象的相對的詮釋權，而研究者必然是與文本和觀察同時對話，由於現場的回應性大於文本，因此研究者作為主導者的優勢自然消失，當研究者失去主宰式的優勢者，研究的成果必然趨於客觀。然而在事實上，觀察現場在研究過程中不是永遠存在，也不是隨傳隨到的，常常在研究過程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因此真正的情況則是文本、記錄和研究者，在此種情況下，也可能使文本處於更不利的位置，或是形成三者相互證成、相互滿足，因為只要研究者有心導引，則相互佐證的情況並不難現，這種方法在一般研究對象上的問題並不突出，然而放在文本「藏人社會現代化」的研究中，則可能十分突出，甚至是十分嚴重的問題，例如我們在討論許多西藏議題的著作中，很容易分析出作者的政治傾向，而這些作者也不乏是曾經進入西藏作過觀察或訪問的作者，但是贊成中共政權立場者或是贊成達賴喇嘛的研究者在進入西藏地區的觀察就很容易流於只是自己的原有的立場尋找證據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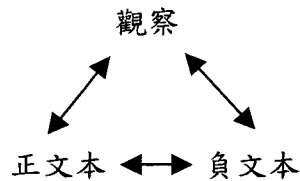
有鑑於此，本文的文本敘述法認為在西藏議題的研究上採用文本、觀察、研究者三者關係的互動模式仍有不足之處，因而提出正文本、負文本、現場觀察和研究者之間二組的三者互動相互檢證的模式，他們可以圖示如下：

(1)正文本→現場參與→研究者

(2)負文本→現場參與→研究者的互動模式，此一研究方法互動的方式和過程上是相同的，主要特徵是將文本的分類：首先我們將文本區分為中共當局的文本和達賴喇嘛的文本，而將兩種文本都帶到現場加以檢證，以便使文本內容與研究者觀察受到雙重的檢證，一為觀察，一為反對者的文本，此一作法是有利

於研究者相對地退居觀察的位置以便整理出有信度、有效度的文本，之後再進而引導兩種文本的相互對話、詰問，則可以擴大文件的誠信。

(3)是以本文研究的另一個步驟則是：



當然運用此一研究方法，並不是所有的地區研究是可以引用的。從比較研究的角度來看，此一立場相異的文本，在面對事件上具有一致性或是相似性的目標，才能相互對話，因為在目標相似的情境之下，才有可能使研究者本身容易尋找到相對中立的位置，對不同的文本加以比較，如果目標不同則很難以相同的標準加以檢證，除了目標一致性的條件之外，它還必須是面對的地區或事件，正好在每個問題均有相對的文本，而且有兩組立場相異的正式文件可以形成相互檢證的模式，才算是形式要件的完備，而在西藏議題的兩組相對者是中共政權和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而言，雖然從政治目標而言，中共的目標化解藏人對北京政府的反抗，而達賴喇嘛希望西藏獨立，但是從一個更基礎的目標、更原始的初衷來看，追求「西藏的現代化」應該是中共政權和達賴喇嘛集團共有的目標，在文本方面，中共政權自九十年以來在西藏問題上發表過六篇「白皮書」，其內容包括了政治、經濟、環境生態、文化宗教以及人權狀況五大類，因此而上述的方法就可以適當地加以使用，同時本人在公元 2000 年和 2004 年分別二次進入西藏現場，前後停留近一個月左右，時間雖然十分有限，但是前後二次的觀察可能十分明顯地感覺四年的變化和差異，是以作為觀察者來研究，已經積累了一些的資料和背景，從各方的條件來看，本文可以大膽嘗試以文本敘述的方式來進行，因此所謂的文本敘述方法，就是以不同的文本和分別與現場進行對話的方式來呈現出事件的研究方法，最終我們可以利用立場不同的文本對話來探索兩種文本所代表的文本制作者其內在的真正想法為何，是以本文研究成果的邏輯是每章之間並沒有邏輯的必然性，但每一章皆為整體的不

可缺少的部份，特別是每一章的論述在構成結論章的推論時，則是本文整體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份，其次在每一章內部的形成敘述邏輯的方式是先討論和重組中共的說法、想法以及成效、成績，再將達賴喇嘛流亡組織對中共的「成績」的抨擊和反駁，並演繹地建構出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邏輯。之後就可以進行正、負文本對話和觀察的檢證，最後在結論中去浮現中共和達賴喇嘛雙方的真正差異為何，並以此結論去討論藏人現代化的應然走向。

第二章 大開發之前的西藏

第一節 基本情況

西藏原名吐蕃，清代之後改名西藏，自古與漢人關係十分密切，時戰時和，中央政府為安撫西南邊陲，大都以撫為主，以剿為輔，所以藏、漢兩族的歷史也十分複雜，各有一套說法，但中共自 1950 年之後，則是明確了中共與地方關係，而且將西藏的行政區域作了調整，並成立西藏自治區，以民族政策加以統治，即今之西藏自治區。

西藏位於大陸西南和西北地區的結合部，位於青藏高原的主體部分，是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區，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極」之稱。西藏東西長約 1900 公里，南北寬約 1000 公里。西起東經 78°27′，東西橫跨經度為 26°41′；南起北緯 26°52′，北至北緯 36°53′，南北橫越緯度 10°48′。全區總面積為 120 多萬平方公里，約占大陸陸地總面積的 1/8，僅次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為中共第二大省區。西藏北界崑崙山、唐古拉山，與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和青海省毗鄰；東隔金沙江與四川省相望，東南與雲南省山水相連；南界喜馬拉雅山脈與尼泊爾、錫金、不丹、印度、緬甸等國接壤，西部與喀什米爾地區相鄰，國境線長達 3842 公里。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使廣闊的西北和西南內地大大增加了安全感，因而有可能節約國防開支，而且將來有可能成為中國與南亞各國聯繫的通道⁶。

西藏自治區總面積 122 萬平方公里，約占中國總面積的八分之一，相當於英國、法國、德國、荷蘭和盧森堡 5 國面積的總和。2000 年西藏自治區人口總數 262 萬，其中藏族人口 241 萬，占總人口的 92.2%；漢族人口 15.5 萬，占總

⁶ 杜平、石培華等編，〈西土取金—西部大開發的政策背景與機遇〉，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0，頁 351-352。

人口的 5.9%；其他少數民族人口 5 萬，占總人口的 1.9%。西藏是中國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區，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約 2.15 人。西藏自治區具有獨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觀，雪嶺橫空，雪峰林立，大河奔湧，藍湖靜謐，有從寒帶、溫帶、亞熱帶到熱帶的種類繁多的動植物和奇花異草、珍禽異獸，有「一山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垂直自然生態分佈，有列入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名錄的布達拉宮、大昭寺，有紮什倫布寺、古格王國遺址、藏王墓、薩迦寺、哲蚌寺等一大批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有純樸的民風和獨特的習俗。壯美的雪域風光，危聳的皚皚雪峰，恢弘的自然造化，曠寥的高原牧場，迷人的湖光山色，眾多的名剎古跡，獨特的民族風情，多彩的民族文​​化，令海內眾多遊客心醉神迷⁷。

全區耕地面積 22.4 萬公頃，其中有效灌溉面積 11.3 萬公頃，有 4 萬多公頃荒地可供開發。農作物主要有青稞、小麥、蠶豆、油菜以及較多品種的蔬菜。由於日照時間長、溫差大等特殊氣候條件，西藏農作物產量高、質量好，絕大部分為高山雪水灌溉，無污染，是「綠色食品」的理想開發地⁸。

西藏在水資源、礦材、藏藥和森林四個方面的優勢。西藏水資源極為豐富。西藏境內冰川眾多，河湖密佈，主要河流有雅魯藏布江、怒江、金沙江、尼洋河、拉薩河、獅泉河、象泉河等，天然水能理論蘊藏量達 2 億多千瓦；著名的湖泊有納木錯、羊卓雍湖、班公錯等，湖內魚類儲量很大。西藏還有眾多的礦泉，礦泉水質好，微量元素豐富，無任何污染。

除水外，西藏還應是中國西部重要的能源供應基地。西藏境內已發現的礦種有鉻、鐵、錳、金、銀、銅、鎋、鋰等金屬礦，以及煤、鹽、砷、石油等非金屬礦。目前共發現各種礦產 100 多種，探明儲量的有 36 種；探明儲量的礦床 136 個，有 17 種礦產儲量居中國前 9 位。據初步估計，西藏礦產資源的潛在價值達 6500 多億元。

⁷ 〈西藏自治區最新情況介紹〉，資料來源：<http://www.chinaconsulatesf.org/chn/zhuanti/xz/t56275.htm>

⁸ 中央文獻編輯組編，〈進軍西部—高層領導談西部大開發〉，十五年以來重大問題幹部文獻第二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 181-182。

西藏獨有的高原生物資源也是該地區特有的一筆寶貴的財富。拉薩附近試種藏紅花已獲得成功，以藥用植物為主開發生產的各種藏藥目前已經在大陸內外市場打開了一定的銷路。

另外，西藏還有較大面積的原始森林和天然牧場，森林活立木蓄積量達 20 億立方米，僅次於大小興安嶺；草場面積 12.4 億畝，其中可利用草場 8 億畝。中共統治西藏以後，一開始採取懷柔的改造政策，然而隨之中共改造的步伐愈來愈急，中共與西藏當時的地方統治集團的矛盾也越來越顯著，終於在 1959 年 3 月爆發了雙方的武裝衝突，而造成達賴喇嘛與其統治集團的逃亡，此次中共對西藏就恃無忌憚地實行民主改造到社會主義改造，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代，更對西藏的宗教、文化進行了史無前例的破壞和慘毀，1976 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宣佈結束，1979 年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1980 年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會議，決定在西藏採取一系列放寬農牧業的政策，從農牧生產公有化制度改革為生產承包責任制，免去農、牧、工業、商業稅收。還鼓勵發展以西藏語言為主的文化，80% 的中共駐藏工作人員撤離西藏等。1984 年 3 月，中央召開的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四川、廣東、山東、福建等 9 省市和水電部、農牧漁業部、國家建材總局等有關部門，幫助西藏建設 43 個當時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項目，共投資 4.8 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補助投資 1.78 億元，國家有關部委投資 0.62 億元。1994 年 7 月，中央召開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由國家有關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幫助西藏建設 62 個專案，以此來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 30 周年。各專案工程累計總投資達 48.6 億元，比原定投資增加 1 倍多，其中，國家和各省市區、國家部委、金融機構投入 46.8 億元⁹。

但是對上述中共的「恩惠」，流亡在印度的達賴喇嘛流亡組織，則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在 1956~1979 年的改革與集體化運動時，所有的人民都分

⁹ 同註 2

屬於某個人民公社，在農奴衣食統一政策的名義下讓人民同吃同住，並驅趕人民進行繁重的勞役，人民平均每天要勞動 15 個小時（從早晨 5 時至晚上九時），有時甚至比這個還要多。晚上都要參加政治學習，由公社和生產隊幹部進行監控。勞動者生產力每年平均要達到 3500 個工分，一個工分只值 8 分錢（人民幣，100 分等於 1 元人民幣）。所以，公社社員每年的收入不過 288 元人民幣（35 美元）。而在當時，即使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也需要 347 元人民幣（42 美元）。當時中共政府儘管為了發展西藏農牧生產撥了適當的款項，到地方時國營企業和部門的資金管理不擅和中共官員及工作人員貪汙腐敗猖獗，導致西藏的生產建設沒有得到好的成果。中共中央於 1984 年召開的第二次西藏工作會議上，為了西藏的建設和發展，提出了新的經濟改革政策，即西藏對外開放，支持國營企業和事業單位，鼓勵中國經濟發達省份和個人投資西藏高原。由於旅遊業是西藏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因此，西藏工作會議制定了以旅遊業為主的 43 項基礎建設項目。這些建設項目全部分配給中國各省、市企事業單位去承建，所以，現在在『西藏自治區』中國移民的人數巨增。僅 1984 年 5 月，就有來自中國 20 多個省市的六萬多名個體商人和所謂的技術人員為 43 個建設項目而來到西藏。1983 年有五萬名中國工作人員和工人移居西藏。1994 年 7 月 20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議，會議決定無情地鎮壓一切分裂活動；消除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影響；為了使藏傳佛教順應共產主義而對宗教進行改革；採取必要的措施以改變新一代西藏人的思想意識；西藏擴大對中國各地的開放，鼓勵和支持內地商人、投資者、經營團體和個人定居西藏。為了貫徹實施以上新政策，中國政府公佈了由中國各省、市在『西藏自治區』進行投資的 62 個建設項目。在 62 個建設項目中也只有 9 個項目涉及學校教育和衛生發展等，其他的都只注重經濟基礎的建設，其中僅拉薩一地就佔 20 個建設項目，其他也都在日喀則、昌都、江孜、林芝、芒康等城市或城鎮，而絕大部分藏人居住的農村地區沒有任何建設項目。如此區別對待的所謂發展與建設的後果立即呈現出來，那就是多為中國人居住的大中城市與絕大多數西藏人居住

的農牧區之間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¹⁰。

第二節 歷史論述之對比

	西藏地方史 ¹¹	西藏簡史 ¹²
唐 藏 關 係	<p>藏漢雙方透過王室間聯姻、會盟，形成政治上親誼關係。</p> <p>至今在拉薩大昭寺前建有會盟碑。</p> <p>經濟、文化上密切聯繫。</p>	<p>松贊干布時期，藏中關係良好，派留學生赴長安。</p> <p>其後西藏攻占西域，唐多次出兵，均歸失敗。</p> <p>自 823 年雙方和談，立碑於拉薩、長安及格革七日，之後雙方仍戰爭不斷。</p>
元 藏 關 係	<p>蒙古皇子闊端涼州與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議定西藏歸順的條件。</p> <p>元朝設置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區軍政事務。西藏地區成立「宣慰使司都元帥府」。</p> <p>元朝對西藏進行人口調查。</p> <p>元朝在藏駐軍，拉薩、北京之間設有驛站。</p>	<p>蒙古軍進軍西藏。</p> <p>西藏薩迦班智達為蒙古皇帝窩闊台之子闊端宣講佛法，雙邊為「施捨關係」。</p> <p>忽必烈尊八思巴為上師，西藏三區由八思巴作主，實施自治。</p> <p>西藏停止了向蒙古交納「達諾」〈財物〉改向薩迦政權納貢服役。</p>

¹⁰ 〈從民主改革到與中國經濟一體化的過程〉，

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books/duizang/dui3.html>

¹¹ 中共自 1992 年起針對西藏問題不斷提出白皮書，來說明中共治藏的成績，同時反擊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的文宣，分別為《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1992.09〉；《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進展》白皮書〈1998.02〉；《西藏文化的發展》白皮書〈2000.06〉；《西藏的現代化發展》白皮書〈2001.11〉。

¹² 西藏簡史是達賴喇嘛流亡組織<http://www.xizang-zhiye.org> 〈西藏之頁〉網站上所公布的以他們的立場所論述的西藏簡史。

<p>明 藏 關 係</p>	<p>明朝在今西藏中、東、西設立「烏思藏行都指揮使司」、「朵甘行都指揮使司」、「俄力思軍民元帥府」。</p> <p>西藏各地「法王」、「王」、「灌頂國師」繼承必須經皇帝批准，每年元旦必須遣使來賀。</p>	<p>明初在藏封官多半為松秋堅贊掃地出門。</p> <p>西藏僧侶為貪圖回賜而進貢，是真假難分的法王、國師。</p>
<p>清 藏 關 係</p>	<p>清朝皇帝於 1653、1713 年分別冊封五世達賴和五世班禪。</p> <p>1727 年設駐藏大臣，正式釐定西藏與四川、青海、雲南的界線。</p> <p>1793 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廿九條，明確規定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係。</p>	<p>十三輩達賴在覲見清帝時拒絕跪拜，後僅以單腳跪拜，勉強赴會¹³。</p> <p>上世紀初滿清政府與西藏發生衝突，1913 西藏政府宣布「獨立」¹⁴。</p> <p>1912 年滿清政府被推翻，十三世達賴喇嘛即宣布獨立¹⁵。</p>

¹³ 在此達賴雖作此敘述，然據 博迪蘇，《朔漠紀程》，列《清末蒙古史地資料匯萃》，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出版，1990.01，頁 502「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奉派至外蒙古，阻止十三世達賴入俄」、「二十六日晴，午後往見達賴，達賴遣徒眾執幡幢、鳴鼓樂來迎。入該寺後，達賴跪接聖旨，遞黃哈達二分，恭請聖安，當即頒發皇太后皇上所賞物件。達賴行三跪九叩禮，恭謝天恩。」又據 李廷玉，《游蒙日記》，列《清末蒙古史地資料匯萃》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出版，1990.01，頁 663「二十六日十二點，欽使等往晤達賴，宣讀聖旨，並齋御賜觀音像一軸〈皇太后所繪〉、菩提念珠一掛、心經一部〈皇上御筆〉、黃錦緞四疋，達賴跪請聖安，並行三跪九叩禮，謝恩賞各件畢，各欽使進私送禮物。」由此二人所述，應該說十三世達賴對清廷的欽使宣諭，都是以地方官員的禮節，行跪叩大禮，迎接聖旨，因此事實是否真如達賴所言，不無可疑。〈以上資料係蒙藏委員會劉學銚教授提供〉

¹⁴ 然如果以國土疆界、民族意識等國家建構的要件來看，則在 1895 年〈光緒二十一年〉十三世達賴在其早年親政文告中，就做了以下的宣示：

- (1) 藏土自治：主張西藏地區的範圍是南以喜馬拉雅山山脈英印勢力為界，北以崑崙山脈和新疆為界，西迄拉達克和喀什米爾為界，東以打箭鑪和四川省傳統界線為其界，並且維持境內的福祉。
- (2) 藏族自決：達賴對西藏民族的優越性特別加以強調，並企圖提高西藏民族之自尊心，不致遭到外來勢力的控制。
- (3) 維護藏族文化：達賴企圖維護西藏地區的文化，再肯定其地位和價值，並予發揚。
- (4) 弘揚佛法：讓西藏地區的佛法，尤其是給鹿派，弘揚於西藏地區及其地區以外。
- (5) 端王藏俗：達賴冀藉新政的推行，來改善西藏人的道德觀念，端正民風，從根做起，以達到革新藏俗，適應新世界之目的。〈轉引自：陳又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新政之研究〉，政大碩士論文，民 70 年 6 月，頁 90-91〉

¹⁵ 林照真，《喇嘛殺人》，台北：聯合文學出版有限公司，1999〈民 88〉，頁 356-359。

民國 國 時 代	<p>國旗中五色旗，象徵五族一體，臨時約法 1931年國民會議，十三世達賴、九世班禪 正式派員參加。</p> <p>1939年中央指令青海省派軍隊護送十四 輩達賴入藏。(時十四輩達賴為靈童)</p> <p>1940年同意免於金瓶掣籤，正式批准拉丁 登珠為十四輩達賴喇嘛。</p> <p>1940年國民政府在拉薩設立蒙藏委員會 駐藏辦事處。</p> <p>1946年西藏地方政府班禪的行政機構堪 布廳代表參加國民大會。</p>	<p>1. 1914年，西藏和中國、英國政府代表以 平等身份代表各自的國家簽訂《西姆拉條 約》。這個條約將西藏分為內外藏，並在名 義上承認中國在西藏的權利(即宗主權)。 但中方拒絕正式簽字。因此條約最後由英國 政府和西藏政府代表簽字生效。並附加說 明中國將不得享受條約中規定的權利。</p> <p>2. 1940年2月22日(藏歷1月14日)，十 四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舉行登基典禮。</p> <p>3. 1947年印度獨立，西藏政府發賀電慶祝 印度獨立。同年，西藏政府代表到印度首都 德里參加泛亞洲會議。1948年，西藏貿易 代表團手持西藏政府簽發的護照經香港訪 問了美、英等西方國家¹⁶。</p>
-------------------	--	--

第三節 中共統治時代論述之對比

	中共說法	達賴說法
經 濟	<p>1989年全區國民生產總值21.1億 元、國民收入16.7億元，分別比1979 年增長了97.64%和324.36%(含中央 巨額補貼);人均收入397.25元，比 1979年的159元增長了149.8%。按</p>	<p>中國領導們也承認西藏的貧困處境。公歷 1990年3月召開的第七次中國人大第三次 會議上，所謂“西藏自治區”的首腦多杰 次仁提到：“西藏(自治區)至今仍是一 個極為貧窮的地區，人民的年均收入只有</p>

¹⁶ <二十世紀西藏大事年表>，《西藏通訊》總第二十六期，2000年3月;
 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nl/26/index.html#19>

	<p>1980年不變價格計算的農牧業總產值，由1978年的5.02億元增加到1989年的7.56億元，增加了50.59%，平均每年遞增4.59%。農村經濟結構得到改善。1988年農業總產值與農村工、交、商和建築業總產值之比為91.8:8.2，比差開始縮小。在農業產值中，種植業由1978年的36.7%下降到30.1%；畜牧業由1987年的54.3%上升到57.2%；副業由1978年的8.2%上升到10.9%；林業和漁業由1978年的0.8%上升到1.8%。農業商品有所提高，1979年農業商品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1.3%，1988年為24.1%¹⁷。</p>	<p>二百元人民幣。”¹⁸</p>
<p>衛生</p>	<p>和平解放前，西藏沒有一所現代醫療衛生機構，體育事業幾乎空白。和平解放50年來，國家累計撥款18億多元，用於發展西藏醫療衛生事業，大多數鄉村建立了合作醫療機構，國家每年給農牧民的醫療補貼達2000多萬元。到2000年，西藏醫療衛生機構發展到1254所，床位6440張，專業衛生工作人員10957名，每千人口擁</p>	<p>中國政府在西藏的衛生事業方面實行民族歧視政策。衛生行業開支的90%是在使用在住著大量中國移民的城鎮，藏族聚集的農牧區僅佔10%左右。絕大多數醫院修建在住有大量中國移民的城鎮，而且，即使醫院的設備或條件較好，也因費用昂貴，從而使絕大部分西藏人無法受益。尤其嚴重的是，中國醫生和醫務人員無視西藏人民的生命，將西藏病人作為增強自己的醫療知</p>

¹⁷ 丹增、張向明主編，〈當代中國的西藏(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頁468

¹⁸ 〈西藏的真相---社會經濟狀況及殖民主義〉，西藏之頁/文獻與檔案庫，
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books/zhen/zhen6.html>

<p>有的病床和衛生技術人員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獨具西藏特色的藏醫、藏藥得到蓬勃發展，藏醫機構從 1959 年的 2 所發展到目前的 14 所，同時 60 多個縣醫院還設立了藏醫科，藏醫藥從業人員，從 1959 年的 434 人發展到 1071 人。藏醫藥學的科學研究和教育工作邁上了現代化的發展軌道，古老的藏醫藥學煥發出勃勃生機。2000 年 5 月，在西藏拉薩成功舉辦了“國際藏醫藥學術研討會”。醫療衛生事業的長足發展，使西藏人均壽命由 50 年代的 36 歲增加到現在的 67 歲，嬰幼兒死亡率由和平解放前的 20% 降至 6.61%，人口由 50 年代的 100 萬發展到現在的 262 萬。《全民健身計畫綱要》的實施，現代競技體育運動水平不斷得到提高，尤其是登山運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99 年，成功舉辦了全國第六屆民運會拉薩分賽場的各项體育比賽活動¹⁹。</p>	<p>識和實踐經驗的試驗體。由中國衛生學校畢業後被遣入西藏以鍛鍊其醫療知識和經驗的那些人，對西藏病人無所顧忌地隨意進行各種手術，這些醫生在手術過程中對病人已知的疾病不去治療，而是在觀察有無別的病情等情況在西藏受到普遍的譴責，特別是不考慮是否必要而隨心所欲地進行各種手術。在西藏，由於衛生事業的落後，人口死亡率極高。根據世界銀行 1984 年的報告和聯合國發展組織 1991 年的報告，1981 年“西藏自治區”人口死亡率為 7.48%，安多地區死亡率為 9.92%，而中國的人口死亡率只有 6.6%。在“西藏自治區”，兒童死亡率在千人中達 150%，而中國為 42%。中國人的壽命為 70 歲。另據聯合國發展組織 1991 年的報告：1960 年西藏人的平均壽命只有 47 歲。自由消息來源證實：中國自己承認西藏人均壽命為 40 歲²⁰。</p>
<p>建設</p> <p>50 年來，中央對西藏的投資和財政補貼累計達 400 多億元。西藏自治區成</p>	<p>西元 1980 年底，中國給“西藏自治區”的財政補貼為 10 億多元人民幣。但是，中國</p>

¹⁹ <西藏五十年>，西藏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9 月 2 日；轉引自中國西藏新聞網 2002 年 11 月 19 日：<http://www.chinatibetnews.com/GB/channel18/200211/19/4305.html>

²⁰ 同註 13

立二十周年，中央幫助西藏建設了 43 個工程項目；西藏自治區成立三十周年，中央和全國援藏建設項目達 62 個，總投資超過 40 億元。內地十五個省市和中央各部委按照“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的方式支援西藏，全國各兄弟省市區長期無私援藏。僅 1995 至 2000 年對口援助省市援建項目達 716 個，投資 31.56 億元²¹。

政府除了奢談給西藏的財政補貼外，對於從西藏掠去的比這更多的財富和利益卻隻字不提，諱莫如深。其實，如用現金數額來計算，僅僅從西藏運往中國的木材，其價值便大大超過了中國聲稱所謂給予西藏的財政補貼數。更何況中國在西藏大量地開采的“核子”、金銀銅鐵、硼砂等各種地下礦產資源，以及將西藏無數的、以各種佛像、宗教器具等無價之寶為主的大量財富運往或正在運往中國等情況均未計算在內。而“補貼發款”中的絕大多數實際上只是做為中國幹部和工作人員的平常開支費用以及為遷移定居西藏的中國人提供各種補貼而已。在所謂的“財政補貼”之分配過程中，在城市與鄉村間有著驚人的懸殊，七十年代末與八十年代初，城市居民的人均補貼數為 128 美元，但農牧區的居民人均補貼僅為 4.5 美元。所謂的“西藏自治區”的絕大部分城鎮擠滿了移民西藏的中國人。其中，中國人占多數的城市有拉薩、日喀則、澤當、昌都、阿里、江孜、那曲、貢布林芝等地。總之，財政補貼的絕大多數經常性地被使用于城市中的中國人和他所賴以生存的各個建設行業²²。

²¹ 同註 14

²² 同註 13

交通	<p>和平解放前西藏沒有一條公路。和平解放以來，以公路建設為重點，航空、管道運輸協調發展，形成了以拉薩為中心四通八達的交通運輸網路。西藏現有幹線公路 15 條，支線公路 375 條，總長達 2.53 萬公里，基本實現了縣縣通公路，80% 以上的鄉通公路。已建成貢嘎、邦達民用機場，開闢了拉薩到北京、成都、重慶、西安、西寧、上海、迪慶、昆明等國內定期航班和加德滿都的國際航線²³。</p>	<p>大部分西藏人在三十年代後亦不能從當代中國的運輸線中得益。西藏的大部分鄉村雖靠近公路，卻沒有公共汽車，即使在少數鄉村牧區，雖有公共汽車，也只是每星期末來一趟，而且，裡面的旅客絕大多數為幹部。西藏人民相互往來或運輸的交通工具依然是役使馬、騾、驢、牛、羊等。中國政府運送物資的車輛，使西藏人乘搭便車的機會在增多²⁴。</p>
----	--	---

第四節 中共治藏之評述

在討論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時，有不少人指出清政府的少數民族政策是最高明的，其實少數民族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總是和邊疆問題結合在一起，是以從漢民族政權的角度來看，歷來對付少數民族是「羈縻關係」「剿撫並用」，以稱臣納貢為標，以相安無事、不侵不擾為底線，因此大體維持和和戰戰之局，到了清政府一方面是滿人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北方牧民的開拓精神，使以對週邊的少數民族從「羈縻關係」進而為「統而不治」「管而不理」，在此一政策指導下，少數民族自身的政經社會、文化生態均不在清政府管理的範圍，因此，對週邊的少數民族而言，並沒有被統治的感覺，此一政策到了近代國家的概念傳入中國之後，自然並不適用，特別是中國是採取「單一國體」的政體，自然對境內的少數民族在管轄上不可能採取非「國家」模式之前的管理辦法，

²³ 同註 14

²⁴ 同註 13

而近代中國的建立始自 1912 年的中華民國，不過中華民國從建立初期開始就一直處在分裂、動亂以及抵抗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的侵略之中，因此，連原本漢族地區都統一不了，至少邊疆的少數民族地區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自然也談不上統治，直到打敗日本之後，全國勉強統一。事實上，一方面是國共內戰，一方面實施國內建設，因此對邊疆少數民族也只是拉攏式的統治，後國民黨內鬥失敗，中共統一大陸之後，近代國家概念在中國已經根深蒂固，因而對少數民族自然是採取當代國家的觀念來統治，這對於習慣長期統而不治的少數民族領袖，自然十分不能習慣，尤其是擁有自己歷史、文化、宗教、血統的藏族、維族人民更是起而反抗，而藏民族長期有自己的政權和宗教組織，是反抗的方式比較有組織、有計劃，加上外國勢力的介入，自然歷久不衰，而維族的領導比較分歧，行動無法一致，加上是回教與基督教長期的矛盾，所以美英等帝國主義政客利用的方式比較謹慎，因而我們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來評價中國的治藏結果，就必須有自己的民族立場，看待事實，此一立場就是漢藏和睦相處、平等友好的立場，不因反共而失民族大義，也不因漢族自己的沙文主義，而無視少數民族的立場與感受。

在此一基礎上，我們對中共的治藏政策，自有若干評述：

第一、從當代統一國家、單一國體的立場來看：中共以軍事統一西藏的行動是正當而合理的，美國今日的土地有一半土地不是從早期北美的印地安人手中以戰爭和殺戮搶奪過來的，這種近代國家、領土、主權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觀念是誰教給中國，是西方、是美英這些帝國主義，中共統治西藏還只是保衛清政府、民國政府的固有疆域而已，因此，西方當代的政客、學者是最無資格指控中共「入侵」西藏，藏胞叫叫嚷嚷，還值得同情，西方政客、學者的起哄就是無理取鬧，除非美國的人也把土地還給印地安人，這是首先必須明確的事。

第二、中共統治手段粗暴、態度傲慢、醜化藏族的文化、否定藏胞的信仰，特別在民主改造時，恣意重組藏族的社會，忽視藏族統治階層的感受，引起藏

胞統治階層的反抗，尤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幾乎毀滅藏胞的傳統，甚至於到了「改革開放」之後，又以漢族的標準「改善」藏族的經濟，忽略環境生態的保護，這些都是重大的罪行和嚴重的錯誤，中共當局有必要尤其是必須傾聽藏胞的聲音，認真而虛心的檢討和面對，以便務實地調整其少數民族的政黨。

第三、中共的治藏不是只站在舊西藏統治階層的立場來看，換言之，我們也不完全信賴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立場，因為達賴喇嘛流亡組織在其組織網站上有「西藏的真相」乙欄，在反駁中共所自詡的治藏政績時，其實是和中共宣傳邏輯完全一致，首先是雙方的目標完全一樣，都是希望發展經濟，改善藏民生活，所以流亡組織的「西藏的真相」之「六、社會經濟狀況及殖民主義」乙節中，所有的指責集中在中共的統治對藏民生活水平並沒有實質的改善若有改善也只是改善了城市的、漢人的生活水準與農村的藏人無關，這不但是一種無法令人相信的指控，顯然流亡組織的宣傳機器並沒有將藏民習慣將財富捐獻入寺院、供養喇嘛的習慣完全考慮，公路的修築只是為漢人移民的說法，也是一種移民式的宣傳，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攻擊宣傳的背後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標準來衡量西藏的發展。換言之，中共的經濟開發西藏對流亡組織而言，不是方向路線的問題；其次是流亡組織在反宣傳上也習慣使用個別的事例去否認全體，此種反宣傳是一種「有證據、無效力」的反宣傳，也是以烏托邦來要求現實世界的宣傳方式，這是沒有意義的反宣傳；其三是流亡組織也慣用自己的「大西藏」的概念來攻擊「西藏自治區」，流亡組織「大西藏」的概念是自己塑造的，他們將古代羌族遊牧的範圍，完全佔為己有，完全無視羌族和回族、漢族在此一土地上雜居、交往已逾千年的歷史事實，因此在所謂的「大西藏」，甘、青、川、黔各省有漢人居住、生活這是自然的事，在清政府時代就已經劃規省加以管理，但是流亡組織的宣傳常常以所謂「大西藏」和「西藏自治區」的概念加以混淆，例如流亡政府所說的木材、礦藏以至軸礦的開採就和「西藏自治區」完全無關，但是流亡組織的宣傳卻可以矇騙外國人是，所以我們以為流亡組織立場也不足取。

在雙方毫無交集的情況下，中共繼續自己的西藏建設，而流亡組織也是依照往例批評中共，雙方的關係自然沒有任何改進的可能，但是中共畢竟位居有利的統治地位，因此，在改正了「文革」的荒謬之後，尤其是九〇年代以後，大力推動西藏建設，特別是提出西藏大開發的構想，企圖以更大的魄力來改變西部地區的落後面貌，改變中國的經濟戰略，應該說此一戰略規劃在間接上是真正打擊到流亡組織的攻擊性宣傳，因此，才有達賴喇嘛不得不再度與中共接觸的必要。本研究既以此為重點、為研究的課題，企圖從研究中來理解西藏發展出有利于藏胞的人民觀點。

第三章 西藏民族區政治現代化之評析

第一節 前言

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今(2004)年5月23日幾乎是在完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發表了一篇名為《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這是中共政權號召西部大開發以來，針對西藏地區所發表的第四份說明西藏現況的白皮書，他們分別在2004年5月「《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2003年3月「《西藏的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白皮書」、2001年11月「《西藏的現代化發展》白皮書」及2000年3月「《西藏文化的發展》白皮書」，除此之外，在上一世紀的九十年代，中共也針對西藏情況發表過二份白皮書，分別為1992年的「《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及1998年的「《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新進展》白皮書」。回顧中共政權以正式白皮書的方式來闡明自己的立場大概是從上一世紀的九十年代開始，先後針對台灣問題、維族議題、西藏議題以及大陸的人權觀、中共國防建設等發表中共官方的看法。大致而言，「白皮書」的發表大致是針對國家的重大問題、重大的情勢變化、重大的政策變化而有必要以「白皮書」的方式來表達官方的正式立場時，才會使用此一公文型式，不過這並不說白皮書本身有多重要，只是說白皮書的使用一般以重大問題事件、政策為主，而且是選擇適當時間以有力的闡釋官對問題的基本態度和看法，因此人們就會好奇，中共政權在今(2004)年5月下旬為何發表《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其目的何在，以後是否有可能繼續針對西藏議題發表類似的白皮書，實有進一步分析的必要。

第二節 白皮書之發表與內容評述

任何重要文件的發佈一般都有一定的理由，通常會明白的顯示，但是中共的六篇西藏議題的白皮書，我們便無法從發表時間、事件相關性或是環境因素來整理出邏輯性的因果。從時間論，以發表的年份來看有 1992 年、1998 年、2000 年、2001 年、2003 年、2004 年；以發表的月份來看有 9 月、2 月、6 月、11 月、3 月、5 月；而在西藏議題比較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議題：有西藏和平解放的 1951 年 5 月 23 日、有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的 1956 年 4 月 22 日、有西藏籌委會取代西藏地方政府(原達賴喇嘛及噶倫噶廈)的 1959 年 3 月 28 日以及 1965 年 9 月 1 日西藏區自治政府正式成立，然而中共發表西藏白皮書，似乎並沒有刻意選在這些特定的日子舉行過經常性的紀念和典禮，以今(2004)年的白皮書和西藏和平解放的日期相同來看，似乎也看不出是有意的選擇，這就是說在一些近因上，我們很難歸納出任何有意義因果關係，這樣我們就有必要從其他角度來思考，中共政權開始以「白皮書」的來對外公開說明其政府的觀點是從上世紀的 90 年代開始，綜觀整個 90 年代幾乎除了 1995 年，中共沒有提出「白皮書」之外，其他的年份每一年都有白皮書，少則一份如 1991 年；多則七份如公元 2000 年²⁵，個人以為這一種轉變本身是十分有意義。

第一、中共政權的改革開放政策在八十年代推動的十分順利，因此也和西方世界建立了相對的良性關係，然而 80 年代末的世局使得社會主義國家處於極不利的地位，特別是 1989 年的大陸民運，最終釀成「六四」鎮壓事件，此一事件之後，西方國家開始集體對中共採取封鎖、撤資、禁運種種杯葛行動，這些政策應該說打亂了中共在 80 年來希望大力推動開放政策的計畫，因此當時的中共政權一方面慎重宣告「改革開放」措施的持續性，另一方面也積極尋找外交的突破，在此環境中，中共政權開始以白皮書的方式來公開闡述中共對許多議

²⁵ 資料來源:新華網政治在線 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22/content_638035.htm

題的看法，而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政權最受外人指責的就是大陸的人權問題，所以在 1991 年中共所公佈的第一個白皮書就是「中國的人權狀況」。之後在國際有不少攻擊中國剝削監獄的犯人從事生產以便在出口方面對外傾銷，所以中共在次年(1992)年 8 月提出「中國改造罪犯的狀況」。換言之，中共政權在 1990 年以後，開始利用西方政府的「白皮書」方式²⁶來彰顯中共政權的政策思考，同時也以西方世界常用的方式來對世界發聲，這是中共發表「白皮書」的一個大環境和背景環境。

第二、80 年代末西藏地方政局不穩，班禪喇嘛的去逝，以及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達賴喇嘛的組織陸續在西方國家的大城市開始設立辦事處²⁷，達賴出訪其他國家次數和各國元首接見的頻率也逐步上升²⁸，西方國家的政府內部也設立了處理西藏事務的專門官員，中共領導人的出訪，則逐步受到海外藏人的抗議，致使海外藏人流亡組織氣勢大振。因此西藏議題，對中共政權而言，忽然變成是十分重大的問題，特別是達賴喇嘛在 80 年代末在歐洲議會提出一些新建議，願意放棄獨立的追求，改為「高度自治」，這些都使得西方世界注意到西藏議題，注意到中共在治理西藏方面的問題。因此在環境需要下，也在中共在西藏議題上的需要下，促使中共在 1992 年 9 月提出了「西藏的主權歸屬和人權狀況」，主權歸屬主要是為了批駁達賴喇嘛在西藏獨立上所提出的論述，而人權闡釋則一方為了揭露達賴喇嘛領導西藏時的狀況，另一方面以目前的人權狀況來答覆西方國家的攻擊，這是中共在 1992 年末就提出西藏議題的白皮書的原因。

²⁶ 「白皮書」是指一國政府或議會正式發表的重要文件或報告書的封面有它慣用的顏色，白色的叫白皮書（如葡萄牙），藍色的叫藍皮書（如英國），紅色的叫紅皮書（如西班牙），黃色的叫黃皮書（如法國），綠色的叫綠皮書（如義大利），因而白皮書、藍皮書等往往成爲某些國家的官言文書的代號。但事實上，一國使用的顏色不限於一種。

²⁷ 西藏流亡組織在世界各大城市的辦事處、代表處共十四處，其中九處爲九十年以後設立。〈西藏流亡政府之西藏流亡政府及其所屬各部門之 11/西藏流亡政府駐外機構〉，西藏之頁。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ex/lwzhengfu/index.html#3-11>

²⁸ 以達賴喇嘛訪美國迄今(2004 年)二十八次，其中只有五次在 1989 年 6 月以前；訪英國共十四次其中四次爲 1989 年 6 月以前；訪德國二十六次其中七次爲六四事件以前；訪法國二十次其中四次爲天安門事件之前。〈達賴喇嘛之十四世達賴喇嘛外訪錄〉，西藏之頁之”達賴喇嘛”導讀。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hhdl/fang2.html>

第三、西藏議題在中共政權中的重要性亦有所提升，其提升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共改革開放之後，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造成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而引起政治、社會、人口流動、資源運用等國家發展戰略上的困境，而在所有西部地區中，西藏或是藏族居住的地區又相對是比較貧窮的地區，是以1990年以來中共中央又召開了二次西藏會議。與80年代(1980、1984)二次西藏會議以政治上撥亂，以及經濟上減免稅賦、休養生息為主不同的是90年代之後的會議重點在如何協調西藏發展為重點。經過80年代末西藏地區的動亂之後，中共注意到必須協助西藏大力發展經濟，才能使西藏社會發展得到穩定。因此在1994年的會議採取了加快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並採取「分片負責、對口支援」的辦法，掀起了全中國支援西藏的新浪潮。建設了由全中國各省市和中央國家機關援助西藏的62項工程，加強了農牧業、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²⁹。而2001年的第四次會議又採取了進一步加大對西藏的建設資金投入和實行優惠政策的力度，繼續加強對口支援。目前確定了中國國家直接投資的建設專案117個，總投資約312億元。考慮到西藏的特殊情況，西藏的重點建設項目資金主要由中國國家來承擔。對口支援西藏工作在現有的基礎上再延續10年，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將西藏尚未建立對口支援關係的29個縣，以不同的方式全部納入對口支援範圍³⁰。通過這四次的會議，事實上，在某種意義上，中共已經將西藏地區的中央與地方的問題轉化為全國性的議題，將漢藏民族隔閡的政策，調整為民族融合及民族團結的政策，足見西藏議題已經成為中共中央必須日常關注的課題。但是此一中共中央認為成效卓著繁榮和建設西藏的大作為，看在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眼裡，則被形容成為罪孽深重的破壞文化與生態浩劫。因此迫使中共中央必須面對西藏議題有所說明及解釋；當然中共反擊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宣傳，其方式自然很多，然而其他的反擊有可能在客觀上達到了抬舉流亡組

²⁹ 〈中央召開的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新華網西藏頻道，2003年10月9日。

資料來源：

http://www.xz.xinhuanet.com/zhongyangguanxinixizang/2003-10/09/content_1029006.htm

³⁰ 同註5

織的效果，這自然不會是中共所樂見的，而白皮書的方式則是一種主動開明政策，也可以兼具反駁、攻擊的效果，白皮書是一種公開形式的官方文件，沒有特別的對象，因此對中共而言，應該是一種較好的駁斥流亡組織的攻擊，闡述自己的施政效果的方式。

第四、鑒於西藏問題在國際間的流傳，中共似乎是有計劃地闡釋其西藏政策和成效：在中共政府迄今的 39 份白皮書中，毫無疑問是以西藏議題為最多，共有 6 篇，為什麼中共在西藏議題公佈這麼多白皮書呢？看來中共是有計劃地闡釋其政策，從主權、人權、文化、現代化、生態環境及區域自治都作了全面、完整的闡釋，顯然中共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西方世界也能理解其政策，以便減少他們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並且拆穿流亡組織的謊言，從白皮書似乎在回應西方人的西藏觀³¹，以公布的內容來看，先是西方人最關心的「人權」，中共的白皮書最先的有兩篇，談的內容都是西藏的人權問題，儘管西方人認為中國的人權紀錄很差，特別是在處理政治上的異義份子，但是中共仍是堅持中國人的人權是生存權為最優先的觀點，同時中共也就進一步辯稱以西方的人權標準來看，達賴喇嘛統治西藏時代藏人更沒有人權，其用意已如上段所述，新世紀開始中共的西藏「白皮書」，先是說明西藏文化發展的現況，其目的自然是為了反擊達蘭沙拉的宣傳機器說中共以漢化來破壞西藏文化的批判，中共在白皮書中強調其保護、保存西藏傳統文化的政策和投資，特別是對西藏宗教文化特色的維護和研究，對藏語推動的種種努力，這些內容自然有針對性的說明問題。2001 年的白皮書是為其治藏成績作宣傳，特別是自 90 年代第四次西藏工作會談以來，中共和中國各省援藏的績效，對西藏人民生活改善的現狀，均有十分正面的描述。但中共建設西藏的宣傳帶來了西方人和達賴喇嘛及流亡組織對西藏生態環境的質疑，因此在 2003 年的西藏白皮書中，就開始作出系統的回答來闡述中共在西藏開發過程中對環境、對生態的重視，從上世紀 50 年代開始對

³¹ 杜永彬，〈西方人眼中的西藏〉，中國西藏第二期，2001 年。

資料來源轉引自學說連線：<http://www.xslx.com/htm/zlsh/shrw/2002-10-11-10365.htm>

青藏高原的生態考察，到 80 年代立法加強保護，生態保護的面向涉及土地利用、礦產資源管理、森林保護、草原保護、野生動物保護、污染整治和自然保護區的設置等等。當然中共這些白皮書在國際上，是否產生效果我們不得而知，然而中共發表西藏白皮書的動機和目的，則是十分清楚。依據此一邏輯來推測今(2004)年 5 月 23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所發表的「西藏的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或許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因為中共治藏五十年或是自治區成立五十年，故而極有可能是中共的統戰部民族委員會針對西藏議題有一個寫作班子，不斷地追蹤西方政府、學者和媒體對達賴喇嘛所提及的追求高度自治的講法有所同情和贊同，因此中共有必要對其民族自治的政策，特別在西藏的成就，作一系統的說明。

從內容來看，中共第六份的西藏白皮書，定稿的時間大致不超過今(2004)年年初，因此在白皮書上所有許多資料是使用到 2003 年的 12 月。換言之，其寫作的動機大致在去(2003)年年底到今(2004)年年初左右。中共西藏的自治區的成立是在 1965 年 9 月。在西藏自治區成立之後的四十年，而達賴喇嘛仍在國際上提出西藏高度自治的訴求，此一主張如果在國際上大行其道，無疑否定了中共相當自豪的民族政策。中共在成立民族自治區時，參考了前蘇聯的民族政策、美國的印地安保留區政策、中華民國早期的區割民族政策等，而採定了民族區域自治。中共認為符合國情，既保持國家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又能尊重民族的特性，保留民族特色的制度。而達賴喇嘛的倡議等於是是否定了中共民族自治制度的優越性，其次高度自治的說法也等於宣告目前藏民並不享有自治的權利，所以達賴喇嘛的說法是對中共民族政策、中共西藏政策雙重否定，我們相信達賴喇嘛的人員必然十分清楚達賴喇嘛的提法，以一箭雙鵰的陷阱，故意戲弄中共的伎倆。因此，他們也預計中共當局必然是不會接受，於是便可以獲得國際更大的同情。因此經過多年之後，中共方面除了重覆強調達賴喇嘛的「假自治、真獨立」和指責達賴喇嘛訴求是欺騙國際的伎倆之外，沒有任何有力的說辯和反駁，所以中共有必要再與達賴喇嘛展開接觸之際，對此問題加以

澄清，以便為未來政策奠定基礎。

第三節 重要內容詮釋

中共 2004 年的「西藏民族區域自治」白皮書敘事的基本邏輯是以正面事實為說理導向，全文可以分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重點有二：

(一)陳述中共在西藏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理由，其理由有三：

1. 結束封建農奴制度的枷鎖；
2. 擺脫帝國主義對西藏的控制和剝削；
3. 維護國家統一，實現西藏發展。

(二)回顧建立區域自治的過程：敘述中引用了「十七條協定」以解釋中共在 1955 年 3 月就成立「區域自治籌備會」的決策和行為，是符合「十七條協議」原始之精神。

第二部分是闡述自治區域成立之後所取得的成績，其中對「文化大革命」時代的破壞，則是隻字未提，而改革開放之後的成績則大加著墨。主要的成績則表現在政治上藏人享有充分的自治權、經濟上享有充分的自主權、文化上享有自由的繼承權。在成績導向論述的後段邏輯，則是以現代化為價值的思考，因此全部的內容主要表現在量化的對比，以突顯政治上的進步，在經濟層面的發展和文化層面的繁榮，而在進步、發展、繁榮的背後，都有黨的政策和漢民族的支持和援助。

第三部分則主要闡述區域自治制度的鞏固和發展，特別強調藏族人民當家作主的不可逆轉性，這種藏人的當家作主是與西藏地方自治有機結合的，中共認為這是國家保證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實踐證明完全適合中國國情和西藏地方的實際情況，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此一制度使得西

藏人民不僅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不受任何歧視地享有與全中國各族人民完全平等的權利，而且依法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區、本民族各方面事務的自治權利，依法享有受國家特殊扶持和保護的權利。可以說，西藏實行的民族區域自治不僅全面體現了聯合國《在民族或種族、宗教和語言上屬於少數群體的人的權利宣言》以及其他有關少數民族權利保護國際文書所規定的平等、非歧視和特殊保護的原則，而且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具有的優越性。

第四部份的篇幅不長，是由白皮書的最末尾二段文字構成。但是個人以為這一部份才是中共發表此一白皮書的重點所在。第一段是以達賴喇嘛在 1956 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時所作的公開發言為主體；第二段是反駁達賴喇嘛提出的在西藏實施「一國兩制」的要求，也明確指出以達賴為首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西藏地方政權早已被西藏人民自己建立的民主政權所代替，西藏的命運和前途再也不可能由達賴喇嘛和達賴集團來決定，而只能由包括西藏人民在內的全中國人民來決定。這是西藏不容否定和動搖的客觀政治現實。換言之，在這段的內容是直接否定達賴喇嘛所提在西藏實施「一國兩制」的可能性，不過最後則又提出希望達賴喇嘛正視現實，認清形勢，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爭取在有生之年為國家和西藏地方的發展進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縱觀全篇的「白皮書」中，大致論述的手法和過去的五篇白皮書沒有太大的差異，主要是以宣傳政績為主，駁斥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為輔，不過在駁斥達賴喇嘛的部份，則與以往的幾份白皮書並不相同，比較值得注意：

第一、是在攻擊的用語和口氣方面，顯然比以往為和緩，在以往的白皮書中，如「西藏的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白皮書中說「達賴集團和國際反華勢力無視西藏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事業發展的客觀事實，在國際上到處散佈謠言，指責中國政府“破壞西藏生態環境”、“掠奪西藏自然資源”、“剝奪西藏人

的生存權”等等，妄圖借此欺騙國際輿論³²。」在「西藏的現代化發展」白皮書中，更是以兩段文字大肆攻擊達賴集團，而且語言十分強烈的粗暴³³，「達賴集團更是與國際反華勢力沆瀣一氣，不斷煽動國際輿論，大肆從事反華分裂活動，詆毀西藏的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成就，百般干擾、阻撓和破壞西藏的社會現代化發展。達賴集團和國際敵對勢力把西藏和平解放、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指責為“中國佔領西藏”；把中央政府推動西藏現代化進程說成是“消滅西藏的民族特性”；把西藏經濟的快速發展攻擊為“破壞西藏環境”；把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關心、支援西藏現代化建設污蔑為“掠奪西藏資源”、“加強對西藏的控制”、對西藏進行“漢化”；把西藏廢除政教合一制度和宗教、寺院的世俗特權污蔑為“滅絕宗教”；把西藏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弘揚和現代科學教育文化前所未有的發展誣稱為“滅絕西藏文化”如此等等。一句話，凡是有利於西藏現代化發展和社會進步、有利於西藏人民幸福的事情，他們都要製造各種莫須有的罪名，不遺餘力地予以反對。這就充分暴露了達賴集團代表落後的封建農奴制生產關係、代表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宗教文化、代表極少數沒落的封建農奴主特權階級利益的反動本質，也充分暴露了一些國際敵對勢力妄圖利用所謂“西藏問題”破壞中國穩定、分裂中國領土、遏制中國發展和強大的陰暗心理³⁴。」又如在「西藏文化發展」白皮書中，則是以針鋒相對的方法直接指出中共保存的西藏文化的努力和消滅西藏的封建農奴制的文化是文化發展的自然趨勢，指責對中共藏文化的建立「其實質是要求現代西藏人民原封不動地保留舊西藏封建農奴制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是完全違背時代進步潮流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極端荒謬的³⁵。」在「人權問題」白皮書上對達賴喇嘛

³² 〈2003年西藏的生態建設與環保保護白皮書〉，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3年3月。
資料來源轉引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03/10/content_768445.htm

³³ 〈西藏的現代化發展〉，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0年11月。
資料來源轉引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4/content_629894.htm

³⁴ 同註9。

³⁵ 〈2000年西藏文化的發展白皮書〉，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0年6月。
資料來源轉引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4/content_630034.htm

的攻擊則更是強烈「達賴詆毀今天西藏的人權狀況，但在西藏大規模地粗暴地踐踏人權的情形，恰好是在達賴統治的舊西藏發生的，這是舊西藏殘暴、野蠻、黑暗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封建農奴制度產生的罪惡。」進一步又說「流亡在外的達賴對舊西藏普遍的踐踏人民群眾基本人權的狀況隻字不提，竭力掩飾，卻對新西藏的發展、進步百般詆毀和攻擊，以編造聳人聽聞的謊言欺騙世界輿論。

“妄語戒”是佛教的根本戒條之一，達賴肆意編造謊言，違背和踐踏這一戒條，這只能向世人暴露其打著宗教旗號進行分裂祖國活動的本來面目³⁶。」1992年「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對達賴喇嘛攻擊更加強烈，在文中的第三達賴集團的分裂活動和中央政府的政策乙段，可以說是全段的攻擊，文末說「他們的目的無非是混淆視聽，製造混亂，以達到夢寐以求的分裂中國、攫取西藏，進而顛覆社會主義中國的野心³⁷」，對比上述強烈的攻擊，今年白皮書的用語，則只提達賴集團不顧西藏人民當家作主，不斷在國際上攻擊西藏民族自治「沒有實質內容」僅此而已，可見攻擊的內容簡化、語氣和緩的事實。

第二、沒有以「分裂中國領土」勾結「外國反華勢力」等字眼來形容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這是十分罕見的事。因為直到2003年中共為西藏生態維護的白皮書，也還提到「國際反華勢力」「分裂中國領土」等字眼。在2001年「西藏現代化白皮書」中，也同樣類似的形容詞，而且審視中共在白皮書中攻擊的語句似乎這是必然伴隨著達賴喇嘛的攻擊一定出現的詞彙。換言之，在中共政權看來這應該是達賴喇嘛的罪行所在，而且了解中共與達賴喇嘛關係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共對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最不諒解的罪名。如今在中共直接解說「西藏區域自治」制度的文件中，竟然沒有「中國分裂領土」勾結「外國(或國際)反華勢力」的指控，這是此一文件中極不尋常的地方，特別對比今年達賴「三一〇講演」，還特別強調自己的「中間道路」是符合印度的西藏政策的提法，

³⁶ 〈1998年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新進展〉，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998年2月。

資料來源轉引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5/content_630942.htm

³⁷ 〈1992年西藏的主權歸屬和人權狀況白皮書〉，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992年9月。

資料來源轉引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5/content_630888.htm

中共竟然在五月的白皮書中將達賴喇嘛「除罪化」，因此此一變化就十分值得吾人省思，究竟中共此一提法是對達賴喇嘛的言行的新評價開始，或只是策略的運用，若是後者代表的意義自然有限，可能只是為了創造今(2004)年與達賴喇嘛代表的再訪問的氣氛³⁸，若是前者，則有可能代表中共對達賴喇嘛策略的重大變化。

第三、將達賴喇嘛與達賴集團有所區分:在中共的白皮書中過去有時是同時指責達賴喇嘛與達賴集團，有時是將達賴喇嘛與達賴集團合而為一的指責，然而在此次的白皮書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共開始很細心的將達賴喇嘛及達賴集團作了不是很清晰的區分，例如在達賴喇嘛部份的指責是只指出他違背當初信誓旦旦說過的話，特別是在白皮書的最末竟然是提出對達賴喇嘛的期望和期待，這是以往的白皮書所未出現的更是和達賴喇嘛在「三一〇講演」之後的氣氛不完全相融的。至於對達賴集團的用語顯然比較強烈，而最突出的還是以達賴喇嘛的說法來攻擊達賴集團對高度自治的指責，此一手法是以往所沒有使用的方法，而且也 and 中共慣用的鬥爭方式完全不同，因為中共對敵鬥爭慣用的手段是孤立少數敵人，聯合大多數。當然就從西藏問題而言，中共以經濟發展民族團結去統戰藏人來孤立海外的反對者，而對海外藏人之中過去都是以打擊和會談的兩手策略，如今中共似乎調整為拉住達賴喇嘛，打擊達賴集團，此一策略是否代表長期性對達賴喇嘛的改變，也是值得觀察的。此一策略可以是中共方面已經做好調整的話，中共策略的目的則在於逼達賴集團放棄「藏獨」，如果此一策略也能奏效的話，則藏青會、藏婦會也會相繼被孤立，而且國際的奧援也將進一步相對的萎縮，則西藏問題的解決也就更加容易，再配合上中共與印度關係的改善，則中共西南邊境的問題大致就不再成為危機，則週邊和平就只剩下東南一隅的台灣問題而已。

³⁸ 〈美國之音:達賴喇嘛特使啓程前往北京〉，西藏之頁，2004年9月13日。
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09/index.html#040913.2>

第四節 達賴流亡組織對白皮書的攻擊

長期以來，達賴流亡組織對中共的白皮書採取的是一種反對和懷疑的立場，例如 2003 年西藏流亡組織就發表了「西藏環境白皮書」來針對。中共於當年 3 月發表的「西藏生態建設與環境保護」白皮書時，流亡組織認為「總的來說，中國政府是在努力保護西藏的環境，但是由於中國政府仍在西藏繼續進行各項建設，因此，完好地保護西藏環境顯然存在非常大的問題」，而且全篇的主旨主要「《西藏環境白皮書》總結了中共統治西藏五十年來由於完全漠視西藏脆弱的生態環境而一味強調『人定勝天』以及盲目開荒建設等造成目前西藏所面臨的大量植物滅絕、草原退化沙化以及乾旱和河流泛濫造成水災等非常現象³⁹。」今(2004)年的白皮書流亡組織則以不回應的方式來回應，此一方法是否代表了達賴喇嘛已經獲悉中共新領導集團有意重開雙方的接觸，或是已覺得沒有正式回應的必要，目前尚不得而知。今(2004)年的做法則是由其宣傳部的達瓦才仁以個人名義撰寫長文來加以反駁，達瓦才仁說「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在慶祝儀式(按:指西藏流亡組織每年一度慶祝西藏抗暴運動的儀式)上發表演講時表示，將不會對中共發布的白皮書做出反駁。沒有回應並不表示沒有異議，因此寫就此文⁴⁰。」以此觀之，流亡組織還是有一定的計劃。

達瓦才仁的反駁主要分為四個部份：

其一、民主改革與十七條協議：作者的論點主要表現為：

(一)中共於五〇年代在西藏地區推行的民主改革是違反「十七條協議」；

(二)民主改革受到西藏人民和西藏上層人士以及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的反對；

(三)由於民主改革沒有獲得藏人的支持，因此中共以暴力在西藏推行「人

³⁹ 〈西藏流亡政府發表「西藏環境白皮書」〉，西藏通訊第 45 期，2003 年 5-8 月。

資料來源轉引自西藏之頁：<http://www.xizang-zhiye.org/b5/nl/45/index.html#12>

⁴⁰ 達瓦才仁，〈十七條協議與民族自治〉，西藏之頁即時新聞，2004 年 8 月 17 日。

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08/index.html#040817>

民公社」，終於激起了西藏人民的抗暴。

總之，目前中共與西藏關係之惡化，根源就在於中共沒有信守「十七條協議」，錯在中共不在西藏。從邏輯上和方式的角度來理解達瓦的反駁肯定有其立場上的說服力。

然而立場的反駁畢竟不是真理，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完全可以看出不同的解釋：

第一、1955年中共在西藏成立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時任主任委員的就是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則擔任副主任委員，在51位委員中，漢人只有3名，一個由西藏的上層也參與的區籌委會自然不能算是中共片面違反「十七條協議」。同時1956年4月22日達賴喇嘛在區籌委成立大會上說「最近鄰近各省用和平協商的方式，正在進行或準備進行改革的消息傳到了西藏，引起了若干人的疑慮和懼怕，同時有些人別有用心地說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後，西藏就要進行改革，這完全是一種惡意造謠和挑撥。」達賴喇嘛還指出：「西藏除了社會主義道路以外，別無其他的選擇，但是社會主義和西藏現有的具體情況相距甚遠，我們必須逐步進行改革。但什麼時候改革、如何改革，這還得看工作發展和各方面的具體情況，同時是要西藏的領導人員和廣大人民自己商量去進行，而不是由別人強迫包辦，這點毛主席在對歷次致敬團、參觀團的講話中均有明確的指示⁴¹」的一段話，達瓦的文章是用以證明，西藏民主改革不會由「別人強迫包辦」，但是達賴喇嘛的其他講法，如果參考達賴喇嘛在今(2004)年3月10日在達蘭莎拉的講演⁴²，足証當時的說法應該是在指責西藏地區的上層人士，顯然反對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最厲害的是西藏的上層，所以如果是按達瓦的邏輯來看，違反「十七條」至少達賴喇嘛、班禪喇嘛也是參與違反者，而不是中共片面的違反⁴³。至於中共以暴行強行推動「人民公社」，我們相信這是事實，因為在其他地區

⁴¹ 同註 16。

⁴²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西藏抗暴四十五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全文)〉，達賴喇嘛，西藏之頁即時新聞，2004年3月10日。資料來源：

<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03/index.html#040310>

⁴³ 徐明旭，〈陰謀與虔誠〉，香港：明鏡出版社，1999年，頁169。

亦是相同的方法，然而此一政策最可能激起不滿的不是一般的藏人，而是上層的貴族和喇嘛，因為在人民公社的政策之下，一般的藏民至少是此一政策的暫時得利者，只有上層的貴族、喇嘛和官員才是受害者。這也可以從達賴喇嘛在區籌委會上講「引起若干人的疑慮和害怕」的說法中得到反證。

其二、「一國兩制」發軔於西藏：作者認為「十七條協議」在開宗明義就指出「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的懷抱」來證明西藏在十七條以前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顯然作者的解釋存在重大的漏洞：

(一)協議所言是西藏人民，而非西藏，所以「十七條協議」所說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絕非主權，否則就跟中共自己一貫堅持「西藏自古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論述完全矛盾；

(二)為什麼是西藏人民回到祖國「懷抱」之前西藏人民何在？顯然中共在文件的潛台詞(Behind the Line:隱藏在話語背後的意義)是在指責外國帝國主義侵略以及當時西藏部份上層貴族和喇嘛，夾持西藏人民進行叛亂的，所以才會用「西藏人民」的字眼；

(三)中共政權在建立的過程中，從未與其他地區或民族簽訂過類似的協議，那是因為其他地方、其他民族並沒有類似的叛亂，何況在民國時代也承認「西藏、蒙古」是不同於內地其他地方政府的省，所以在中華民國憲法中，特別稱之為「地方」不稱省。

至於作者稱西藏施行民族區域自治從一開始就是「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這是對「一國兩制」的誤解：

(一)「一國兩制」是承認兩種不同制度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合法運作為前題，而十七條是改造西藏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為目標；

(二)「一國兩制」承認的差異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而非西藏原先的「封建農奴制」(按中共說法)。換言之，社會主義不可能與封建農奴制並存，所以中共對西藏地區所施行的管理政策只是「高度自治」而非「一國兩制」；

(三)中共提「一國兩制」主要是運用在長期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的香

港、澳門和台灣，為消除取為統一和對社會主義的誤解而設置的制度。這與西藏自 1965 年已社會主義化的地區自然不同。達賴喇嘛的「一國兩制」要求，從中共角度來看已是為了復辟舊制，因此絕無實行的可能。

至於「高度自治」的實踐評估，則中央與地方之間一直是有爭議的，再如「十七條協議」第四、五條規定，西藏原地方政府的領導職位和權利，但第十二條也規範他們的義務是脫離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從這些規範來看，至少在班禪喇嘛和阿沛·阿旺晉美二人對他們的照顧部份，中共並沒有違約，但是對於其他參與動亂的舊西藏統治階層，對中共而言，因為他們違反了第十二條，所以中共並沒有違反其協議。另外作者認為「十七條協議」沒有規定期限，因而是永久性的協議，假如作者的認識為真，則中共也完全可以依據現行的治藏政策來說明他們一直是按「十七條」辦事，問題在於西藏的社會主義改革過程中，舊西藏的貴族和喇嘛破壞了協議、製造動亂才導致達賴喇嘛出走，因為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共和西藏地方的領導團體都不是很滿意「十七條」，是以雙方均有破壞、違害的動機和理由，片面指責一方是破壞協議只是敵對立場的再現，而不是公允、客觀的說理。

其三、從黨委書記和民族自治：作者在這一段的文字中，特別比較了熱地和郭金龍⁴⁴的出身入黨和為官的經歷，以說明中共對藏人的不信任，這一種應該是達瓦的反駁中立論最具說服力的一段。因為在治藏工作上，不論中共晉用多少藏族幹部或是提拔幾位藏人成為國家領導人，這些藏族幹部、領導沒有決策權，那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信任，特別是對中共自己培養出來的農奴子弟的不信任，則是對中共自己治藏政策的侮辱，只有當真正的少數民族可以擔任自治區的第一把手，有時才真正代表了中共民族政策成功、民族團結、民族平等理想目標的達成。

其四、是對藏語藏文使用的駁斥：按作者的說法是「80 年代是有限度允許發

⁴⁴「熱地」原西藏區副書記，現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金龍」為西藏區黨委書記。

展」，89年以後成為「抽象提倡而具體打壓、削弱的政策」，然而就在同一文章的後面又描述「西藏各學校的數、理、化教材則是到90年代才完成翻譯的」，又說中共于80年代以來所提出的「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的實行細則」，竟然試行了十四年到2002年才修訂為「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規定」。其中，「修訂」最多的就是對強調藏語文使用的具體辦法做了許多變通⁴⁵，這種說法就使人有些不知所云，不知道作者所指責的抽象提倡而具體打壓削弱的政策所指為何，至於中共一直在西藏推行漢化教育「把西藏孩子轉到中國內地各城市的西藏中學」去就讀，這是事實，然而統一國家下的教育政策，這應該是十分自然的事，關鍵在於中共也出版藏文報紙、藏文書籍，在西藏實行雙語教學，在公文上要求漢、藏文並用，要求入藏漢民幹部學習藏文藏語這也是事實⁴⁶。藏族人民自身最希望自己的小孩到內地上中學這也是事實，因為這樣才有前途，而中共政府則要求學成之後必須回藏任職，所以這並不是隔絕傳統文化。至於私人開發的藏文學校遭到關閉，一方面是中國大陸教育尚未開放私營，其次當然是因為中共認為這種藏文學校有政治動機，試問私人在西藏地區開藏文學校會有市場嗎？藏人會繳錢去學藏文嗎？其實任何反駁都必須以全部客觀事實為依據而不宜選擇性局部事實為論據，不能有選擇否則就沒有說服力。

第五節 中共藏族自治區之綜合評估

中共治理少數民族的方式是成立「民族自治區」，西藏地區自1965年成立藏族自治區迄今近四十週年，是以中共國務院發表白皮書以評估其政策，從公共政策的角度來看，無寧是可以理解的做法，然而政策評估從評估的方面來看，

⁴⁵ 同註 16

⁴⁶ 趙貞、徐紅雲，〈我區公安邊防官兵學藏語、用藏語促部隊建設〉，西藏日報第五版，2004年8月9日。

可以有內部評估和外部評估。內部評估具有對政策的目的、精神、初衷和價值，具有比較深刻的理解，倘能公平、客觀，則對政策的推行、效果和過程均能準確地指正迅速加以調整，但也容易產生不客觀、不公正的弊端；外部評估理論上是講究客觀、公正和全面，然而也會受到立場資訊和局部觀察的影響⁴⁷。是以單一的評估方式必然存在無法客觀、公正的問題。而中共的白皮書和達瓦才仁的批判正好突顯了政策評估兩極化的現象，政策評估的種類來看，則可以區分為方案評估、過程評估、誤差評估及效果評估四種⁴⁸，而中共的白皮書和達瓦才仁的批判主要取向是效果評估，以效果評估來看，則學界可以依據「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及「政策回應度標準」，但是我們在對中共民族自治區政策評估時，除了經濟部份之外，其他數據的獲得並不容易，是要進行上述的評估並不容易，因此目前我們只對西藏的民族自治區政策進行「政治效果」、「經濟效果」、「社會效果」的粗略評估，而此種評估的方法是先行確定政策目標，再以目標來觀察現狀，如果現狀和目標接近就是有效益，反之就是無效益，當然在此種評估之後，也還可以區分為長期效益和短期效益、直接效益和間接效益、宏觀效益和微觀效益、有形效益和無形效益之分⁴⁹。所以本文只能以粗估為度，而評估的方式是以質化方法為主。所謂質化評估是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共自己的文件為依據來對照和評估：

從「政治效果」來看：如果說中共治理西藏的目標是建設一個社會主義新西藏，促進中國境內民族團結，當然主要是藏漢民族的團結，如果以此為目標，個人的評估是「有進步、欠信任」：從進步方面而言，首先此一白皮書開始對中國元朝以降的各個朝代對西藏地區的治理關係願意提出相對積極的評價。白皮書中說「自西元13世紀西藏成為中國領土一部分以來，中國的元、明、清、民國等歷代中央政府在規定西藏地方行政機構、決定和直接處理西藏重大事務的

⁴⁷ 沈函剛，〈政策學〉，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年，頁414。

⁴⁸ 呂昌偉，〈政策評估的有關問題〉，2004年5月13日。

資料來源：<http://house.focus.cn/fviewmsg/966/12573259.html>

⁴⁹ 同註23，頁428。

前提下，基本保持當地原有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統治機構，廣泛任用當地僧俗上層管理地方事務，給予西藏地方政府和官員較大的自主權。這在歷史上對於維護國家統一發揮了積極作用。」相同的描述在1992年9月中共所發表相關西藏議題的第一份白皮書：「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中，只說「十三世紀中葉，西藏正式歸入中國元朝版圖，自此之後，儘管中國經歷了幾代王朝的更替，多次更換過中央政權，但西藏一直處於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⁵⁰。」然後一直的光明面都是歸功於中共政權之後，先後兩種的寫作是從否定他人中肯定自己轉而成為「不完全否定他人而肯定自己」，這是中共面對自己中國歷史的一種開放心態的表現。對西藏歷史過去一直是給予「最封建、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⁵¹」的「四最」評價，新世紀以來中共政權對西藏歷史的「四最」評價已經完全看不到了，對達賴喇嘛以往一直的評價都是達賴的言行表明，他並不像自己所聲稱的那樣，僅僅是一個宗教領袖，而已成為在國外長期從事分裂祖國活動的政治頭目。而新世紀以來中共的官方文書中，同時有了達賴或達賴喇嘛的稱呼，雖然在對達賴喇嘛的政治定性、定調方面沒有改變，但在文字已經有了差別，面對以上的變化我們以為假如不是中共對自己的治藏成效有了信心，則不可能在文件出現上述比較理性、和緩的變化。其次我們細讀白皮書也可以發現中共在治藏政策的論述背後存在一種「現代化」途徑的基本預設，從政治變遷方面來看是從「十七條協議」而「民主改革」到「自治區建立」；從經濟發展方面來看，則是「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新措施，再到「加快援藏建設」的作為，其背後預設的就是一個民主法制的政治發展的邏輯，此一過程一方面固然是治藏政策的發展過程，而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和平解放之後的西藏的現代化變遷，此一變遷的成效乃是中共對治藏工作越來越有信心的根源。其三從文件的結束語來看：以1992年的白皮書來說，「因此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漢族和其他民族絕不會答應，藏族人民也絕不會答應。」這是一種愛國主義的

⁵⁰ 同註13。

⁵¹ 同註13。

訴求是一種警語，是一種以戰止戰的訴求。而今(2004)年白皮書的結束語則是對達賴喇嘛和平的呼籲、建設性的呼籲，當然這些呼籲仍然包括了「愛國主義」的因素，不過已經從對抗、排斥轉而成為參與和邀請，除了以上因為治藏成績的進步而彰顯的信心之外，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中共對藏人的不完全信任，首先是通篇在討論藏族歷史、現況時，仍然以「愛國主義」為主要的訴求，而不能尊重藏族自身的歷史的光榮傳統和藏族文化、宗教的特殊性。

換言之，中共在面對少數民族自身的成長歷程中，仍然只有統一國家視野之下的少數民族，所以少數民族的歷史邏輯是以對國家統一的貢獻作為歷史邏輯來發展，此一歷史觀是片面的、是漢族中心和漢族主觀主義的產物，是以並不全面、並不完整，而且最重要地是不能真正呈現出對少數民族的尊重和平等，因而中共的歷史邏輯中，也就欠缺漢族與少數民族交流的歷史，沒有這樣的歷史教育便無法使漢族真正放棄其心理上漢族沙文主義，建立真正種族平等，相互尊重的漢民與少數民族的關係。其次也因為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缺乏真正的對少數民族的尊重，因此也就對少數民族幹部無法真正信任，則一切的民族平等的價值和民族團結的目標，則必然都是以民族同化為途徑和方法，因此在政策上也就表現為中共給的很努力也很有誠意，不過其政策的目的只是為了同化，於是提高藏族或少數民族的水準，就會給人一種消滅差異的感覺，而消滅差異的背後，其實是一種「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的恐懼。於是所有現代化政策的目的就會逐漸從協助藏人現代化為主，而蛻變為為了消弭全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為目的。如果發展西部、開發西部是為了彰顯漢民統治的公正和公平，消除漢族統治的危機，則必然無法真正地、真心實意地尊重少數民族的發展方向和意願，於是一切的发展就必然以愛國主義來動員來號召。其三由於中共對藏族和其他境內少數民族的不信任，所以中共就必須不但以藏族幹部在數量來證明藏族自治區內藏族「人民當家作主」的證明，然而諷刺的是中共的政權制度上，區、地方、縣、鄉「人大」中藏族代表所佔的比例，「人大」常委、區主席、自治州州長、縣長所代表的意義只是「當家」，而中共沒有公布的區、

州、市、縣、鄉各級的黨委書記是什麼族呢?各級書記在中共體制中，才真正是作主的，事實上，以共和為政體的國家，如果有一部份非黨員、非漢族就自然地排斥在「作主」的行列之外，甚所表現的政治運作正好就不是「共和」政體，是違背了「共和」的精神。

從「經濟效果」來看，中共治理西藏的目標自然是促進西藏的現代化，是以西藏參與「西部大開發」構想和一系列的開發政策，也就是必要而且必需的，以這方面不論是經濟建設或是環境保護在中共中央的立場都是盡心盡力，至於在推行過程中出現的大量漢民族移入經商，以及環保生態的問題等應該是現代化發展中必經的過程和趨勢，推行層次的偏差，而中共提出的數據也都能證明他們所作的努力，不過中共當局理應注意到西藏的經濟發展不論人為努力和投入多大，都很難與東部省份並駕齊驅，而所謂現代化的效益總不宜只是和歷史的西藏相比，而永遠無法和鄰近的省份以及中國大陸其他的省份相比來作為藏區現代化的成就。果如此，那麼若干年之後，縱使西藏的經濟發展優於現在更多、更好，也可能代表中共治理西藏政策的失敗。當然中共不會如此認為，因為他們在白皮書中，已經有了預設性的說明「西藏社會發展的歷史起點低、基礎差，加上高寒缺氧、自然條件惡劣，西藏的現代化發展程度與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至今仍然是中國比較落後的地區。」然而以個人來看，這便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如果西藏地區是中共所謂的世界的第三極(除南、北極之外)~~地球的屋脊、世界最高的地區，面對此一特殊的地區，如何可以採用與其他地區在開發中相似、相同的策略呢?換言之，中共在思考如何發展藏區尤其是青藏高原這樣的地區時，原本就應該在特殊性放置在普遍性之前來思考，如果中共在「西部大開發」中是將普遍原則優先於特殊地理來考慮的話，那麼在西藏的建設和經濟發展必然是一種短暫的效益、有形的效益，這就是說西藏地區要不要發展、應不應該發展，立足在西藏地區的藏胞而言，這是不必討論的、必須討論的，必須由官方和西藏地區人民共同來討論、來決定的是西藏地區的特點為何、具有何種特殊性，在發展的目標下，雙方如何分工、如何

互補，甚至是在世界高原其經濟發展的途徑應該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中共必須以開放的心態廣邀在外地的藏族學者及海外的藏族學者及西藏地區的藏民代表、宗教代表等共同協議、一同協商，尋找一條高原經濟發展的獨特道路、獨特的指標，而不以其他地區的發展作典範，例如中共目前的構想將對西藏的發展，從拉薩轉為日喀則，日喀則為海拔三千八百公尺的高原城市，如果中共的目標是將日喀則建設成為西藏自治區的第二個拉薩，那樣有意義嗎？能否考慮將日喀則建設和發展成為一個西藏式的、純藏族風格式的高原城市呢？這些難道不值得思考嗎？所以對西藏的經濟效益而言，個人的評估是「短期效益顯著，長期尚待觀察」，如果中共在有信心之餘，引進藏族海外專家、學者來共建西藏，相信必然有助於西藏議題的解決，用中共熟悉的語言來描述，那就是「統戰」，恐怕下一階段中共治藏經濟效益就決定在中共「統戰」的手段。

從「社會效益」來看：社會在本文中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概念，是政治效益、經濟效益之外的所有的效益而言，比較突出的是指藏漢人民的關係，藏族文化、語言、宗教保存和發展，按中共在白皮書中第三段末第四段「西藏人民在社會發展上享有物質文化、生活與醫療衛生條件提高的發展情況」以及西藏人民享有繼承發展傳統文化和信仰宗教的自由，中共中央所作的大力投資，確實可以看到中共的努力，其效益如何呢？根據今(2004)年6月中新社特別從華盛頓發回一則新聞「許多美國人由於對西藏不瞭解，或受到片面報導的誤導，對西藏有很多偏見。美國三藩市彩虹電視在五十個申請者中，選擇了兩個原先支持“藏獨”的美國人：摩基和凱蒂，作為拍攝對象，讓他們親身感受西藏，瞭解西藏的真實情況。攝製組跟隨他們去西藏，以“影像日記”的方式，真實記錄他們在西藏的活動。這個一小時的節目完全以第一人稱由這一男一女自己講述個人的經歷和感受，沒有附加的解說。出發之前，他們在彩虹電視的演播室裏談起對西藏的感覺時，或擔心中國官方淡化、同化、消滅西藏文化，或對西藏獨立活動表示同情和支持。兩個星期的旅程結束後，且聽兩人現身說法。摩基說：

“來西藏之前，我覺得西藏獨立是天經地義的事。到了西藏與許多人交談之後，

我不覺得西藏人想要獨立。” “我給去西藏參觀者的忠告是：帶一個開放的思想來，放下你固有的西藏觀念。我意識到美國媒體確實很片面。我是用了近兩周的時間才開始讓自己放下抵抗心理，聽取不同意見。” 凱蒂說：“我們與很多西藏人交談過，他們很喜歡西藏今天的變化。在美國時我聽說西藏要求獨立，中國的侵佔很血腥。但是與越多的人交談，我越瞭解到，西藏人實際上很感激中國政府帶給西藏的變化和進步。在教育方面，西藏人在學藏文、中文和英文。我很欣喜他們仍在學藏文，以保持藏族文化⁵²。”」新聞用語十分清楚，希望以此來說明中共治藏以來所獲得的社會效益，個人也曾在公元 2000 年暑假和今(2004)年夏天兩次入藏大致的感受，應該與舊金山電視台記者的印象十分類似，從拉薩八角街的變化、布達拉宮的修繕和寺外廣場的整修、週圍商場的規模、城外藏人住房的建築等等，應該說前後變化是十分明顯的，在拉薩街道佇立也可以發現過往的藏人和漢民絕大多數的人都佩掛手機、衣著時髦，事實上與內地中，大型城市的人民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在寺廟仍然看到川流不息的信徒和觀光客以及端坐在角落的僧侶認真地背誦經文，在路上尤其是山路上，偏僻車少的道路，偶然也遇到磕長頭的信徒，虔誠的信仰，一切都和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攻擊有著明顯的落差。流亡組織說中共片面承認的十一輩班禪喇嘛藏胞不信，然而我個人在青海、在西藏時，十一輩班禪喇嘛正好去青海和日喀則，藏族擁護的熱情和虔誠的尊敬也和流亡組織所宣傳的完全不同，那麼真正效益究竟如何呢？個人以為個人和舊金山電視台僅僅二週的觀察，也存在著片面性，走馬看花不夠深入，以表象來論斷是有不夠深入的缺點，不過「西藏之頁」(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網站)的種種宣傳也存在著個別指證、局部採信以及立場解釋的偏見。客觀而言，中共多年來以經濟發展來化解藏民對文化大革命的怨氣，具有一定的效果。立足在此一效果上，都市的西藏青年開始產生自立意識，他們的信仰已不如他們的父兄一代，西藏人民生活的改善、生活習慣、風俗習性

⁵² 「〈西藏日記〉獲美國主流電視獎」，中新社華盛頓電，2004 年 6 月 9 日。

資料來源轉引自人民網：<http://unn.people.com.cn/GB/14799/21813/2558688.html>

的變化也是十分正常。這些本來就是現代化的一部份，然而經濟繁榮之後，鄰近省份十分敏感的漢人自由的遷入，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生活文化也深刻的影響了在地的藏人，有人排斥、有人模仿，原來的文化自然隨之改變，這也是事實。文化本身的存在和發揚所依賴的就是文化自身的適應能力，政權的力量可以對文化的發展方向，是有促進和阻止兩種作用，而共同之點在於文化的發展往往不以政權領導個人意志所左右。換言之，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摧殘，或是流亡組織片面詛咒中共政權的行為，而西藏文化仍然以其茁壯的生命力不斷地發展，西藏文化是藏族的自然財富，中共無法去改造它但可以影響，西藏文化是藏族人民共同的智慧結晶，達賴喇嘛可以是其中的代表但無權獨佔。換言之，不論是中共當局或是達賴喇嘛都應該欣賞藏族文化的變遷，藏族文化必須是屬於藏族人民，藏族人民自然會在改革、開放或現代化的變遷之中，篩選有價值的文化加以保存和發揚，中共政權長期以來一直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階段論將包括藏族、漢族在內的所有民族歷史文化視為封建的、落後的、腐朽的、反動的，幻想以政治暴力可以重塑、移植所謂馬列文化，其結果是失敗的。因此時至今日不得不重新提供「中國特色」，而且強調外國制度文明決不照搬只可以參考，如果這是代表了當代中共領導對固有文化的覺悟，則此一覺悟也適用其少數民族的文化，這些少數民族而對漢族文化何嘗不是只須參考，不能照搬，藏族與漢族的文化差異更大，尤其不可以迷信改造，而必須尊重，才能使藏族自覺地希望去學，即使漢族不來教也同樣會去學，如此就是合而不同，平等相處。達賴喇嘛流亡組織長期只是攻擊中共破壞藏族特殊的文化，而完全無視於中共和西藏人民在保存、整理、發展西藏文化方面的努力，此種文化獨佔心態，正好印證了中共所詬稱的達賴喇嘛流亡組織是想恢復傳統以貴族、喇嘛和統治階層的西藏文化，這是不可能成功的「抗暴運動」，也是無法期待的「獨立」目標，即以達賴喇嘛比較有把握的宗教為例，藏傳佛教在目前藏族青年、青少年人口中信仰的流失和變化，我們就很難認定是中共摧毀宗教的結果或是西藏現代化的結果，無論如何「信仰」在藏族人民的價值觀已

經出現明顯的變化，這一現象相信縱使目前的西藏是由達賴喇嘛來推動西藏現代化也是同樣會發生，因此從社會效益的角度，現階段中共的努力應該是大於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努力，達賴喇嘛流亡組織企圖以宗教力量、民族情感來激勵藏人反對中共、反對漢族，個人以為在個別的寺院、個別的喇嘛和信徒身上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廣大的藏人似乎其效果在遞減而不是增加。反之，中共只企圖以經濟建設、經濟發展和若干樣板式的藏族幹部來證明其治藏政策的成功。那麼目前遊客、短期訪問的學者、記者在西藏街頭和鄉村所看到的平靜、和諧、團結就可能只是一種表面的暫時假象。一旦藏人富裕到一定程度或藏族知識青年有了不被真正信任的覺悟，則目前的發展和繁榮就有可能出現變化。總之，不論是中共當局或是達賴喇嘛流亡組織都不能不以藏族的主體性來思考西藏地區的未來，對達賴喇嘛必須建構一套新的論述，而這一套論述不能是簡單的反共反華，更不是抄襲西方民主所蛻變的流亡式民主，而是在藏族文化與漢族文化、西方文化對話之中產生新論述，才合理地指出西藏變遷的方向。這才能重新領導藏人面對希望的未來。對中共而言必須放棄民族政策中以同化為團結的唯一基礎，改以創造和擴大少數民族文化市場來促進民族團結，使統一的國家成為民族文化平等交流的場所，鼓勵甚至強迫所有的國民必須能使用漢語之外的另一種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此一基礎上的團結才是自覺的團結，帝國主義真正無法離間的團結，有了此種社會效益，中共的民族政策才是真正的成功政策，真正處理民族問題，解決民族糾紛的典範。

第六節 小 結

中共在西藏議題上自上世紀九〇年代以來，已經發表了六篇白皮書，對於完全闡明中共的治藏政策和成績已經提供一定程度透明，各方的反應相信也在中共當初預估的範圍之內，然而西藏議題在國際上並沒有完全緩和，這裡固然

有帝國主義反華的陰謀，然而中共政權過份相信經濟發展可以加強民族團結，教育普及、科學發達可以消滅宗教信仰的意識型態相信才是問題的真正根源，假設經濟發展就能解決民族獨立，那麼加拿大國便不應該有魁北克的問題，假如科學教育的普及就能消滅宗教，那麼教宗和寺廟在西方富裕世界早就應該絕跡，中共必須清楚而嚴肅地承認漢民族不能獨佔中國的發聲和話語權，必須保留少數民族自己發聲的時機和場所，依靠這些聲音來制定政策，才是真正的自治，這才是聯合少數民族的人民反對分裂，最堅強的依靠和最穩固的力量。

其次在西藏議題上，中共必須改變傳統的「西藏觀」，在一脈相承的基礎，重建一套與時俱進的「西藏觀」，才能真正的心悅誠服地欣賞西藏的人文和傳統優美的一方面，漢民族曾自豪自己擁有從未中繼的文化和歷史，那麼西藏的文化除時間上稍晚千餘年之外，其餘均是雷同，藏族對自己的文化何嘗沒有一份自豪感，中共必須尊重而且提倡藏民族這種自豪的權利，中共在倡導「中國特色」中必須誠心誠意地將藏族及其少數民族的文化的特色加以吸納、加以尊重，才是一個完整的、活潑的、競爭型的、開放的「中國特色」，使藏人在中國特色中發現藏族的圖像，發現到藏族自己所熟悉的文化和價值，這樣的「西部大開發」才能從單向的漢民族去指導，幫助西部地區和少數民族的開發和發展，轉而成雙向地也使西部的人文景觀和民族文化的價值，也同時開放了漢民族的心靈發展和豐富了漢民族的文化，所以中共在下一階段的開放所強調應該不僅是「西氣東送」「西電東輸」等有形的投資效益，而應隨著物質文化的「西部大開發」，從而產生對西部精神文化的再認識、尊重和欣賞，開展中國史上的第二次的西天取經，以東部繁榮西部，以西部豐富東部。

第四章 西藏經濟現代化歷程之評述

第一節 前言

中共自 1951 年開始統治西藏，其目標便是使西藏社會主義化，如何使西藏社會主義化呢？從歷程來看，先是「和平解放」，之後是「民族自治」，成立「藏族自治區」，其後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方式，企圖帶領西藏從中共所謂的「最黑暗、最封建、最落後、最野蠻」的狀態一下躍進社會主義時代，當然事實證明中共的作為並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因此到了 1980 年中共所統治的西藏並沒有擺脫黑暗、封建、落後和野蠻。從黑暗來看，中共的統治在八〇年代以前既沒有物質的建設，更剝奪了藏胞的精神依靠。從整體來看，藏民雖然從西藏原來的貴族、僧侶、地區的封建統治解放出來，但是進入了中共黨的統治之下，少數的藏人翻身當上幹部，大多數的藏胞仍是被統治者，西藏地區的發展也是全大陸最貧困的地區，中共自己的文件⁵³也都證明了一切。因此藏族學者才會說「烏鴉笑豬黑⁵⁴」。八〇年代後中共自己施行了「開放改革」政策，一切才開始出現若干變化，顯然中共一開始以全國一盤棋的統一佈局的作為是不利於西藏的發展，西藏具有自己特殊性，在開發的策略也必須以特殊性高於普遍性的方針為宜。

⁵³ 班禪喇嘛，〈十世班禪的七萬言書〉，西藏之頁之文獻與檔案庫；

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books/qiwan/index.html>

⁵⁴ 才嘉，〈中共的白皮書與西藏的真實狀況〉；

資料來源：<http://www.asiademo.org/2002/03/20020305a.htm>

第二節 西藏的基本情況

一、民族⁵⁵

西藏自治區是全國藏族居民最集中的地區，占全國藏族人口的45%。除藏族外，西藏自治區還居住有門巴族、珞巴族、漢族、回族等民族以及夏爾巴人等。藏族是西藏的主要居民。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分為衛藏、康、安多三個方言區。藏族以農牧業為主，城市居民多從事手工業、工業和商業。藏族人信仰藏傳佛教，熱情開朗，能歌善舞。藏族歌曲悅耳動聽，唱時伴有各種舞蹈。藏族的衣著，上身穿綢、布長袖短衫，男子外著寬肥的長袍，女子著無袖長袍，腰間繫帶；已婚女子多在腰間繫系一條圖案似彩虹的圍裙。男女都蓄辮，喜戴首飾；在不同地區，服飾裝束上有差異。主食以糌粑（用青稞或豌豆炒熟後磨成麵粉）為主，喜喝酥油茶、奶茶和青稞酒，愛吃牛羊肉，但不食奇蹄類獸肉。古代居住在西藏高原的人曾實行土葬，現在的藏族人盛行天葬、火葬和水葬。門巴族是居住在西藏高原的古老民族，主要分佈在西藏自治區南部的門隅地區，有一部分散居在墨脫、林芝、錯那等縣。門巴族的語言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門語支，方言複雜，無文字。門巴族人多通曉藏語，通用藏文。門巴族以農業為主，兼營畜牧業、林業、狩獵和手工業。門巴族男女均穿紅色氍毹長袍，頭戴褐頂桔黃邊、前部留有缺口的小帽或黑粗毛氍帽；婦女戴手鐲、耳環等裝飾品，男子腰間掛砍刀。男女均嗜好喝酒和吸鼻煙。食物以大米、玉米、蕎麥、雞爪穀為主。門巴族人大多信仰藏傳佛教，在一些地方也信仰原始苯教。多水葬，也習土葬、天葬和火葬。珞巴族主要分佈在西藏自治區東南部的珞瑜地區，其餘散居在米林、墨脫、察隅、隆子、朗縣一帶。珞巴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沒有文字，基本上是使用藏文。珞巴族主要經營農業，尚竹編。

⁵⁵ 〈藏區民族及分佈〉，西藏之友/西藏概況/藏區民族即分佈；

資料來源：<http://garden.2118.com.cn/Wangxd/xzgz06.htm>

男子一般喜穿羊毛織的長到腹部的坎肩，帽子係用熊皮或藤條製成的帶沿圓盔；女子穿圓領窄袖短衫，下身為略過膝部的緊筒裙，小腿繫整片裹腿。主食以玉米和雞爪穀為主，也吃大米和蕎麥。

現在居住在西藏的回族人口，多數是清代從甘肅、陝西、青海、四川、雲南等地遷來的回族後裔，少數來自中亞一帶。主要分佈在拉薩、日喀則、昌都等城鎮；多數從事商業、手工業及屠宰業。使用藏文，也使用漢文；宗教上使用烏爾都文和阿拉伯文。信仰伊斯蘭教，在拉薩等地建有清真寺。

二、地理面積與特徵、自然條件

(一)自然條件⁵⁶:

目前西藏自治區土地總面積為 120 萬平方公里，占中國大陸全國總面積的 12.5%；占西南地區的 51.3%；2002 年，全自治區人口為 270 萬，占全國的 0.2%。

西藏自治區東隔金沙江與四川省相望，東南與雲南省山水相連。西藏與印度、緬甸、不丹、錫金、尼泊爾及喀什米爾等國家和地區接壤的邊境線全長近 4000 公里，西藏自治區與上述幾國和地區有傳統的經濟交往，其與上述幾國和地區的傳統通道有 200 多個；與印度、尼泊爾正式開通的口岸有 4 個，其中國家二級口岸有兩個，從日喀則的亞東到印度加爾加達往印度洋的出海口路上的最短里程為 1500 公里，也可經印度、孟加拉尋找其他出海口。西藏自治區高寒缺氧，地廣人稀，區內差異性大，交通十分不便，封閉性強，西藏位於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青康藏高原的主體部份，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其中海拔超過 4500 米以上的面積占 65%，具有「世界屋脊」之稱。西藏沒有水運、沒有鐵路，公路是西藏與內地連接的主要通道，特殊的自然環境和落後的交易條件使西藏自治區長期處於相當封閉的狀態。

(二)資源⁵⁷:

西藏地下礦藏豐富，目前已發現 90 多種礦產資源，已探明儲量的有近 50

⁵⁶ 曹陽，〈大西北開發與西藏〉，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第十卷第六期，民國 90 年 11 月，頁 62-64。

⁵⁷ 同註 4，頁 64-65。

多種，鐵、鉻、鋰、銅、硼、菱鎂、重晶石、砷、白雲母、石膏、陶瓷土、泥炭等 11 種礦產儲量居全國前五位。

西藏是中國大陸江河湖泊數量最多的省區之一，江河流域面積大於 1 萬平方公里的有 20 餘條，地表水資源總量約 4482 億立方米，天然水能藏量為 2 億千瓦，約占全國的 30%，其中可開發的水資源 5659.27 萬千瓦。

西藏地區地熱資源居全國首位，地熱顯示點有 600 處，在調查過的 169 個熱田和水熱區中，溫度高於 80 攝氏度占 22%，熱泉出口最高溫度為 95.5 攝氏度，多數接近或超過當地的沸點。

全區林地面積 1.9 億畝，活立木蓄積量 20.84 億立方木，是中國大陸森林面積最大的省區之一。

西藏植物資源豐富，常見的主要樹種有雲杉、冷杉、鐵杉、高山松、青杠木等。稀有針葉樹有穗花杉、雲南紅豆杉、印度三尖杉、百日青等。全區有藥用植物 1000 多種，主要盛產蟲草、紅景天、貝母、天麻等。

西藏水產資源豐富，約有魚類 60 多種，其中鯉科的裂腹魚和亞科的魚類占多數。

第三節 西部大開發前的開發構想

一、第一次西藏工作會議

八〇年代中共政權出現了巨大的變化，鄧小平主張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策目標取代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這使得全大陸的發展方向出現了巨大的調整，但是當時遠在中國邊境的西藏並沒有感受到此一巨大的變化。

1980 年 3 月 14 日、15 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了西藏工作座談會，四月發出「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提出「西藏自治區的中心任務和奮鬥目標是：以藏族幹部和藏族人民為主，加強各族幹部和各族人民的團結，調動一切積

極因素，從西藏實際情況出發，千方百計地醫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創傷，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學水平，建設邊疆，鞏固國防，有計畫有步驟地使西藏興旺發達，繁榮富裕起來⁵⁸。」同時也將原來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的說法加以糾正，然而中共的黨主席胡耀邦在1980年5月在西藏考察時，驚奇的問：「是不是中央這麼多年給西藏的資助都丟到雅魯藏布江去了？」在西藏考察期間，胡耀邦向西藏人民承認：極左路線嚴重破壞了黨的少數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一戰線政策等，給藏族人民帶來了許多苦難。同時，胡耀邦決定採取措施改變西藏的現狀和發展經濟⁵⁹。此次的西藏考察胡又訂下了六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第二件大事，從西藏相當困難的情況出發，要堅決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減輕群眾的負擔；

第三件大事，要在所有的經濟政策方面，對西藏實行特殊的靈活政策，便於促進生產的發展；

第四件大事，要把國家支援西藏的大量經費，用到發展農牧業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方面來；

第五件大事，要在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前提下，大力地、充分地發展藏族的科學文化事業；

第六件大事，要正確執行黨的民族幹部政策，加強藏漢幹部的親密團結⁶⁰。

同時確立了「放：放寬政策、免：免徵農牧業稅收兩年、減：減輕人民群眾的負擔、保：保證必要提供」四大政策⁶¹。在胡耀邦的關心過問之下，中共治藏政策才開始真正的正常化，西藏經濟才開始出現活力，其後幾年西藏地區出現重大自然的災害，對西藏發展而言是十分嚴重的考驗，所幸寬鬆的政策和中共中央輸血式

⁵⁸ 丹增、張向明主編，〈當代中國的西藏(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頁396。

⁵⁹ 茉莉，〈【紀元專欄】茉莉：嘉樂頓珠與胡耀邦〉，2002年7月8日；

資料來源：<http://www.epochtimes.com/b5/2/7/8/n201049.htm>

⁶⁰ 同註6，頁397。

⁶¹ 同註6，頁406-407。

的補助，中共的資料指出「中央根據西藏的實際情況和國家的經濟情況，加大了西藏的援助，並相應制訂了對於西藏的各種優惠政策。如年均定額補助增加到4.96億元，各種專項撥款0.9億元，基本建設投資2.622億元⁶²。」以及在西藏特別實施的兩個不變：「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中共中央的援助和特殊政策，使西藏出現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現代工業和交通設施，為現代化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⁶³。胡的關心和指示使得西藏的黨政領導也受到壓力，開始實行一連串寬鬆的政策，這才奠定了日後西藏地區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基礎。然而胡的政策思想在用心上是為了西藏的經濟發展，為西藏人民的生活改善，然而背後仍是以漢族的現代化觀點來指導藏族地區發展，則是後現代化發展上頗值得深思的觀點。換言之，胡的觀點仍是想改造藏區及藏族。

二、中共第二次西藏工作會議

1984年2月到3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此次座談會總結了1980年以來的西藏工作經驗，從認識論的角度對西藏的特殊性進行了一次「再認識」；從西藏的實際出發，對正在執行的方針政策進行了回顧，研究了進一步放寬政策，把經濟工作搞上去，讓西藏人民儘快富裕起來的問題。同時中央還決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四川、廣東等省市和水電部、農牧漁業部、國家建材局等有關部門，按照西藏提出的要求，分兩批幫助建設43項西藏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項目，包括電站、旅館、學校、醫院、文化中心和中小型工業企業。九省市為建設這43項工程共投入了1.9萬人，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完成了這些工程，為西藏提供了一些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項目。⁶⁴工程建設內容涉及10個行業，總投資4.8億元，總建築面積23.6萬平方米。援建方式被稱

⁶² 〈中國西藏基本情況系列專題十二(西藏新的援建項目):第一次西藏工作會議〉，中國西藏信息中心；資料來源：<http://www.tibetinfo.com/t/040727xzxdyjxm/20040200485125623.htm>

⁶³ 同註10

⁶⁴ 〈中國西藏基本情況系列專題十二(西藏新的援建項目):第二次西藏工作會議〉，中國西藏信息中心；資<http://www.tibetinfo.com/t/040727xzxdyjxm/20040200485125659.htm>

為「交鑰匙工程」，即從設計、施工到室內一切設備用具及管理人員的培訓等，均由承建單位包乾，竣工後交出鑰匙，即可投入使用，產生效益。43項工程基本滿足了80年代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旅遊業的需要，被人們譽為高原上的「43顆明珠」。比如拉薩飯店、西藏人民會堂、體育館等等，都是那時興建的。以社會公益為主的43項重點工程，極大地改善了西藏群眾文化場所條件和旅遊接待能力。除了各省的援助之外，西藏區政府也根據中央精神，發出「西藏自治區黨委關於農牧區若干政策規定〈試行〉」，立即宣布「第一條宣布免徵農牧業稅收延長到1990年。第二條規定土地、牲畜的承包期三十年不變，集體果樹、集體樹林、荒山、荒灘、荒地的承包期五十年不變，可以轉包。荒山、荒灘、荒地的開發性經營，允許繼承⁶⁵。」其後又在兩個不變的基礎上提出「一個解放」「兩個轉變」「兩個為主」「兩個長期不變」的方針。這些政策是指「“一個解放”就是要解放思想，放開手腳，一切從西藏實際出發，從有利于調動廣大農牧民和職工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出發，充分發揮西藏的優勢，勇於探索，擅於改革，制定適合西藏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凡是不符合西藏實際的、有礙於調動群眾積極性、不利於發展生產力的一切舊觀念、老套套，都必須堅決破除。“兩個轉變”一是要封閉式經濟轉變為開放式經濟，增強自身活力，逐步實現西藏城鄉經濟的良性循環；二是從供給型經濟轉變為經營型經濟，努力提高經營者的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益。”兩個為主”即按照西藏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群眾意願，在堅持土地、森林、草場公有制的前提下，實行以家庭經營為主，以市場調節為主的方針。”兩個長期不變”即牧區實行“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的政策，草場劃分到戶或聯戶經營管理。農區實行“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的政策，實行什麼樣的經營方式由群眾從自願選擇⁶⁶。」其後西藏的「實務」和「輸血」兩個政策的長期培育下，西藏經濟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中共說「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西藏農牧業經營逐步繁榮，城鎮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集貿市場興旺，商品

⁶⁵ 同註6，頁411。

⁶⁶ 同註6，頁412-413。

供應充足，廣大農牧民的衣食、住宿條件有了明顯改善。1989年全區國民生產總值21.1億元、國民收入16.7億元，分別比1979年增長了97.64%和324.36%(含中央巨額補貼);平均收入397.25元，比1979年的159元增長了149.8%⁶⁷。」在二次西藏會議之後，西藏的經濟發展開始有了轉快的發展，同時在對外開放方面，也有了比較大開放幅度，這就使得外界對西藏的滲透，西藏外界的接觸漸漸頻繁，於是原本潛藏的不滿，反而不斷的披露。1987年9月到1989年3月拉薩發生了多次暴動，參與動亂的藏胞打出「西藏獨立」「趕走漢人」的政治訴求，中共認為拉薩動亂肯定是帝國主義和達賴喇嘛集團聯手的「傑作」，自然採取軍事鎮壓的手段，此一事件對中共中央寬鬆的西藏政策確實是一大考驗。所幸動亂被鎮壓之後，中共進一步恢復「開放改革」的政策，才使得西藏的經濟發展沒有發生嚴重的中斷和倒退。不過1989年1月西藏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大師在日喀則突然去世，對中共而言，當時確實是十分棘手的突發事件，所幸中共依照清政府的前例，國務院於同(1989)年8月17日批准扎什倫布寺負責辦理轉世靈童的尋找和認定，代表了中共在宗教、民族政策上，也從原本的毛式共產主義政策中退却，這是從另一個側面代表了中共實行「改革、開放」的決心。

三、一江兩河工程：

繼1984年43項工程完成後，1991年國務院決定投資10億元，在「八·五」和「九·五」期間即20世紀最後10年內，綜合治理和開發西藏境內的雅魯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拉薩河和年楚河，該工程簡稱「一江兩河工程」。「一江兩河地區」是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又是西藏的腹心地區和糧食重要產區，被譽為西藏的「金三角」。工程的實施，增強了西藏自我發展的能力和後勁，對於推動其他地區乃至整個西藏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一江兩河工程」分為很多方面，大致說來，分為以下幾個部分：

1. 興修水利。新建、擴建幹渠36條，總長811公里；水庫12座，蓄水量4.6

⁶⁷ 同註6，頁468。

億立方米，新建提灌站 6 座，防洪工程 4 處，人畜飲水工程 3 處；實現保灌農田 103 萬畝，灌溉林草地 36.3 萬畝。

2. 築路造橋。建成雅魯藏布江澤當大橋和日喀則地區雅魯藏布江東嘎大橋 2 座，修建鄉村道路 1000 公里，大大改善了區內的交通狀況。

3. 農業機械。實施農業機械化，提高產量，減輕農民的勞動量，提高勞動效率。

4. 植樹造林。工程造林 93 萬畝，建成 3 個地市中心苗圃，育苗總面積 3647 畝；同時在雅魯藏布江和年楚河、拉薩河中下游沿岸建成 4 大防護林體系。生態環境有了改善，江河兩岸綠樹成蔭。

5. 糧油種植。改造中低產田 123.8 萬畝，新墾農田 10 萬畝，建成高產穩產田 47 萬畝，良種繁殖基地 7 萬畝。同時建成乃東、貢嘎、林周、墨竹工卡、堆龍德慶、曲水、江孜、白朗、拉孜縣和日喀則市等 10 個商品糧、油生產基地；以及山南、日喀則、拉薩 3 地是 2679 畝蔬菜生產基地。

6. 牧業興旺。人工種草 23.3 萬畝，改良天然草場 90 萬畝，建立草籽繁殖基地 0.65 萬畝，建成 5 個犛牛品種選育基地、7 個黃牛改良基地、4 個養豬場和養雞場。

在興建「一江兩河工程」的同時，國家還投資 8 億元，興建被列為國家能源「八五」計畫重點建設專案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電站。1997 年電站全部建成後，將從根本上緩解拉薩及周圍地區電力供應緊張局面；投資 10 億元對西藏的青藏、川藏、黑昌、中尼四條主要公路幹線進行整治和改建，以確保西藏經濟命脈公路運輸的暢通；投資擴建拉薩貢嘎機場，跑道已於 1991 年 9 月竣工，可起降波音 747 等大型客機；投資建設拉薩市郵政樞紐樓，新增程式控制自動電話 1.1 萬門，建成 47 個縣的 54 個衛星地面站及配套設施⁶⁸。一江兩河的投資基本是著眼于西藏基礎建設工程的強化，以有充裕的電力、便利的公路和航空交通的網路，保證西

⁶⁸ 〈中國西藏基本情況系列專題十二(西藏新的援建項目):一江兩河工程〉，中國西藏信息中心。
<http://www.tibetinfo.com/t/040727xzxdyjxm/20040200485130120.htm>

藏地區的後續經濟發展，為經濟發展奠基。

四、第三次工作會議：

1994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了加快西藏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方針、政策和措施，確定了西藏發展的任務和目標，作出了全國支援西藏的戰略決策，中央有關部委和15個省市對口支援西藏，確定援建62個重點建設專案。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了「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的援藏工作方式。1995年以來，大陸15個對口支援省市和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高度重視援藏工作，成立了由領導掛帥負責的援藏工作領導小組，設立機構，制定規劃，及時研究解決問題，與西藏建立了長期的對口支援關係，展開了形式多樣、成效顯著的援藏行動。有的省市將對口支援地區作為該省市的一個特殊地區，納入該省市經濟社會發展計畫，確定了西藏受援地縣與該省市同步進入小康的目標和措施；有的將西藏受援縣納入該省市的特殊縣予以扶持，確保經濟社會各項發展目標的實現；從資金、項目、人才、物資等方面不斷加大援藏力度。「15個對口援藏省市無償援建了576個建設項目，投資達22.4億元；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援建了140個專案，投資達9.2億元⁶⁹。」

此後，中共中央各各機關部委均將對口援藏列為該單位的重大任務，也動員全國同行業進行系統對口援藏。與此同時，15個對口援藏省市和中央、國家機關40多個部委按照「選優挑強」的原則，先後兩批共選派1268名幹部進藏工作。這些舉措的實施，使「對口援藏工作領域不斷拓寬，工作內涵不斷深化，投資力度不斷加強。」依據中共自己的資料稱：

「由中央13個部委、全國2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和6個計畫單列市共同援助西藏建設經濟和社會發展所需的62項工程，其中中央有關部門承擔30項，各省市承擔32項，國家投資重點建設了交通、能源、通信、農牧業、社會事業等

⁶⁹〈中國西藏基本情況系列專題十二(西藏新的援建項目):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中國西藏信息中心。<http://www.tibetinfo.com/t/040727xzxxyjxm/20040200485130234.htm>

一批基礎性骨幹項目于1995年陸續開工，並於2000年底全部完成。62項工程現在已全部建成並投入使用，這是中央政府為加快西藏自治區發展，提高藏族群眾生活水平採取的又一重大步驟。明顯增強了西藏經濟自身造血功能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給雪域高原260萬各族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實惠⁷⁰。」

經過中央的輸血救濟和兄弟省份的支援，中共在1998年的「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新發展」白皮書中說「1992年以來，西藏經濟快速增長。1997年，西藏區內生產總值約73.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91年增長96.6%，年均增長11.9%。1987年以來，西藏糧食生產連續十年豐收，1997年糧食總產量達82萬噸，創歷史最高水準，比1991年的58萬噸增長41.4%；肉類總產量達11.9萬噸，比1991年增長25.5%。目前，西藏自治區正在為實現2000年前在全區完成脫貧任務，使多數群眾達到小康的目標而積極努力。經濟的發展，使西藏城鄉居民的生活明顯改善。1996年，西藏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5030元，比1991年增長1.4倍，年均增長19%；農牧民人均純收入975元，比1991年增長48.3%，年均增長8.2%。1997年，西藏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達5130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1040元。西藏城鄉居民年底儲蓄存款餘額由1991年的5.1億元，增加到1997年的30.45億元。1996年，西藏人均佔有糧食372公斤，比1991年增長28%，在人口增長了約一倍半的情況下，人均佔有糧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長了2倍。1996年，西藏人均肉類消費48.6公斤，比1991年增長17.2%。1996年與1991年相比，城鎮居民人均消費蔬菜增長26%，消費食用油增長14.5%，消費蛋類增長1.1倍，消費糖果糕點增長3.2倍。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鄉居民家庭財產日益增多。農牧民家庭大都擁有數量可觀的生產資料，平均每戶農牧民家庭擁有的生產性固定資產價值達8000元以上。每百戶擁有汽車9輛，大小拖拉機6台，機動脫粒機3台，馬車12輛。在城鎮居民家庭中，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逐年增加。1996年，平均每百戶城市居民家庭擁有彩色電視機88台，黑白電視機6台，洗衣機42台，電冰箱50

⁷⁰ 同註17

台，照相機 46 架，摩托車 9 輛，自行車 222 輛，均比 1991 年有較大幅度增長。據舊西藏地方政府統計，1950 年西藏約 90% 的人口沒有自己的住房。現在，除少數牧區外，其他所有的家庭都有固定的住房。1990 年到 1995 年，西藏農村和城鎮居民住房面積由人均 18.9 平方米、11 平方米分別增加到 20 平方米、14 平方米。據典型調查，在「一江兩河」中部流域，有的農戶家庭存有夠吃一至三年的餘糧，有的鄉 90% 的農戶家庭蓋了新房⁷¹。」

第四節 西藏現代化發展白皮書之敘述

一、第四次工作會議⁷²：

2001 年 6 月 25 日至 27 日，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開了最高規格的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不但會議由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主持，而且七位常委委員到齊，江澤民在會中總結對西藏工作的六大經驗：

（一）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抓住發展經濟和穩定局勢兩件大事，確保西藏經濟加快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確保國家安全和西藏長治久安，確保西藏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指導方針；

（二）是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把全區各族幹部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上來；

（三）是堅持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西藏各族群眾中不斷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堅持和發展壯大愛國統一戰線；

（四）是全黨高度重視西藏工作，全國大力支持西藏工作，增強西藏各族人民對祖國的向心力；

⁷¹ 〈1998 年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新進展〉，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998 年 2 月。
轉引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5/content_630942.htm

⁷² 〈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人民日報 2001 年 6 月 30 日第一版；
轉引自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10630/500576.html>

(五)是深入開展反對達賴集團分裂活動和國際反華勢力滲透破壞活動的鬥爭，堅決維護西藏的穩定和祖國的統一、安全；

(六)是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加強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建設，為西藏的改革、發展、穩定提供堅強政治保證。

至於進一步做好西藏工作，則必須繼續解決兩大問題：

(一)是加快發展問題，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仍很繁重；

(二)是促進穩定問題，西藏面臨的反對分裂、維護穩定的任務仍很艱鉅。

在加快經濟發展方面，朱鎔基說：「我們要站在戰略全局高度，看待加快西藏經濟發展問題，增強使命感和責任感，共同努力，積極促進西藏經濟的振興和繁榮。基礎設施薄弱是西藏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必須加快鐵路、公路、機場、電力、通信、水利等設施建設。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形成既有優勢又有市場的支柱產業和特色經濟。鞏固和加強農牧業基礎地位，以調整農牧區和經濟結構重點，搞好農牧業綜合開發，千方百計提高農牧民收入。必須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快發展旅遊業，一定要把旅遊業作為西藏的支柱產業。認真實施「科教興藏」戰略，大力培養各類人才，大力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努力採用先進適用的技術，使現代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如何才能促進西藏地區的經濟發展呢？朱開了三個方法：

(一)是增加收入；

(二)實行優惠政策；

(三)是對口支援

前兩項由中央負責。朱說：「目前確定了國家直接投資的建設專案 117 個，總投資約 312 億元。考慮到西藏的特殊情況，西藏的重點建設項目資金主要由國家來承擔。國家投資和中央財政扶持，主要用於農牧業、基礎建設、科技教育、基層政權相關設施建設以及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著重解決制約西藏發展的“瓶頸”和突出困難。中央在增加直接投資的同時，還要實行特殊的扶持政策。現行的優惠政策，能夠繼續執行的繼續執行，需要完善的在完善後繼續執

行。這次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優惠政策。」在對口支援方面，朱也透露「對口支援也要加強，已經確定各省市對口支援建設專案70個，總投資約10.6億元。」除此之外，李瑞環也在閉幕式上要求，他指出「我們過去有些事情辦得不好，不是失之於會議開得不好，政策制定得不好，而是失之於落實抓得不好。這次會議開得很好，能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能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取決於能不能在落實上狠下功夫。這次會議為西藏的穩定發展創造了新的有利條件，西藏各級黨委政府要認清形勢，振奮精神，抓住機遇，乘勢而上，要繼續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和“老西藏精神”，把中央和各地的支持變成強大的動力，開拓進取，創造性地工作，為西藏各族人民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在一個會議上有三個政治局的常委發表講話，從政治局委員到各省市解放軍、武警的負責幹部一體參與可以說明中共中央對西藏發展的重視的程度大大超過了對其他地方的建設。

二、內容描述：

同(2001)年11月，中共又提出了「西藏的現代化發展」白皮書乙文，總結了中共治藏目標、障礙、成果和前景，按此邏輯的敘事方式應該是十分制式的方法來頌揚自己的成績。

首先是目標，白皮書說「中國西藏也以和平解放為起點，經過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現了社會制度的歷史性跨越；經過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快速發展，走上了與全國同步發展的軌道，展現出美好的發展前景⁷³。」

其次是障礙有五，可以區分兩大類：包括了歷史的障礙與現實的障礙，其歷史的障礙包括了「社會制度落後，經濟剝削異常殘酷。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社會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落後。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官家、貴族和寺院上

⁷³〈西藏的現代化發展〉，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0年11月。

轉引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4/content_629894.htm

層僧侶三大領主，佔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而占西藏人口 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卻不佔有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沒有人身自由，不得不依附於領主的莊園為生或充當世代家奴，遭受強制的烏拉差役、租稅和高利貸三重剝削，生活在死亡線的邊緣。等級森嚴，政治壓迫極端野蠻。舊西藏流行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將人分成三等九級，以法律的形式確認和維護人的社會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政教合一，宗教桎梏沉重。宗教和寺院在舊西藏政教合一的社會政治結構中處於“萬流歸宗”的地位，成為唯一的意識形態和獨立的政治、經濟實體，擁有龐大的勢力和眾多的政治、經濟特權，支配著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寺院上層僧侶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統治者，也是最大的農奴主之一。發展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封建農奴制度的殘酷壓迫和剝削，特別是政教合一制度下宗教和寺院對人力、物力資源的無窮無盡的消耗及其對人們的精神奴役，嚴重地束縛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窒息了社會的生機和活力，使得西藏長期處於停滯狀態⁷⁴。以及帝國主義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入侵，加重了西藏的災難。」至於現代的障礙中共的白皮書認為「達賴喇嘛的分裂主義和對現代化的攻擊」，白皮書說「長期以來，達賴集團和國際敵對勢力與中國政府和人民在“西藏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分裂與反分裂、阻撓現代化與推動現代化的鬥爭。在近代，西藏少數上層政教統治者為了維護農奴主階級的既得利益和搖搖欲墜的封建農奴制社會，極力阻止西藏社會的現代化發展，以至不惜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相勾結，策動“西藏獨立”的分裂活動，妄圖阻撓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後，達賴集團置中央政府的耐心等待和西藏人民的強烈要求於不顧，極力阻撓民主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在國際敵對勢力的支持下，策動分裂祖國的武裝叛亂。叛亂失敗逃亡國外後，達賴集團更是與國際反華勢力沆瀣一氣，不斷煽動國際輿論，大肆從事反華分裂活動，詆毀西藏的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成就，百般干擾、阻撓和破壞西藏的社會現代化發

⁷⁴ 同註 21。

展。一句話，凡是有利於西藏現代化發展和社會進步、有利於西藏人民幸福的事情，他們都要製造各種莫須有的罪名，不遺餘力地予以反對。這就充分暴露了達賴集團代表落後的封建農奴制生產關係、代表落後的政教合一的宗教文化、代表極少數沒落的封建農奴主特權階級利益的反動本質，也充分暴露了一些國際敵對勢力妄圖利用所謂“西藏問題”破壞中國穩定、分裂中國領土、遏制中國發展和強大的陰暗心理⁷⁵。」換言之，錯都在別人，至於中共的作為自然都是正面的，白皮書歸納了五點⁷⁶，分別是：

(一)和平解放開啟了西藏邁向現代化的大門。

(二)民主改革為西藏的現代化發展掃清了道路。

(三)民族區域自治的實行為西藏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證。

(四)改革開放為西藏的現代化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

(五)中央政府關心西藏、全國各地支援西藏的戰略決策使西藏的現代化建設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階段。

總之，一句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開始了現代化的發展，其成就可以整理成八大項⁷⁷：

(一)經濟發展實現了重大飛躍。

(二)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

(三)對外開放成效顯著。

(四)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

(五)教育、科技和醫療衛生事業迅速發展。

(六)傳統優秀文化得到發掘、保護和發展。

(七)藏民族特性和傳統得到尊重和科學繼承。

(八)人民生活質量大大提高。

⁷⁵ 同註 21。

⁷⁶ 同註 21。

⁷⁷ 同註 21。

上述的成就可具體化為三大項⁷⁸：

(一)是徹底改變了極少數封建農奴主壟斷西藏政治權力和物質文化資源的局面，西藏全體人民成了管理西藏社會的主人，成為社會物質文化財富的創造者和享受者，人民的地位和素質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二)是徹底打破了舊西藏社會封閉、停滯和萎縮狀態，社會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大大改善，現代化事業空前發展，在不斷改革開放中呈現出全面進步的態勢；

(三)是徹底廢除了民族壓迫和歧視，蕩滌了舊西藏社會的污泥濁水，西藏的民族特性和傳統優秀文化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下得到了充分尊重和保護，並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被賦予了反映人民群眾新生活和社會進步新需要的時代內容，在科學的繼承中得到了弘揚和發展。半個世紀的發展，昭示了西藏走向現代化的歷史必然性，揭示了西藏現代化發展的客觀規律。

未來的發展仍須符合四大取向⁷⁹：

(一)西藏走向現代化，符合世界歷史潮流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體現了西藏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與願望。

(二)西藏的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發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是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共同繁榮和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三)西藏的現代化發展是西藏各族人民的事業，必須堅持以人為中心，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和可持續發展。

(四)西藏的現代化是在西藏特殊地域展開的，必須從西藏實際出發，走有西藏地方特色的發展道路。

三、達賴喇嘛方面的反駁：

在中共的西藏現代化發展白皮書發表之後，一個月左右達賴喇嘛流亡組織舊發表了一份長達三十餘頁的「中共對西藏的黑暗殖民統治」，此文我們在網站

⁷⁸ 同註 21。

⁷⁹ 同註 21。

上無法獲得，不過流亡組織的宣傳官員拔熱·達瓦才仁曾撰文反駁，其主要論點有二：

(一)是中共政權有計畫地大量移民入藏，文章說「遷來的全是中國人，對此《中國人口：西藏分冊》第143頁以“在西藏人口的遷移，除了1959年的特殊原因外，具有波動大、以移居的漢族為主的特點”，該書繼續介紹道“西藏人口的遷移，大多數是由國家組織的，也常常為當時的政策所左右”。1982年中共人口普查的結果，所謂西藏自治區的中國人僅九萬餘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僅僅是這些年的遷入人口，其人口也在十六萬以上。而不管是中共的經濟統計年鑒或《中國人口》等，均載1965年前在西藏自治區已有3.67萬名中國人。因此，即使將上述數字簡單相加，而不考慮人口的自然增長、以及幾萬名投親靠友並定居西藏而未計入者，到1982年，其人口數也應超過二十萬。這中間應該還不包括軍事單位人口的遷入(而在拉薩到七十年代末為止，即使最簡陋的皮毛等手工做坊也被劃併入軍事編制中，顯然其人口是屬於機密範圍的)⁸⁰。」除了移入的漢人之外，尚有個體戶。文章引用「《西藏文藝》上曾發表了由唐晉中、丁窮夫、周紹西三人合寫的報告文學《商品大潮席捲下的西方淨土》，其中寫道“正當國家幹部人心思走...時，五萬多戶操著不同方言的個體戶卻在這清晨的曙光裡，從五湖四海雲集於這片“高原之巔””。這五萬多戶是個什麼樣的數字?僅以一戶有兩名在業人口計算，其在業人口的總數也在十萬以上⁸¹。」另外尚有全民所有制中的漢人，「而根據《1991年經濟統計年鑒》的統計，僅在全民所有製單位職工中，即有五萬三千餘名中國人;還有所謂集體所有製單位的職工，又會有多少呢?因此中共的所謂第四次人口普查依然是不可信的，其數字依然是中國政府根據其政治需要而作了改造的⁸²。」總之，作者認為這些都是中共政權有計劃的移民以消滅藏族、同化藏族的作為。

⁸⁰ 達瓦才仁，〈對西藏的殖民與藏人的生存危機〉，西藏之頁。

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writings/yimin.html>

⁸¹ 同註28。

⁸² 同註28。

(二)是漢人的大量移入結果最直接地為害，就是剝奪了藏人的文化和藏人的生存權，文章以“青海為例”，「這一西藏人歷代居住的地方，現雖仍有幾十萬藏人，但絕大多數人在環境的強勢壓力下，是以漢語為第一語言的。再如西藏佛教中最大的教派——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的家鄉青海西寧的塔爾寺，原有兩千餘寺僧，是個藏人聚居的地區，現今這一地區已被完全漢化。寺院淪為觀光勝地，除了老年人，當地已鮮少會使用藏語的。在西藏的其他地區，這一情況隨著移民的增加而正在蔓延，那些移民在中國政府的強力支持下，不僅在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的地方大展身手，而且完全壟斷了西藏的經濟⁸³。」另外，「在西藏自治區，現在的情況卻是藏人主要分佈在農牧區，除了以遠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交售”農牧產品並以高於正常價格購買中國移民出售的產品而外，幾乎無力在這所謂的商品大潮中一展身手，藏人的產品如能輸入到近在咫尺的印度、尼泊爾，雖可得較高的利潤等，但這卻要冒坐牢的危險，正因為西藏人的產品交售或生產資料的購買渠道只有一個，所以除了承受被壟斷、剝奪的命運而外很難有別的出路，在這絕不是有無商品觀念的問題。移民的中國人由於完全把持著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西藏各城鎮，從而使他們可以利用對藏人的優越甚至壟斷的地位，盡情地盤剝西藏農牧民，然後卻反指藏人沒有商業意識，真是咄咄怪事。如據《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載：在拉薩除去八郭街，全市 12827 間店鋪中，由藏人經營的僅三百餘家；在康區八宿的 145 家中，由藏人經營的僅 15 家；在昌都 840 家中，由藏人經營的僅 92 家；波密紮木 232 家中，藏人經營的僅 3 家。這些數字還是幾年前的統計數，目前的情況更趨嚴重，如中共一年前拆毀大量藏人建築(其中包括許多有保存價值的古建築)而平整出的布達拉廣場，四周像雨後的春筍搬開出的近千家各類商店中，藏人經營的僅幾戶而已⁸⁴。」最後，達瓦才仁批評說「總之，在移民大量集中的城鎮，西藏的文化、語言、傳統正在喪失，而在農牧區，雖然人們暫時還講著藏語，但不僅文

⁸³ 同註 28。

⁸⁴ 同註 28。

盲充斥，還受到中國政府和移民的雙重盤剝，貧窮而落後。就西藏和西藏人目前的現狀而言，實際上已變成了中國廉價的原材料生產基地或生產者以及不公平的貿易中，傾銷其產品的場所或對象。隨著移民的增加，西藏從人口、文化、經濟等諸方面，正在逐漸走向滅亡。如果中國或中國政府繼續奴役西藏民族、堅持殖民、同化西藏民族的政策，如果中國民運或中國人民繼續無視並使現狀持續發展下去，則西藏很可能就沒有明天。如果這種事果真發生，這不僅是西藏的不幸，而且也是人類的不幸。西藏的滅亡，同時也是一個古老民族和同樣古老而獨特之文明與宗教的滅亡。我想，未來的中國人一定會悔恨，一定會為中國在人類發展史和文明史上、在人類已進入高度文明之時，犯下的這一無可彌補的罪惡而感到遺憾。毀滅西藏民族，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同是也是中國的罪惡。中國人民有責任阻止這一悲劇的發生⁸⁵。」

由流亡組織長達三十餘頁的反駁文章，我們無法找到中、英文的文獻，只能找到達瓦才仁個人屬名的文章，從題目上兩者看似十分相近，是以達瓦才仁的文章來取代達賴官方文件，而且達瓦才仁在流亡組織的宣傳部門服務，曾在大陸受教育，有很好的漢文基礎，因此有許多反駁中共的文件是出自他的手筆，我們比較感到不解的是如果流亡組織或是達瓦才仁所作的反駁都是正確，也是站得住腳的推論，何以組織的文件，不論中英的譯文均很難獲得，只有達瓦才仁個人屬名的中文版容易獲得，以宣傳效果而言，當然是組織發出的正式文件的說服力效果大，捨組織而用個人，捨中英文而用藏文是何原因，是否這些反駁只有相信流亡組織的史觀的藏人才能接受，此其一。

其二達瓦才仁反駁論點主要有二：

(一)是將中共的現代化政策指示漢人同化藏人的手段，所以是滅絕藏族文化的方法。

(二)是指責中共在西藏地區現代化的結果都被漢人所佔有和享用，對藏人

⁸⁵ 同註 28。

完全沒有好處。

從達瓦才仁的文章來看，顯然是以立場來決定理由。此一立場即是中共所攻擊的舊西藏的貴族、地主和僧侶的立場。因為現代化的結果造成弱勢民族文化的勢微是現代化的趨勢所決定的，不是中共刻意消滅民族文化的手段。事實上，漢民族在清末引進西方的現代化，漢民族的文化也同樣被淘汰，一個民族現代化的過程中希望不被消滅的唯一方法是去迎接挑戰，相對調適，而徒然作一些殖民的指責是無效的。至於成果享用的問題，則除非政權當局以政策是否明文的歧視規定，否則是誰享用基本是受制於市場決策。同此這樣的指責就變成自己跑得慢反而怪別人跑太快。達瓦才仁在文章中也反駁藏人不會作經商的說法，如果是，則上述的現象就是一個開放平等的競爭，如果達瓦才仁所言，完全屬實則何以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爭不過外來客商呢？資本主義現代化就是一種市場競爭，一種殘酷的競爭，抱怨改變不少事實，我們不妨看看在世界的競爭場域中，有多少藏人出頭呢？這裡無意去說藏人是否會做生意，而是突顯藏人縱使真如中共所言不會做生意也具有崇高的值得尊重的價值。

達瓦才仁的反駁反而顯示了藏人在經商的自卑感。因此個人以為不論是中共的白皮書，或是達瓦才仁的被殖民的控訴，其立論從論述方法的角度來看，其實可以說都一偏之見。達瓦才仁的反駁只是階級立場的反駁，而且是從中國殖民西藏的角度來鋪陳自己的觀點，不也跟達賴喇嘛放棄獨立追求高度自治的政治路線背道而馳嗎？是以達瓦才仁的反駁對中共在西藏推動現代化建設、推動西藏地區的發展就未能發揮積極正面的督促和反省的作用，也就是沒有能真正立足在藏人立場去討論中共在西藏地區開發的作為的正確和錯誤之處。這樣的論點恐怕對西方真正具有現代化反省能力的學者也沒有說服力，除非是別有用心學者希望利用海外藏人的反革命勢力的政客，才會引用和宣揚。

四、大陸學者的建議：

其實中共曾在2000年4月在拉薩召開過一個「全球化2000經濟全球化與

西部開發戰略拉薩研討會」，會中學者對中共的西藏發展就提出了八大建議⁸⁶：

(一)關於西藏開發的投資問題，需要建立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促使其順應結構調整規律，同時加快從計畫向市場、從粗放向集約的轉變，提高地方政府和地方企業的投資效益。具體可以試行「先分後稅」政策，鼓勵跨地區投資；以經濟集約增長指標作為考核地方幹部績效的重要依據；強化區內投資環境意識等。

(二)西藏開發應當充分借鑒舊中國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統治、開發的經驗教訓，以及和平解放以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開發建設的經驗教訓。

(三)西藏的豐富資源應當置於西南區域經濟的大循環中，以優勢互補、出餘補缺之方式發揮資源配置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

(四)從多角度綜合解決西藏區內不適應開發需求的人力資源問題，包括大力發展國民教育和科技知識普及推廣事業，以提高區內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和勞動生產技能；正確引導人民群眾的宗教信仰活動，使宗教信仰在人們的思想行為上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調整區內人力資源佈局，優化結構，發掘現有人力資源的潛力；實行人力資源引進政策等。

(五)西藏小城鎮建設應當遵循客觀規律，防止低質量重複的平面數量擴張。4個左右的中型城市，一系列的明星城鎮和全區40%左右的城市化水平，是支撐西藏今後經濟長期保持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基礎。

(六)西藏要強化投資環境意識，特別是應從各個方面優化投資軟環境，擴大開放，在體制上實現與經濟全球化的銜接。

(七)西藏擁有較多的優勢資源，優勢資源之所在，就是西藏發展特色優勢產業的著眼點。在發展特色優勢產業的進程和範圍之中，應有選擇、有條件地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並從中培育、壯大新的支柱產業。藏醫藥、生物工程、生態環保和有色金屬、稀有金屬、新能源等產業，可以作為西藏高新技術產業

⁸⁶ 〈2000年經濟全球化與西部開發戰略拉薩研討會綜述〉，《西藏研究》通訊員，西藏研究2000第四期；資料來源：<http://www.tibet-web.com/qikan/xzyj/20004/022000.htm>

的候選領域；旅遊業在近期內可以培育、發展成為西藏新的支柱產業。

(八)在農牧區經濟結構調整上，要大力發展農畜產品深加工，實現轉化增值，以扶持一批「龍頭」企業為突破口，提高農畜產品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帶動農業產業化經營。西藏發展「綠色農業」和高效生態農業擁有特殊的優勢條件，這應當成為走現代農業產業化道路的重點突破領域。

這些建議即是立足現代化的立場，指出中共在發展的西藏建設的過程被忽視的部分，其八項建議可以歸納為以下：不外是向歷史學經驗，不重蹈覆轍，重視人才輸入和培育藏族人才，從地區、區域經濟互補的角度來發展西藏經濟，發展西藏特色的優勢產業。如藏藥的推廣，稀有金屬、新能源和農牧業的開發和扶持。這些反省都是從現代化的一般認知而言，毫無疑問，他們的建議並沒有特色。這些做法也照搬西方的經驗、技術、制度和構想。我們完全看不到西藏特色在西藏的大開發中所扮演的功能。假如中共在「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中強調的在政治文明與政治體制改革中堅定的提出「參考所有的政治文明，但絕不照搬西方制度的看法」是其有指標意義的，何以在經濟領域可以借鑑，可以模仿，可以照搬，特別是在所有條件差異極大極大的西藏地區再開發上可以照搬呢？

第五節 西藏宗教經濟特色

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就不容許有本地的、文化宗教的特色的經濟發展取向和行為嗎？對藏族而言，宗教經濟更是在西藏的大開發必須被視為特色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加以理解和思考，以宗教經濟的涵義來看，可能包含以下的幾個面向：

第一是宗教教義中的經濟觀對信徒的影響：社會學家偉伯(Max Webber)的

「基督教倫理及其影響⁸⁷」闡述了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為何影響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亞洲「四小龍」以及當年中國大陸經濟的奇蹟也有不少人把東方的中國和四小龍的經濟與儒家文化中的某些價值特色加以聯結思考⁸⁸、在藏族的藏傳佛教中也被提及知足、利他⁸⁹的思想影響了藏族人民的經濟觀，大陸藏族學者穆赤·云登嘉措在青藏地方進行調查之後撰文說明藏族同胞至今仍有宗教的負擔，雖然在此較以往減輕甚多但把金錢捐入寺院，仍是藏胞知足、利他主要的表現。所以以藏傳佛教來看，其宗教和經濟間的矛盾和緊張關係是存在的。

第二是宗教是自身的經濟行為：按穆赤·云登嘉措調查說明：海南藏族自治州在農田、草畜雙承包工作中，先後解決州大多數寺院的自養基地，並創造

⁸⁷ 葉仁昌，〈宗教與經濟倫理：三條基本路線〉，《獨者Solitudo》，2003年春季號，台北：台灣基督徒學會出版，頁23-46。資料來源：<http://web.ntpu.edu.tw/~soloman/threeroute.htm>

葉仁昌一文中則認為基督教也為反經濟的教義。第一條基本路線，是基於信仰的理由而對財富和經濟抱持著鄙視並予拒斥的態度。譬如，中世紀著名的修士勝法蘭西斯(St.Francis)就是一例。他不斷提到錢財如糞土，應該逃避錢財就向逃避魔鬼一樣，如此一來，貧窮反而意味著上帝的寵愛與賜福了。第二條基本路線，是對財富和經濟抱以某種理由的肯定，卻又基於信仰上的若干顧慮而以限制和疏離。他們都不能接受財富的累積與享受、以及超過身體需要以外的過多財富。亞歷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甚至說道，對於財富，雖然我們應當善盡管家受託付的責任，但若是財富會成為信心生活的攔阻時，就要準備隨時將財富丟棄。第三條基本路線，是既不藐視財富和經濟，也認為財富可以累積和享受。他不擔憂基督徒的資產和事業龐大，甚至，還視此為上帝的獎勵和祝福。《聖經》中當然也不乏可以支援此一立場的經節。在一般的情況下，熱衷於財富和事業，愛上帝的心可能就冷淡了；而隨著財富和事業的成功，對上帝的謙卑和依賴也往往會跟著減低。這就是存在於宗教和經濟之間的矛盾緊張性。

⁸⁸ 澤熙，〈宗教倫理與跨文化理解〉；

資料來源：<http://www.xys.org/xys/magazine/GB/2000/articles/000810.txt>

澤熙一文中指出：偉伯的描述大體包括禁欲主義、努力工作、節儉、不斷追求等等。人們相信勤奮工作和積累財富是道德的表現，這不僅僅是為了有一個世俗的好生活，也是因為宗教的規條。最有說服力的是儒家文化，被認為促進了亞洲經濟的起飛，打破了新教倫理和經濟繁榮是“唯一關聯”的說教。宗教工作倫理與經濟繁榮有關聯，但不是和某一種宗教有關聯，其他宗教的工作倫理也可以促進經濟繁榮。

⁸⁹ 蕭萬源、任伍雄編，阿不都秀庫爾，〈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史〉，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頁12。

條件鼓勵寺院興辦符合本地實際的自養實業。1998 年底，全州宗教活動場所佔有耕地 4387 畝，草場 66077.4 畝，林地 119.64 公頃。據統計，全州 1998 年度寺院自養收入為 71.4 萬元，平均每個宗教教職人員為 160.16 元，每個活動場所 3482.93 元。在 30 個被調查的宗教活動場所中，除了四座寺院無固定的自養收入外，其他四院的自養收入佔寺院全年總收入的 60% 左右。

還有活佛轉世及坐床慶典所需費用，隨著活佛轉世制度的恢復，也出現一些問題，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加重了信教群眾的經濟負擔⁹⁰。當然宗教的經濟收入不僅僅在寺院所承包的土地，其他的宗教經濟包括了香客的認捐、寺院相關的宗教儀式用品、宗教書籍、宗教藝術品、宗教紀念品以及寺院參訪的門票收入。在藏族地區藏人朝拜拉薩也是宗教經濟的重要活動，按藏人風俗朝覲者前往拉薩耗費的不僅是個人的精力，而且是全家多年的積蓄。每個朝覲者總是帶著全家辛苦勞作所得的積蓄上路的，除把部分錢花在路費上外，所餘部份全部獻給拉薩的各寺院，這在 80 年代初表現的尤為突出。另外在寺院喇嘛為一般藏人的紅白大事所得和收入，按穆赤·云登嘉措到黃南的調查，恰逢隆務鎮鐵吾村一戶人家把隆務寺的僧人請到家裡念經，據主人介紹，兩、三百名僧人念了一天經，他家花費就達四萬多元。另外，如果家有喪事，需請僧人到家念經，其規模和費用視喪主家庭的情況而定。一般來說，富裕家庭要請七名僧人唸七天經，喪主除負擔僧人這七天的吃喝外，還要給每位僧人送一隻羊⁹¹。

總之，每逢宗教慶典節目，重大宗教活動與活佛坐床等都能創造出不少的經濟需求，增加不少經濟的活動。而人們生活水準、生活條件的提升，同樣為宗教經濟帶來新的和廣大的機會。大陸學者往往將人民捐輸給宗教的費用是從經濟成長的負面因素來看待⁹²，例如大陸學者於今就認為近幾年隨著人們生活水

⁹⁰ 穆赤·云登嘉措，〈藏傳佛教信眾宗教經濟負擔的歷史與現狀〉，西藏研究 2002 年第 1 期，頁 47。

⁹¹ 同註 38。

⁹² 於今，〈東中西區域發展和改革〉；資料來源：<http://www.ficc.com.cn/jj/gw/yj.htm>

平的提高，宗教活動給老百姓帶來的經濟負擔又出現了增加的苗頭，這主要是由於富裕起來的人民在宗教活動中出現了攀比的現象，而且宗教活動也又愈加頻繁的勢頭，這給普遍的民眾帶來了不必要的經濟負擔，影響當地的經濟增長。其實從經濟的供需法則來看這些都是經濟活動的一環。

第三是經濟活動與宗教傳播相互促進：這一部分以表現在基督教利用西方的資本主義殖民經濟的活動，強制性地將宗教傳入中國，以及在公元九世紀時「大食商人從阿拉伯到中國，往返一次約兩年的時間性。其中冬季歸國者固然很多，但留華不歸者為數也不少，當時，人們將這種外商留華不歸的現象叫做「住唐」。此外，幫助平定安史之亂的大食兵，後來也都留居長安。據說為滿足他們宗教生活的需要，唐朝皇帝還為他們建了一座清真寺。總之，有唐一代，長安、廣州、揚州、海南島等地，都有數以千計的穆斯林居住。他們有的住唐五年、十年，有的住到了宋代，長達數十年。由於中國政府的重視和積極鼓勵，阿拉伯、波斯商人來華貿易的勢頭如錢江潮湧。

來華定居的穆斯林與年俱增。他們有的帶來了自己的妻子兒女，有的則在中國取漢女為妻。那些穆斯林婦女，穿著鮮潔的衣裳，戴著珍貴的耳環，被中國人稱為「波斯婦」或「菩薩蠻」是波斯語Mussulman或其訛形Bussurman的譯音，意為伊斯蘭教徒(穆斯林)。有詞牌名說「菩薩蠻」，其因即出於穆斯林婦女的來華。他們在華所生子女，叫做「土生蕃客」。到北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已出現許多在華居住五世以上的土生蕃客。為此，宋政府還特意頒發一個「蕃商五世遺產法」。來華僑居的穆斯林商人，有一部分不顧中國政府關於「化外人法不當成居」的規定，在地方官員的默許下，與漢人雜居在城內；但大多數人則居住在海運交通幹線各城市郊區的聚居區內，這種「蕃商」的聚居區，被稱為「蕃坊」。從阿拉伯商人蘇來曼的《遊記》中，從朱或的《萍州可談》用其他一些唐宋史籍中，我們可以了解當時「蕃坊」的大概情況⁹³。比照其他的宗教傳

⁹³ 〈經濟往來促成宗教傳播〉；資料來源：<http://www.sxpublic.gov.cn/whpd/sjwh/025.htm>

播所創造的經濟價值，而這幾年藏傳佛教在西方、在全球各地因為達賴喇嘛的關係而日趨風行，同樣也在各地產生的宗教經濟的效果。例如西藏佛教經典的翻印西藏、服飾的熱賣等，是以經濟活動和宗教信仰之間其實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就可能發現他們之間的互補性。

藏族是中國境內的宗教文化的民族之一，而西藏自治區境內的寺、院、宮三種宗教活動的場所，按中共「西藏的現代化發展」白皮書所述「目前，西藏共有 1787 寺廟和宗教活動場所，住寺僧尼 4.6 萬多人，各種重大宗教節日和宗教活動正常舉行；每年到拉薩朝佛敬香的西藏信教群眾均達百萬人次以上」⁹⁴，而中共只重視藏傳佛教對西藏現代化的統戰意義，而沒有重視開發其經濟意義。因此在西藏現代化的過程，西藏的宗教就只能成為一種觀光的資源或是展現宗教自由的樣板，這些宗教的作用只能彰顯中共利用宗教的心。而對西藏的開發，就採取了工業化的方式，我們可以試想如果人們也把當前在溫帶地區的農業、工業、商業放置到南、北極去開發，對世界、對地球、對人類必然只是一種災難性的破壞，不僅僅是因為南北極的氣候影響全球，而是在極地的地方，生態的脆弱無法承受科學的摧殘，青藏高原亦是如此。所以在開發時不應以人定勝天的科學成就去自豪。類似青藏鐵路的工程確實表現了中國人民的創新、勤勞和不畏艱難的攻關精神，但是中共當局和大陸的經濟學者、專家為什麼不從青藏高原的特殊性來思考其發展的可行性。我們以為經濟的發展只有服從地理人文的特殊性，特別是長時間累積下來的，經過歷史的考驗的特殊性，才能有其永續的可能。而不是以科學來救科學的永續性，按此思路西藏、青藏高原的經濟應該集合專家學者去思考「宗教經濟」的可能性和發展性。在青藏地區只有將宗教的特色和經濟需要相結合才能真正走出青藏的特色的經濟發展。中共自六十年代以來在宗教政策方面已經從鴉片論到功效論，又從功效論發展為相適論，既承認社會主義下宗教具有與社會主義相適的空間，那麼此一空間就

⁹⁴ 〈西藏的現代化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1 年 11 月；

資料來源：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4/content_629894.htm

不僅僅在精神生活層面，而是物質生活方面也應有相適應的可能，從宗教去帶動青藏高原的經濟發展在經濟發展中呈現出藏民的宗教特徵和藏人的文化特色，這樣的發展既是藏民自己最熟悉的，又是可以和外界平等交流的發展模式，既擴大藏民文化的市場又豐富藏民的生活內涵，應該是一條不同以往的藏區經濟發展的道路，在此思路下：

首先藏族的學者、藏傳佛學的藏學家們就有必要將藏傳佛教經典中的經濟觀加以整理確定，歸納演繹。從觀念上、價值上理解觀察經典中的經濟思想，以便改變藏胞的經濟思想，有了這些成果才能成為真正分析青藏地區宗教經濟的發展方向和永續發展的可能。

其次宗教經濟有別於以宗教為觀光副產品的經濟發展，後者是將宗教商品化和世俗化，前者才是將宗教和經濟的理性結合，是經濟宗教活動中所產生的經濟需求加以歸納和綜整，創造宗教的新需求、增加宗教經濟的新價值。以宗教為主體，不是以宗教為商品，在此情況下，宗教和宗教場所不是被消費的對象，而是創造需求的主體，是將經濟納入宗教、融入宗教，而非宗教依附於經濟。

其三從青藏地區寺、院、宮的數量，以及信徒的數量來看，個人認為在青藏地區宗教經濟肯定可以形成規模，從宗教活動的數量到宗教商品的需求，加上外來觀光客的好奇，必然可以形成一種規模經濟，而創導出青藏特色的經濟發展，是以中共當局就有必要對青藏地區的宗教場所有系統的加以調查、了解，以便將青藏的宗教經濟作為導向性的發展計畫，引導其經濟走向。

當然上述的宗教經濟發展對中共政權而言，唯一的關心是宗教活動是否因此發展，我們以為中共大可不必擔心，因為在藏族原本已經是宗教民族，幾乎全民信教，是以宗教經濟只是增加消費，不是在信仰上創造需求。在其他地區則必受限於青藏的特殊性，也不可能出現大量的信徒，至於個別的信仰，則縱使沒有宗教經濟的發展，其他民族的信徒也會出現，因此西藏的現代化必須是在西藏的特色基礎上發展，而西藏的特色就是藏傳佛教，宗教經濟才是適當的

發展策略。西藏的現代化不是以西方世界的經濟發展方式來發展，而是以西藏的特殊點來實踐，才能使藏人在此一現代化的道路有舞台、有機會，因此能夠建立自信，自願參與。從而獲得非凡的成就；呈現出經濟發展過程中十分罕見的宗教經濟為支柱的發展模式，此一方式由於是特殊的，就更突顯了它的價值，必然也就可以導引更多的知識和智慧，而形成另一種發展的模式。藏人的文化，藏人的宗教也必然有了存在、發展和光大的需要，海外藏胞也就不得不從攻擊而反省，從反省而參與，藏族的宗教經濟也就更加成功。

第五章 西藏社會現代化之評述

第一節 前言

自從中共統治西藏之後，藏人的生活不論從個體或是總體都出現巨大的變化。這是一個很容易成立的命題，但是卻不容易研究。從邏輯上說，當我們說變化時，我們必須有一個變化之前的生活對照，才能真正指出其變化之所在，然而以往生活不可能重現，因此只能依賴別人的口述或是記錄，特別是文字記錄。此一困境不僅僅口述或是親歷者的紀錄，還在於讀者了解作者的內容時，也同時立足于自己的立場和主觀，面對這樣的困境吾人的態度是並不企圖去超越立場和主觀，而是承認和尊重所有的立場和主觀，並在此心態上尋找立場和主觀差異較大的文本進行對話，以便透過視野融合描繪出大致的圖像，同時在比對兩個不同時代的社會圖像時，只作差異的解釋而捨棄優劣的對比，特別避免文化的障礙所造成對西藏傳統社會的誤解。除了上述方法論的意義上的困難之外，中共在 1959 年之後所採取的民主改革以及其後極左的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幾乎將藏人原有的生活模式完全的、相當徹底的作了改變。加拿大的學者譚·戈倫夫(Tom Grunfeld)稱「1959 年以來，西藏發生的社會變化確實使人類學家不可能完全設想西藏過去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⁹⁵。」以中文來研究就是徹底告別歷史的變化，面對此變化，不同立場的人必然給予不同的評價，因此在為傳統的、歷史的西藏社會著書立說時，自然就十分明顯出現截然不同的描述，這也會影響到我們對傳統西藏社會的了解，再進而影響我們對西藏社會的對比。同時，社會的現象十分複雜，每一種文本描述的方式和現象也都不同。換言之，甲書有的在乙書未必一定有，這樣自然有增加了比較的難處，不過無論

⁹⁵ Tom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Y:M.E.Sharpe, 1996, P.2。

如何，應該還是比主觀、直接的論述為好，本文首先選定幾本立場差異的書為範本，整理出他們的內容重點，依循可以歸納的若干可比較的重點，加以對照。

第二節 文本中的西藏傳統社會

一、法尊法師 《西藏與西藏佛教》：

民國 32 年初夏，本書作者在藏留學九年，獲得「格西」學位，從一個漢人出家人的角度觀察藏人社會，對民族性、家庭、社會、信仰、僧侶均有描述。依據法尊和尚的描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結論，傳統藏農民和商人的生活特徵是生活內容簡單、社會階級森嚴、宗教主宰一切、女性相對權威。

(一) 生活內容簡單:在法尊的著作中幾乎沒有藏胞在娛樂方面的描述，似乎在傳統的藏胞生活就是生存，活下去是唯一的生活，在正常的生活來看，藏民也有不少的節目、慶典，但在一般的生活中所表現出的只有週而復始的勞動，從藏民微現的一日生活來看，「對富有的人家而言，兄弟姊妹聚在一起飲茶談心，似乎就是最為常見的娛樂，除此之外，生活就是勞動、誦經、進餐、睡眠。」對貧窮的人家而言，勞動即生活，生活即勞動。

(二) 社會階級森嚴:按照法尊和尚的描述，「藏人不但在社會地位上，有著十分嚴格的階級等地不可踐越，否則必定處罰，即使在同一階級之內，坐臥飲食也有區別。主人所食，係白大麥，淨洗後炒磨，也做招待上等客人的用品；其次即黑大麥，不加洗擇——麥中多雜石砂——炒磨。家中普通人所食用，亦為招待通常客人的用品。再次就是碗豆和大麥混合的糌粑，這是僕婢的食用，還有純碗豆的糌粑，糌粑也是僕役的食糧，兼施乞丐。又說一家人所飲的蠻茶，要分數等，即打茶的酥油，也分鮮陳和多寡。」足見傳統西藏社會是十分依賴這一套陳規，作為社會運作依據。

(三) 宗教主宰一切:按法尊和尚的理解，「藏傳佛教在藏族社會中，不僅

心靈、精神生活上的信仰與寄託，而是全社會存在依據，在傳統西藏中，一般人很難區分信仰和生活，法尊說，無論貧富貴賤，士農工商，無有一家不信佛的一邊域有信耶教者(基督教)，或不信佛，或耶佛俱信一鄉下很窮的人家，只要有房住，他便有個小佛堂，那怕只有一間房，他也有個佛桌或佛台，無論銅的泥的，觀音度母，總供幾尊。出門的人，背帶佛盒，內中供的佛像雖然沒有一定，但不外佛像和大喇嘛的綉條。他們都承認那是能護身的，他們有了吉凶禍福，都相信是因果法，都知道請人誦經或修福，初一十五和大節會，都買酥油燈供佛，有兒子出家修行，都說是很對的，不能出家修行也自認是沒有福。他們對於出家人很是恭敬，尤其是對於有學德的大喇嘛。不但如此，宗教在傳統藏族就是教育。宗教之外沒有其他教育，小孩不到三歲，便知道念瑪尼，大人多會誦「度母廿一禮贊」以及普通的發願文，甚至有能誦大儀軌，了解甚深的理論。表現在文化方面更多如此，西藏的文藝作品，無論是詩、唱歌、小說、散文，乃至把全部大藏的奧蘊，撮攏來所創作的長篇大論，沒有一種不是拿佛教的教理，當做作品的中心要素。就是關於數學、醫學、歷史、地理等的著述，也沒有一種不是拿佛法作最重要的原素。」其他在藝術、建築等各方面，只要是值得保存的，引起注意其內容、其表現、其功能無一不是因為附著在宗教之上，否則就不可能存在。

(四) 女性相對權威:在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中，女性在家族的地位比較崇高，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根源於女性在家庭中承擔了大量的工作，不論是田間粗活或是家中細活，幾乎都是女性的工作，而且傳統的是以多夫一妻制為常態，法尊說:「西藏的女權很高，男子往往受女子限制，招贅之婿且常有被女子驅逐而另找丈夫的，此種情形在西康尤甚。」又說:「假如是上等家庭的子弟，和下等民戶的婦女發生關係，他的族里親眷都認為是醜事，好似玷污了門庭一樣。但是上等家庭的婦女，和下等民家的男子，鄙視的心理，就沒有那樣重大。」

二、歐陽無畏 《藏尼遊記》民國 43 年 5 月蒙藏委員會出版:

歐陽無畏教授為抗戰之前少數自願赴藏，研習藏文，做了喇嘛而且獲得格西的漢人。歐陽教授的藏尼遊記分為二大部份，本文僅談後半部藏尼日記，其中有關西藏社會部份的描述，這一部份的日記體是以描述整理並不系統性，不過由於歐陽通藏文，是以通書的描述採平實的記錄，沒有劣優的評價。不過對當時西藏社會描述不多。讀過之後同樣令人感到藏人的樸實好客，相對貧窮當然階級森嚴、婦女地位低下等印象。

三、森納那亞克(Dharmasiri Senanayake)著 《西藏內幕》：

1975年森納那亞克是斯里蘭卡的學者，1966年他去了西藏之後就寫了本書，從全書的內容來看，至少是對過去的西藏所作的描述，作者幾乎是完全以中共的立場為立場，因此，就不具個人的獨立角度，如將西藏定位為最落後的地區、生產方式最原始的，在用語上，也使用「解放前」和「英帝國主義」等用語，仍然本書是描到大陸文革時代前有關的西藏著作，因為當時相關西藏的資料十分有限，所以比較受到重視。

四、譚·戈倫夫(Tom Grunfeld)著《現代西藏的誕生》，1987年出版，1990年有中譯本：

在全書的第一章描述昔日(1950年以前)的西藏，主要指出：

第一、農奴階級為傳統社會中最沒有人權的階級，「西藏的農民，特別是在貴族和寺院的莊園裡幹活的農民，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農奴。一個佃農必須把他大部分農產品交給地主，留下的僅夠養活他自己和家人。他還必須向地主及所有過路的政府官員服徭役和提供物品。未經老爺的允許，佃農不得擅離他的土地。如要離去，需先呈上西藏人稱之為的”離開莊園申請書”。通常這類申請是不會被批准的⁹⁶。」「另一個等級的農奴叫堆勞，字義是”小烟”(“小戶”)。這些農奴沒有土地可以繼承，是世襲的農奴。他們被迫納稅，服徭役

⁹⁶ 譚·戈倫夫著，伍昆明、王寶玉譯，《現代西藏的誕生》，中國藏學出版社，1987年初版，1990年中譯本出版，頁8。

和履行其他一些封建義務。他們沒有什麼權力，通常是租點土地或為納稅的”農奴當雇工”⁹⁷。」而階級之間變換的可能性很小，幾乎是數代不變的。

第二、婦女的地位：像在大多數傳統社會一樣，婦女被認為低人一等，如果把藏語中為婦女的稱呼直譯出來，就是”卑賤的出身”或”低下的出身”，這與西藏佛教徒的信仰是一致的，認為只有男人才能進入涅槃。當然，農人家的婦女特別勞累，她們要養家畜，要幹家務，要幹同樣多的徭役和大多數的農活（雖然由於迷信，不讓她們耕田）。」「由於宗教對婚姻沒有約束，許多男人是獨身，再加上婚禮也不正式，因此男女亂搞是公開的，且很普遍。特別是在佔西藏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人中間，情況更為嚴重⁹⁸。」

第三、宗教：西藏是一個宗教的社會這是眾所週知的事實，估計僧人的人數在男性人口中佔 20%至 33.3%⁹⁹。在西藏如此艱苦和外在環境如此嚴酷的情況下，很容易使人們相信超自然的力量，不過西方學者敏銳地指出西藏人在信仰上的矛盾，一方面懼怕變換莫測的精靈（它是這個國家的喇嘛教從原有的宗教繼承下來的），另一方面又確信人們有力量控制這些黑暗的、要人們向它贖罪的、有復仇心理的勢力。魔法、儀式、虔誠的行為，對於四院和經師的慷慨施舍，驅除妖魔和祈禱儀式，都是為了幫助人們鎮住上述黑暗勢力。他們還認為最初受制於千百種無形力量的受害者最終能夠成為這些力量的主人¹⁰⁰。另外他們也注意到藏傳佛教的另一個奇怪的演變是，人們在進行宗教儀式時，數量比質量更重要。例如，圍著神殿繞圈子時。繞的次數越多，積德也越大。反覆地轉動經輪，應是這種觀念的重要反應。朝聖和朝拜神殿對普通的藏人來說有是很重要的。有的神殿有其特殊用途，例如有的神殿能幫助人們是先知道胎兒是男是女。朝聖在社會生活方面也能起重要作用，因為當來自西藏各地的人們聚在一起時，他們有機會互通貿易，了解最新消息，為今後的貿易建立新的聯繫。此外，僧

⁹⁷ 同註 2，頁 9。

⁹⁸ 同註 2，頁 16-17。

⁹⁹ 同註 2，頁 24。

¹⁰⁰ 同註 2，頁 25-26。

人和婦女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擺脫一下日常單調的生活¹⁰¹。描述在西藏的社會制度中，也許沒有什麼東西像婚姻制度方面的習俗會引起人們這麼大的興趣。除了一般常見的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以外，還有一妻多夫制，即一個婦女同時嫁給幾個男人為妻。儘管一妻多夫制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人類學家對這一方面也進行了研究，但爭論最多的是這一制度到底有多普遍性¹⁰²。其他與社會相關的如治安，書上有多有所描述。在治安方面他的評價是拉薩的盜賊和狗身上的跳蚤一樣多。這一狀況實由于貧困和不能有效地執法引起的。西藏的軍隊和拉薩的警察(這個國家唯一有警察的地方—原文如此。編者)說是要維持治安，其實他們帶來了同樣多的麻煩。人們認為，警察到了晚上自己就在作案¹⁰³。認為過去西藏不是一個有益于健康的方地方，因為那裡沒有清潔的環境和現代化的醫療條件。性病(估計有 90%的人口深受其害)和天花蔓延(大約影響了人口的三分之一;1900 年第十三世達賴就得了天花，1927 年僅拉薩一地就有 7000 人得了天花)，白內障、癩瘋(特別在安多和康區)和腸胃病也很流行¹⁰⁴。」

因此作者總結，種種證據表明，1950 年以前的西藏既不是神秘的”世外桃園”，也不是”人間地獄”。西藏人生活很艱苦，但有些人受益比另一些人多，西藏是一個不知怎樣倖存下來進入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世紀社會¹⁰⁵。這樣的社會要去接受社會主義所強調的階級鬥爭、國家主權和現代行政等等新生事物，其間的衝突和矛盾是可以想見的。

五、梅·戈爾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著《喇嘛王國的覆滅》，

1989 年時報出版：

戈爾斯坦是美國著名的藏學家，但是他的意見不同於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意見，因此也備受流亡組織的排斥。他的著作《喇嘛王國的覆滅》的最後一章

¹⁰¹ 同註 2，頁 26-27。

¹⁰² 同註 2，頁 18。

¹⁰³ 同註 2，頁 21-22。

¹⁰⁴ 同註 2，頁 19-20。

¹⁰⁵ 同註 2，頁 34。

闡述覆滅的原因，他說：「拉薩三大寺以及分布於西藏四面八方的數以千計較小的格魯派寺殿中為其充當說客的人都認為，他們代表著佛教的根本利益，並且有義務維護宗教國家的真諦和價值。因此，寺院集團在噶廈政府力阻擾實現現代化，在他們看來，現代化既有害於寺院生活的經濟基礎，也不利於西藏佛教的“價值”壟斷」。戈爾斯坦教授的說法從反面說明西藏的社會相對於當時的世界是一個保守、傳統不合於當代的社會，由於戈爾斯坦的書主要是描述 1913 到 1951 年之間，西藏高層的政治鬥爭，是以在社會層面描述不多，上述的說明證明了西藏傳統社會的落後和保守，因此我們可以歸納藏族的傳統社會大致具有以下三大特點：

其一在階級方面：這些陳規與共產主義的平等要求存在著顯著的落差，而中共統治西藏之後，幾乎是使用了革命的方式，在十五年之間強迫改造西藏這一個千年形成的生活傳統，此一作法必然遭致被革命的對象根深蒂固的仇恨，而革命的得利者也欠缺享用無階級社會的社會基礎，於是這些新的統治者就只能完全依賴外來的政治力量來保證他們的權力和享受，其結果將使得他們在藏民族社會中被孤立，如果這些被中共所培養、拔擢和保護的藏族幹部不能真正為廣大藏胞者，而是為自己的權力設想，結果就將受到藏胞的唾棄，從而演變成藏胞幹部成為統治西藏「新階級」，這對追求平等價值的共產主義可以說是一大諷刺。

其二在宗教方面：對藏人而言，宗教不僅是一種信仰，而是全部的生活方式、生活價值、生活的寄託。換言之，藏人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宗教生活，是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對藏傳佛教的種種暴行，對中共而言只是共產主義「宗教政策」過激的錯誤；但對藏族而言，豈只是一種政策的錯誤而已，那是對藏人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成的全面否定，一個人一旦自己所堅信的價值，方向在一夕之間被否定、被拋棄。則是對此人的否定和拋棄。中共在治理西藏的過程中，如果不能在這一層次對藏族所造成的迷失和破壞有所自省、有所體會，有所自責，則不可能輕易清除藏族對漢族統治的疑慮和排斥。

其三在女性平等方面:對女性而言，藏胞女性雖然在家庭猶有某些權威，特別在一妻多夫的家庭之中，但在社會上女性的總體地位仍然十分低落。在傳統的西藏、在西南的少數民族地區亦是如此，大家都只是描述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威望，但都僅僅止於家庭關係這一層次，在社會幾乎無一例外仍是男性權力的政治。男性才是真正的社會主宰。在傳統西藏的統治官吏中也沒有女性的統治者，因此女性權威在傳統藏族家庭是建立在男性對女性的生活依賴，和勞動力剝削，並不是對女性的尊重和性別平等的信仰和體認。甚至可以說是男性意識主宰下的一種技巧地剝削女性的精心設計。所以在經濟、在社會、在家庭，從微觀面去觀察，女性是當家作主，但在宗教面、政治面來看仍是赤裸裸的男性威權的社會。中共統治西藏之後，同樣以「女人撐起半邊天」為口號，形式上是將女性的地位抬得很高，事實上，在中共的統治其實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男性社會，男性意識形態，在這一方面是沒有任何改變的。但是達賴喇嘛流亡組織對此則有不同的看法。

第三節 達賴流亡組織的看法

達賴喇嘛在印度北方的達蘭莎拉設立了流亡組織，大約從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建立並提供大量有關西藏資訊的網站，此一網站除了反駁中共治藏的政策和政績之外，另一個主要任務就是介紹達賴喇嘛流亡組織觀點的西藏，介紹在相關歷史和傳統西藏的部份，該網站比較偏政治史，特別對反駁中共的西藏史、以及以往中國政府立場的蒙藏關係史。對西藏以往的經濟、社會、文化、藝術的介紹比較少。在「西藏之頁」(網站之名)中，我們尋找到比較集中論傳統西藏社會的文本。在文獻與檔案庫專欄，其中「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¹⁰⁶」一文，從其篇章的名稱來看，就可以感受到政治立場和態度對描述社會的干預

¹⁰⁶ 〈西藏過去的社會〉，西藏之頁/文獻與檔案庫/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
<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books/zhen/zhen4.html#2>

的立場，該文的第四節描述「西藏過去的社會」其中主要的內容包含「藏人享有平等的參政權」，文中舉例「從尋找歷代達賴喇嘛靈童的制度上也清楚地知道西藏政權絕非血緣世襲制。同樣在西藏各寺院的制度中，也給人民以平等賦予發展機會，任何一名兒童都有入寺為僧的權利。」其次，藏人的人身保障和財產權也十分明確，文中指出「在西藏法律中不僅明文規定，任何莊園主都不准殘暴地折磨、虐待農民外，這也不符合西藏人民的道的習俗。西藏的傳統習俗中認為任何沒有仁慈的行為都是卑鄙下等的。佛教的宗旨是慈悲，其目的不僅造福于人類，而且禁止傷害一切生靈。

在西藏歷史上，死刑和割除之體器官等的刑事處罰權只限於在拉薩的西藏中央政府具有」及「絕大部分土地由農民管理，並依據收入直接向國家繳納地稅，有些根據農作物的收成情況來繳納。這些稅收存於政府的倉庫中，用來做為各寺院的施贈和地方的建設，以及軍用開支和無莊園之行政管理人員的俸祿等。有些農民通過勞動來替代賦稅；有些是力役稅，及為政府有關人員的來往提供牲畜以便騎乘。農民所擁有的土地是可以固定地代代相傳的祖產，他們可以將土地出租或借出去。農民所承擔的差稅和差役是比較少的。西藏只有11%的人在種租賃地，而且絕大多數也僅是在衛藏一帶，這些租賃地屬於私人和寺院所有，農民應向這些私人和寺院交納租賃稅。雖然他們是屬於種租賃地的人，但地主無權隨心所欲地把他們驅逐出田地。」所以文章的結論是「在西藏獨立時從未聽說過因飢荒而死人的情況，雖然出現過一些天災，但人民從政府和寺院、貴族、富裕的農戶手中任意借債。」除此之外在「介紹西藏¹⁰⁷」專欄中也有兩篇文章間接的描述了西藏的社會，如在西藏人的姓名中提及藏人傳統社會的平等，「從現有的文獻史料表明在佛教未大倡于西藏之前，西藏人普遍地使用姓氏，但是隨著佛教的傳入，眾生平等的觀念使西藏人不重視血統，不重視血

¹⁰⁷ 〈西藏人的姓名〉，西藏之頁/介紹西藏，
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tibet/xizang/xingming.html>

統，一些在原來可能象徵高貴的姓氏就失去了意義。」在「西藏的婚姻¹⁰⁸」一文，描述藏人男女平等的觀念反應在婚姻上「藏人婚姻制度中一般都是老大當家，其餘無論男女都要出嫁或上門(指男性入贅女家)。沒有「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之風俗。這種婚姻制度表現于男女平等，生男生女同樣傳家繼業。

家庭子女中的老大，無論他是男是女，他(她)就有繼承家業、贍養老人之權利和義務。在一些地方則是由最年長的男孩子當家，其餘弟妹到結婚年齡時，男者上門，女者出嫁，還可以出家為僧尼。也有終身不婚，在家當舅舅(叔叔)和娘娘(姑姑)，他們在家庭不僅不受歧視，有不少成為家庭的當家者。侄兒侄女們對舅舅(叔叔)和娘娘(姑姑)的尊敬和愛戴程度往往超過親生父母。因為他們終身不結婚，沒有子女，但他們把畢生的精力奉獻給整個家庭，時時處處都為整個家庭的和睦團結、興旺發達著想，因而受到全家老少的尊敬愛戴。」婚姻制度存在「一夫一妻、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文中結論認為「一妻多夫的家庭，妻子在這個家庭中占主要地位。她除了搞好婆媳關係外，更主要是處好與諸夫間的關係。社會對媳婦的看法主要是視其對諸夫的穿著、飲食、性生活、尊重等方面處理是否得當，能否一視同待。如果諸兄弟團結和睦，她便是一位好妻子、好媳婦，好當家人。

一妻多夫的多偶家庭，很少發生不和現象。其和睦程度有時還勝一夫一妻家庭。

對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家庭，社會一般會認為很自然的事。對於兄弟共妻或姐妹共夫的家庭的還持贊揚態度。因為兄弟、姐妹在一起能夠和睦相處，即可免除離別思念之苦，又能相互照顧，終生于父母在一起，同時財產與勞力也不分散，容易發家致富。」

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民族具有一種自豪感，這是極其正常的、正當的，幾乎所有的民族知識份子都會做相同的事。不過於此同時，

¹⁰⁸ 〈西藏的婚姻習慣〉，西藏之頁/介紹西藏；
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tibet/xizang/hun.jia.html>

一個民族知識份子自省和自我批判的能力也同樣重要。任何一個民族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都有其彌足珍貴的「資產」，但也必然帶有不為時代相融的「負債」和習性。中共以往習慣地以馬列主義自居，以科學社會主義自傲，因此排斥一切非社會主義的時代、文化和價值。如今中共自己都已經覺察到「中國特色」才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必走之路，但中共政權此一覺悟卻未能影響中共的民族政策，也應該從而立足在各民族的立場去肯定各民族自己的特色，鼓勵各民族以自己的特色而自傲和自信。因此，迄今為止中共所強調的「中國特色」就仍然是漢族的、沙文主義的，因此也就是貧乏和缺乏包容的境內各民族特色。換言之，中共除了從馬列主義反省，也必須從中國文化反省，才能真正尋找到由多民族參與去制定一個內容新穎，包容多族特色的民族政策，這樣中共的漢人藏學家和藏族藏學家就有可能共享一部藏漢民族共用的歷史和文化。反之，海外的藏族知識份子身處在開放社會，在介紹自己的民族時，除了自豪感亦須要有反省和批判力，才能客觀面對自己的歷史，不要以為自己依靠地理位置的特別造成世人的神秘感，因而附合世俗口味地將自己的歷史和民族真正寫成「香格里拉」，事實上，在西藏不斷建設，不斷開發的情況下，外界對西藏的神秘情節已經不像以往。每年去過藏青高原、西藏地區的人也越來越多，社會變遷的狀態也就越來越呈現、公開在世人的面前。因為文化的變遷速度緩慢而經濟和物質的變遷比較快速和明顯，當人們進入藏區必然會看到會看到許多傳統西藏的「遺產」，這些遺產肯定不會是完全正面的，例如階級問題、農奴問題、衛生問題、婦女地位問題、眾生平等的問題，這些在傳統西藏的表現為何，只要訪問、座談、聊天隨時都可以有答案；其次是中共對西藏的開發在速度上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將全部西藏都變成現在的拉薩，遊客們仍可以在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區看到許多的重要的傳統線索重而也很方便作出對比。然而從今全球化的視野來看，常常會讓人深省以往我們所不肯正視、不願承認的民族特性在全球化中反而價值倍增，是以的各民族菁英尤其需要如實地、客觀地研究和敘述才是真正為人所信服的，任何謂政治服務的論述都是短視的、暫時的。

第四節 現代藏族社會的變化

一、中共的描述

文革之後，中共的全面改革、開放，自然也擴及西藏。八〇年開始中共對西藏進行了贖罪式的經濟援助，因此對藏胞的生活確實了重大的改變。依西藏信息網的說法，如今在城市生活的藏胞，他們的食、衣、住、行、娛樂的一般圖像是：

每天天濛濛亮，清脆的吆喝聲把居住在拉薩西郊安居園裏的退休老人們從睡夢中叫醒。不過，老人們並不感到反感，因為附近的農民把一瓶瓶新鮮的牛奶、酸奶等食品送上門來。每年的八九月間，在千里青藏公路沿線經常看到的情景是，牧童們把自己在山上採集的蘑菇裝在帽子裏，向過往行人叫賣，還要給你討價還價一番。在拉薩八廓街廣場，來自昌都地區的「阿西（女子）」們，身穿藏東特有的寬袖氍毹藏袍，頭髮上鑲滿珠寶，用她們並不標準的英語鏗而不捨地向外國遊人兜售珊瑚、綠松石等各種珠寶和其他旅遊紀念品。儘管她們有時蠻纏的舉動，令拉薩人覺得在「老外」面前有失體面。但阿西們「執著」的意識，令遊客們覺得不買一件似乎「盛情難卻」。

在圍繞布達拉宮的轉經路上，商攤比肩排列。茶館裏傳來吸引顧客的優美音樂。在拉薩的大街小巷上挨家挨戶叫賣牛奶十幾年的央宗說，起初她養牛賣牛奶僅僅是為了養家糊口，而現在做生意的目的，就是為了蓋一幢漂亮的樓房。央宗還用自己做生意賺來的錢，供兩個孩子在中國內地的高等學府就讀¹⁰⁹。

依上述圖像所顯示的特徵為：物質生活的多樣化、經濟意識的建立、宗教世俗化。

¹⁰⁹ 朗傑 邊巴次仁，〈吆喝喚起西藏人商品意識〉，中國西藏信息中心/社會/細節推動生活/西藏社會生活的日新月異/其他；資料來源：<http://www.tibetinfo.com/zt/zt20020021028145043.htm>

第一、物質生活的多樣化：

從微觀來看，大陸藏民飲食的內容，除了以前糌粑、青稞麵、酥油茶、奶酪、奶渣羊肉、蔬菜之外，其他的飲食很少。但如今海鮮、菌類、水果都是藏人的食物。而且傳統的飲食也採用了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如速溶的酥油茶取代了傳統的作法，另外藏族也開發了沙棘茶，以沙棘汁為原料是健康的綠色飲料。隨著玻璃溫室和柵栽技術的引進，藏族的蔬菜供應不論在質量，在品種都大大的超過供給。總之，從微觀來看，藏族的飲食變化可以說是十分巨大，一種新的飲食文化在藏區悄然出現。

從宏觀來看，藏族家庭的需求也有很大的改變。中共的報導說：「追溯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拉薩人講究家居用品“老三件”：縫紉機、黑白電視和自行車。如今，彩電、冰箱、電話已得到普及，特別是近10年來，電腦、微波爐、手機、轎車也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同時，家用電器也從單一型向現代化、高檔次發展。據統計，1990年拉薩市城鎮居民每百戶擁有洗衣機42台、冰箱24台、彩電88台；2001年每百戶擁有洗衣機89台，冰箱74台，彩電130台，分別比1990年增長了45台、50台、58台¹¹⁰。」

物質生活也表現在住房方面，以往在拉薩市也只有貴族的房子是用石頭砌成的，其餘的百姓人家都是土坯房。街道也是土路、羊腸小徑。現在不但是拉薩、日喀則、江孜這些已有規模的城市，都是房樓林立，其他小城鎮居民的住房也大大改善。藏族同胞買房子的人不斷地增加。按中共的說法，從1998年到2001年全區商務房屋的投資是10.38億元，完成建築面積169平方米。目前全區城鎮居民平均住房面積14.6平方米，房地產業值只是全區GDP的0.5%。而到2010年全區城鎮的住房需求是500萬平方米，因此藏區的房地產業在可預見的未來仍是十分有可為的產業。

在娛樂方面，原來的電視、卡拉ok、撞球或是節日的餐娛之外，目前藏人

¹¹⁰ 〈步入現代生活的拉薩人〉，中國西藏信息中心/社會/細節推動生活/西藏社會生活的日新月異/衣食；資料來源：<http://www.tibetinfo.com/zt/zt20020021119104837.htm>

也開始在假日出藏旅遊。依據 2001 年西藏商報報導：「在國慶期間，僅山南國際旅行社就組織了 30 多人到尼泊爾觀光旅遊，這是西藏地區旅行社組織的第一個境外旅行團。今年國慶期間進、出藏旅遊的人數創歷史最高記錄，計有 163499 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6.8%。為保障國慶放假期間進出藏遊客的需要，民航西藏航線特意增加航班 54 個架次、航班座位 15840 個，比去年增加 34%。國慶期間，太陽慷慨地普照大地。在拉薩的羅布林卡、宗角祿康等公園內，歡度節日的藏漢族群眾相聚一起，一邊看著精彩紛呈的藏戲演出，一邊享受著高原獨有的溫暖陽光。在拉薩郊外更是有很多年輕人成群結對，享受假日中太陽帶來的舒心與快樂¹¹¹。」

從以上的描述我們確實可以看到，藏族同胞在生活上巨大的變化，這種多彩多姿的生活享受和生活內容，自然對藏族傳統構成挑戰，在中共治藏五十年中，我們可以將之區分為兩階段：前四十年中共是企圖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消滅藏族的宗教，轉變藏族的生活，此一方式不但未能成功，而且留下許多後遺症。近十餘年中共的治藏，則是集中在經濟建設這一方面，從「現代化」的建設入手，大量地透過中央補助，各省援助等方式，不但大大地改變了藏區的經濟基礎，而且也受到多數藏胞的歡迎。雖然從橫向比較來看，西藏地區的經濟發展在全大陸仍是十分落後，但就歷史性的比較來看，西藏的變化無疑是十分巨大的，物質的變化是精神面貌、信仰價值改變的基礎，作者在貢嘎機場遇見十餘位藏族高中生，他們與作者一起搭機去成都，做什麼？去唸高中，他們說讀藏文沒有出路，他們要讀外面的漢人學校，將來才有前途，他們的父母親並不是幹部，只是普通的藏人，作者與之聊天，一方面感受到他們追求渴望現代化的普遍衝動和慾望，一方面也感覺到藏族傳統文化在他們身上和心上的流失。

第二、經濟意識的建立：

從五十餘年的西藏地區來看，中央政府持續不斷地幫助西藏發展，財政支

¹¹¹ 〈高原歡度國慶 長假喜事多〉，中國西藏信息中心/社會/細節推動生活/西藏社會生活的日新異/衣食/普布扎西；資料來源：<http://www.tibetinfo.com/zt/zt20020021028143311.htm>

持和基本建設投資累計達 500 多億元。同時，在大陸其他民族和其他省、區的大力援助下，西藏人民的生活，已明顯有所變化。而西藏的民族幹部和各類專業人才隊伍不斷壯大，初步建立了現代教育、醫療、電力和工業體系，經濟社會發生全新的變化。1999 年中共提出了西部大開發，西藏地區也緊緊抓住機遇，大力發展，增加「造血」功能，西藏著力學習、引進內地和沿海發達地區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結合西藏的實際，先後進行了計畫、投資、科技、教育、財稅、金融、物價等領域的改革，基本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大力發展非公有經濟和外向型經濟。目前全區已有 7 家上市公司，非公有經濟稅收比重達 30% 以上，全區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 115 家，利用外資 1.6 億美元。"九五"期間，西藏完成稅收比“八五”增長 1.6 倍，去年稅收收入為 8.2 億元，較上年增長 14.6%。如今，西藏已具備一定的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能力，即將興建的青藏鐵路更將進一步改善西藏的投資環境。西藏已決定逐步改變無償援藏的做法，實行互惠互利的援藏政策，使西藏成為西部投資興業的熱土。特別是在產業結構方面的變化，尤其顯著。長期以來，農牧業一直是西藏的主導產業，直至九十年代初，第一產業仍佔據全區經濟的"半壁江山"。1994 年以來，西藏大力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第三產業發展尤為迅速，成為主要的經濟增長點。在經濟總量迅速增長的同時，西藏第三產業的比重逐年增加。去年，全區第三產業增加值達 54.4 億元，比 1995 年增長近 2 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46.2%。目前全區第三產業比重比 1995 年增加了 12 個百分點。而在全區實現糧油肉基本自給的同時，第一產業比重下降了 11 個百分點。西藏產業結構的有效調整與高原特色經濟的發展壯大是分不開的。九十年代，西藏立足當地實際，努力發展「人無我有、人有我特」的以市場為導向的高原特色經濟，使之成為全區經濟成長的重要支撐。通過大力加強旅遊基礎設施建設，西藏旅遊業成為全區重要的支柱產業，去年接待海內外遊客 56.5 萬人次，旅遊業直接收入 6.5 億元，間接收入 32.6 億元，分別占當年全區國內生產總值的 6% 和 27.8%。

在上述的大環境之下，藏人的經濟意識也起了很大的變化，中共的報導說：

「向來以“經商為恥”的西藏人，在傳統觀念裏，“吆喝”本是“賤人”所為。50年前，漁夫與屠夫一樣被列入“下等人”的行列，倍受世人的鄙視，他們賣魚時只好喊“賣水蘿蔔嘍！”在不斷擴展的經濟交往中，原始廣告——吆喝，被越來越多的西藏人所接受，傳統思維逐漸融入到商品經濟意識中。當電視廣告最初出現在螢幕上的時候，很多藏族人認為這是一種“欺詐”或“自吹”行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神秘的雪域高原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大山內外的人們開始進行對話。在這一過程中，許多新鮮的現代社會的產物，進入了大山內人們的生活中。於是，廣告等商品經濟時代的“寵物”逐漸被藏族人所理解。」

人們經濟意識的變化，不僅僅是促使物質生活的改變，更重要的是促使了生活方式、時間及生活意識的改變，從農牧的定期、定時、可預測性的生活形態，轉為商業的、忙碌的、預測性低的生活形態。對藏族人民而言，是一個嚴格的生活調適，此一調適的最明顯的改變就是生活和信仰的區分，信仰無法再是生活的全部，只能是慢慢轉而成為一個人生活的一部份。對藏族而言，信仰也無法指導生活的全部價值，只能是精神生活的部份，這就使得宗教在藏人的生命中從全價值被剝離，回歸到主要價值，甚至蛻變為庇佑價值的現實和功利取向的信仰。中共過去以政治暴力、武力鎮壓都未能作到的，卻在市場經濟、現代化發展中，慢慢地實現了，因此達賴喇嘛以及其流亡組織，對傳統西藏的慨嘆和失落與其說是針對中共，不如說應該是針對西方的現代化。但不論達賴喇嘛和流亡組織作什麼樣的詛咒，恐怕也無法阻止藏民現代化的決心。

第三、宗教世俗化:宗教世俗之意義有二:

(一)是寺院市場化:在傳統中西藏的喇嘛、活佛在社會上有著崇高的地位，他們不能也不應從事生產，而是接受傳統的奉養，然而在市場經濟的狂潮下，寺院中喇嘛，也不是被動地因應市場化而是主動地擁抱市場，對這些寺院而言，其實’當中共不斷翻新寺院，不斷開發寺院，以滿足外人探索西藏的神秘文化之際，西藏的寺院就成為觀光場所，寺院成了第一個接受市場經濟的窗口，於是信仰中心轉變為觀光中心，神聖的寺院本身商品化，使之不得不擁抱市場經

濟，依據中共的報導：「商品經濟的浪潮，從城市到農村，甚至已經波及到了寺院。著名的桑耶寺，每年因經營旅館、商店、跑運輸等經濟實體的收入達 200 多萬元人民幣；後藏扎什倫布寺，其屬下的剛堅公司、果樹林卡、茶館以及商店等的收入，每年也有數百萬元。西藏其他寺廟同樣在寺門口辦有餐館、商店、旅社等為信民服務的行業，以補給僧人的日常生活。」但是令人驚訝的還不僅僅是寺院的市場化。

(二)是喇嘛面的市俗化:從中共的報導來看，此一世俗的進程也包括了:

1、僧人生活的變化:首先，是生活方式的變化。僧人的衣食住行與俗人的距離拉近。世俗生活在活佛和喇嘛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增大。“文革”期間，許多喇嘛和活佛還俗，成為名副其實的俗人。進入 90 年代，喇嘛生活方式的世俗色彩更加濃厚。在藏北，中西部生活較富裕地區，年輕人不願當僧人，家長們也不願讓孩子去寺廟，造成部分寺廟青黃不接。藏傳佛教受到改革開放的衝擊，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的誘惑增多，一些僧人還了俗，經商下海，或者家中缺乏勞力。寧瑪派寺院每年僅有兩次集中念經時間，每次 7 天，其餘時間都在家務農務牧。挖蟲草季節，東部各寺則放假回家，守好家院管好牛羊，以便家人儘量多地挖蟲草。其次，是娛樂方式的變化。社會的現代化使喇嘛的學經和修煉的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毗鄰鬧市的寺院已容不下寧靜的禪座。藏區社會娛樂方式多元化：卡拉 OK、錄像、酒吧、歌舞廳等，使部分僧人抵擋不住其吸引力和誘惑力，導致有的僧人追求世俗生活方式，潛心學經和修煉的僧人減少。

2、活佛轉世制度的變化:在藏族傳統社會中，活佛轉世幾乎都必須經過嚴格的宗教儀軌加以認定；現在除了轉世活佛之外，自修活佛（如哲蚌寺的朗仁大師）和自封的活佛人數有所增加。還有的地方出現了假冒活佛，利用民眾的虔誠信仰招搖撞騙。

3、僧人傳統觀念的變化:由於受到現代觀念和世俗觀念的強烈影響，僧人的觀念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表現為：由苦行到享樂；由禁慾到開禁；由追求來世到注重今生；由無常到有常；由出世到入世。總之，喇嘛的神觀、人觀

和價值觀都賦予了世俗化的特點。

這一部份的世俗化應該是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最不能接受的部份，他們擔心長此以往藏傳佛教就有可能消失，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幾乎沒有不在現代化的趨勢之下做出相應的調整，否則此一宗教就將滅之，如古代的景教、光明教等不都是如此。中共也不認為市場化會導致藏傳佛教的衰落和消失。他們認為宗教世俗化最重要的後果是打破政教合一的神聖化制度。同時，世俗化社會也對神聖化與獨斷化的社會思想進行除咒。而且，以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來代替教條主義和權威主義。人們重視宗教的社會意義勝於其宗教意義。不同的制度有公平競爭的機會，在這種環境下有利於自願信教的信徒。因此，世俗化會造成更成熟的信徒。增強倫理與治療的功能，削弱經濟與政治的功能。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世俗化的結果並不會導致宗教的消失。宗教的世俗化是反映一種社會的理性化過程。所以世俗化只是使藏傳佛教發生了改變，使其傳統的作用衰減，這是藏傳佛教自身結構所必然引起的過程，但它並不會導致藏傳佛教永久的衰退，更不會導致藏傳佛教的完結，這也是藏傳佛教自身內在結構因素決定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藏傳佛教世俗化是一種改革，與社會主義相適應，與現代文明接軌，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藏傳佛教的世俗化，對它的傳播具有積極作用，易於為信眾接受，如密宗的“解密”，雖然存在分歧，但是客觀上有利於藏傳佛教的傳播和擴大影響（修身）。換言之，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也必須以新的觀念來理解藏傳佛教的世俗化現象，更進一步必須相信，「宗教」在人的生活必定扮演某種角色，而世俗化宗教只是宗教蛻變的必由之路、必經階段，每一個時代均有宗教，不因為科學、主義、暴力而互解宗教，因為人們對自然的認識永遠不可能寫盡，永遠都需要宗教的時代解答，來安撫人心，並激勵人心去求知、求真，從此一意義來看，宗教是人們的已知和未知對話的結果。

二、外國人看西藏

(一)印度人看西藏¹¹²:2004年7月印度記者團訪拉薩，一名記者在印度教徒報撰文，其重點為；

1. 中共當局精心維護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西藏博物館，中國人認為「藏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擁有豐富的歷史和輝煌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顆寶石…西藏的榮辱興衰與祖國母親的命運還一直緊密相連。」

2. 西藏城鎮繁榮，文章說：「拉薩東南183公里處的澤當有6萬人口，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將西藏發展作為工作重點，先後投入巨額資金，澤當的發展顯而易見。從新建的居民樓，到地方人大辦公樓以及醫院，到處都是建築物。或許在拉薩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你可能會遇見幾個乞丐。但當地人們的普遍穿著和健康狀況看，絕大部分人過得比以前要好得多。在中國，似乎每個人都有手機，無論在北京、成都、拉薩，還是偏僻的澤當，我的手機信號從未中斷過。」

3. 農民生活的變化：「擁有一棟兩層小樓的藏族農民拉珠現年63歲，原是農奴的兒子，他的生活和經歷正明瞭西藏的發展是真實的。拉珠雖然住在農村，但家裡從電視機、DVD到固定電話和手機一應俱全。在回答我們這些印度記者提問時，拉珠自豪地說：“我家年收入八萬元人民幣。兒子開出租，女婿是公交車司機。”看著拉珠家裡掛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的畫像，一位印度記者問：“作為藏傳佛教徒，為什麼沒有掛達賴喇嘛的像？”拉珠笑著回答：“我沒見過達賴，我沒有必要崇拜他！”拉珠說：“現在我生活非常滿足，除了以後去成都旅遊，沒有別的需求！”」

4. 佛教具有生命力，文章說：「在桑耶寺裡裡外外，我們看了許多慕名而來的外國遊客，有的在給和尚拍照，有的在拍攝壯觀的廟宇建築。當然，寺廟更是充滿生氣，僧侶們正在誦經堂內，念誦著經文。」

5. 西藏仍以藏人為主，文章說：「據西藏自治區最新人口普查，全區270萬

¹¹²〈數字讓謠言不攻自破 印度記者眼中的西藏〉，中國西藏信息中心/社會/雪域情結；
資料來源：<http://www.tibetinfo.com/shehui/shehu2004831160634.htm>

人口中，250 萬為藏族人。2001 年全西藏人口中 92%為藏族。為此，西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土登才旺向印度記者團明確表示：“絕大多數長住人口都是藏人。其實漢族人來這裡主要是為了工作，許多人到冬天都回家了！”」

6. 有關達賴喇嘛報導，引用區常務副主席土登才旺的說法「以往歷代達賴都留在祖國，沒有人像十四世達賴一樣逃亡在外，而且他還在從事分裂活動，企圖將西藏從中國分割出去。在這個問題上，就連普通的西藏群眾也不會答應。土登才旺強調，只有十四世達賴改弦更張，作一些有益的事，才会有” 落葉歸根” 的可能。」

(二)據 2002 年中共官方的統計到當年 10 月為止，「來藏訪問的外國政府官員、議員、外交官、記者共有 96 批 467 人。同時，來藏進行文化、教育、衛生、科技等方面交流或項目援助的外國專家學者、官員也有 284 批 847 人。」澳大利亞眾議院副議長認為：「1992 年，拉薩的主要交通工具還是為數不多的人力車，而現在則是出租車到處可見。從拉薩到日喀則的路上，我看到一些小山村已經有了電線，拉薩和日喀則則出現了許多新型建築。這些都表明，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泰國新聞代表團：「我們通過在西藏的參觀訪問，發現我們以前從西方媒體聽到的關於” 西藏是個可怕的地方、沒有自由、沒有人權” 的報導與現實不符合。我們實際見到的西藏是個美麗的地方。我們回去後，要把見到的真實情況客觀地介紹給泰國人民。」美國大使普里赫說：「在高高的雲層上是看不到變化的，在西藏的土地上，我看到了這裡的變化¹¹³。」

當然，外國官員、記者、遊客到西藏只是短短的七天到兩週，他們看到拉薩、日喀則、澤當等乃是西藏大城市，以走馬看花的方式所看到的西藏當然並不深入，可能為表象所迷惑。以外國人的所見評價中共的治藏政策是否成功雖嫌不足，用之以證明中共在藏人地區的現代化成效，則是綽綽有餘。用以證實藏人的社會變化也有一定的說服力。

¹¹³ 〈外國友人西藏行〉，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 年 11 月 28 日第一版；
資料來源：<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39/2060/328949.html>

綜合以上對比來看藏人的生活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的幾個方面：

第一、生活形態的變化：以往藏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形態已經改變成為「白天工作、晚上娛樂、假日出遊」的生活形態。消費的觀念大大改變，此種生活形態所表現的象徵意義在於代表西藏地區的藏人（至少城市的藏族）已經脫離了農業生產力，逐漸適應工業和商業社會的生活方式。以 2004 年的上半年為例，西藏的生產總值為 81.6 億元，比上半年增長 11.9%¹¹⁴。而 93 年的年底只有 37.3 億元¹¹⁵，重視個人奮鬥，重視現世幸福的生活，此種生活自然與傳統的宗教為生活重心是大有差別的。

農民的生活大大改善，據 2003 年 3 月 24 日新華社的報導：目前已有 156 萬 8 千 1 百農牧區的人民參加區合作醫療，此一數字佔全區農民 74.26%。農牧民收入增加之後，醫療健康的觀念和需求也大大不同，生病之後，不再以傳統的藏巫來治病而相信現代醫學。隨著收入的提高藏民的宗教生活亦隨之而變化，其總的方向是朝著越來越是世俗化的方向發展，此即信仰成為需要而漸漸不再扮演真理和價值的功能。個人的觀察為：

1. 宗教對當代的藏族青年已經不具世界觀的意義，只有工具性的意義。因為從次仁（訪問中的藏族青年）的生活來看，宗教是為次仁服務，而不是次仁為宗教奉獻。在次仁的價值觀中，現實生活的富裕遠比來世的幸福更重要。

2. 我們也可以發現在「藏青」生活中，作為補償的不再是宗教，而是現實勞動之後所獲得社會報酬，並將報酬轉為物質的享受，這一點連次仁的祖母拉姆的看法也在改變之中。

3. 我們也發現「藏青」目前雖然仍對寺廟有所供奉，而且佈施的金額也相當可觀（相對於藏胞的生活水平而言），但是顯然的這些佈施是在滿足自己的生活要求之後，行有餘力才作佈施，而不是傾其所有的奉獻，足見在信教方面昇

¹¹⁴ 〈上半年西藏產值突破 80 億元〉，中國西藏信息中心/經濟/經濟透視；
資料來源：<http://www.tibetinfo.com/jingji/jingji200472793751.htm>

¹¹⁵ 〈西藏經濟：從蹣跚學步到跨越發展〉，中國西藏信息中心/經濟/經濟透視；
資料來源：<http://www.tibetinfo.com/jingji/jingji200259164614.htm>

華功能也被替代。

4. 在新華社的文章中也說明了，像次仁這樣的藏族青年也不少。換言之，在「改革、開放」中共充分利用物質的誘因，改變了藏族青年對宗教的依賴，是以原來的宗教的規範也逐漸為金錢和新的法律等關係所取代。

第二、信息成為生活的依賴:由於西藏的城市地區已經進入工商業的生產力，所以信息變成十分重要的生活憑藉，根據中國移動的GSM網以覆蓋西藏自治區7個地方72個城市¹¹⁶。另根據報導「1997年底，拉薩開通了通過衛星傳送的網際網路服務業務，使久居高原的人們眼界豁然開闊。然而，由於受太寬限制，上網速度很慢，經常掉線，同網下載一條資訊需費很多周折。1998年6月，蘭州至西寧、拉薩的電信一級光纜幹線開通，標誌著西藏資訊化建設正式起步。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全區7個地市全部通光纜，75個縣級單位中有65個通光纜，地區到縣的帶寬為2M，75個縣均通電話並有衛星地面站（寬64K）。在通光纜的65個縣可以通過撥號方式上網，拉薩到北京的帶寬622M，目前正申請擴容到2.5G，「十五」期間將實現縣縣通光纜。在通訊基礎設施建設飛速發展的同時，行業網路建設也有了較快發展。自治區黨政機關的內部政務網已建成投入使用，財政、稅務、金融、海關、教育、科技等行業的資訊化建設迅速發展，初步形成了以拉薩為中心，輻射全區七個地市的資訊網路。在拉薩和地區級城市，電腦已進入一般百姓家，網路成為人們生活的組成部分，電腦正在雪域高原逐步普及¹¹⁷。」雖然此一數目與大陸其他城市相比仍有距離，但成長的速度是很驚人的。另外，拉薩地區開始出現家庭訂報，在拉薩的街頭也出現零售報刊的小攤販，這些現象說明藏人開始依據信息來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依賴宗教來安排，這代表藏人開始適應變化不斷的生活，也代表藏人開始從心理上超越了自己的生活地區關心生活以外的地區，也代表藏人開始以知識作為生活的基

¹¹⁶ 〈西藏實現縣縣通動電話〉，中國西藏信息中心/電信/電訊動態；
資料來源：<http://www.tibetinfo.com/dianxun/dianx2004827155152.htm>

¹¹⁷ 〈信息化建設造福高原人民〉，中國西藏信息中心/電信/互聯時代；
資料來源：<http://www.tibetinfo.com/dianxun/dianx200377101757.htm>

礎。從長遠來看，這些變化都是代表根本意義，本質意義的變化。

第三、漢化藏族的傾向：在中共統治了五十餘年之後，漢族文化在藏區已經成為一種主流文化，雖然在藏的幹部也十分努力保護和發揚藏族文化，然而在西藏地區藏族自己的文化卻需要保護本身就已經說明了問題的存在和嚴重性。我們相信這也是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最為憂慮，也最為憤怒之所在。但是我們以為從歷史或是世界上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的衝擊來看，其實任何一個相對落後地區的文化幾乎都是同樣的命運，以達賴喇嘛所在的達蘭莎菀而言，難道當地的藏胞不也是印度化、西方化嗎？達賴喇嘛在挑戰中共政權時，所使用的自由、人權、民主等價值和詞彙不也是西方化的結果嗎？大家都承認藏族自有其十分優美的文化傳統，但是在以前孤立的藏族文化，並沒有漢化的問題。關鍵在改革、開放之後，藏族人民與外界有了普遍的接觸，從而有了比較也有了選擇。對藏族而言，漢化是現代化的捷徑，因此出現了漢化的現象，也是一種自然的趨勢。達賴喇嘛如果以為把漢族趕走，藏族就可以保留其傳統，恐怕只是一種美麗的錯誤而已。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則可以看出目前藏民的漢化可能是一種工具的現象，而未必是一種自身文化的否定。無論如何，如果藏族的精英理解到現代化的意義，則應該對藏民的漢化現象加以誘導，加以對話，以便對未來藏文化的自覺有所幫助的，一如現在中共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樣，可以提出藏族特色的現代化，作為藏族奮鬥的指標。

第四、失根危機的隱憂：藏族的現代化比起漢族而言，又多了一層障礙，因為藏族是透過漢族來看現代化。這種現代化出現兩種情況：

1、是漢族在中共統治下以贖罪來協助藏人現代化，於是採取了「輸血」的方式來加速藏區現代化的進程，於是形式的變化大大超前新內容的吸收，結果藏區的現代化形成了設備和使用上的落差，精英和大眾的落差，出現了市場超前化的趨勢，此一趨勢代表了基建投資的浪費，代表了使用不具市場規模，因此藏區的現代化是帶有政治成績大於經濟成績的意味。

2、是藏人在面對新的物質現象衝擊，失去了自我定位，也來不及自我消化，

因此特別表現在青年人身上，對自己藏族文化產生了一種不信任感，從不願意學習藏族文化，同時在西藏的地方政府，也不自覺地將藏文化商品化，於是能從藏文化本身來反省現代化以及與商品化對話的可能就降低了，結果藏族的現代化將與本身的否定成正比。

雖然從其他民族和地區的現代化來看，遲早藏族人民在現代化的歷程，仍會找到自己民族的定位，問題是屆時將付出重大的代價，也仍然不易挽回已失落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達賴喇嘛的憂慮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以詛咒中共的方法企圖阻止藏區的現代化，則只是以一種錯誤的方式企圖去阻止另一種錯誤而已。何況，達賴喇嘛特別是其流亡組織也具有濃厚的政治野心。因此，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的作法，也是以政治干預藏胞現代化的選擇而已。

第五節 小 結

從有限的資料，我們明顯地覺察到西藏地區受現代化趨勢的衝擊，確實出現了變化，而且是十分巨大的變化。面對變化，中共將之視為成績，而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視之為災難。我們以為成績並不全然為中共所獨有，而是現代化本身的力量，才是決定的因素，中共只是現代化的新推手而已。反之，視為災難，不應該忘記此一趨勢不是中共製造，而是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透過不斷地擴張、侵略和意識形態社會化的過程，所造成的全球趨同的全球化現象。面對西方基督文明，作為東方宗教，東方的文化是必須有反省的能力，才能將趨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化被動的現代化為主動的現代化。不能照搬，也無需詛咒；努力的理解、正確的調適，才能使現代化為我所用，才是理性、健康的心態。

其次宗教世俗化的現象究竟是一種可以責備的現象，或是宗教在面對現代

化時必然的，甚至是宗教本能的反應呢？從宗教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宗教是存在于人的社會之中，是以當社會轉變的時候，宗教也不可能單獨落後於社會，否則宗教必遭淘汰。我們看看西方社會在十五世紀的宗教革命，也不就是宗教世俗化的一次重大的改革，使基督宗教的聖經方言化，從人人都可以讀聖經，人人都有權解聖經這才使得基督宗教歷經十七世紀以來的理性主義、科學主義與現代文明等種種嚴格的挑戰，而在二十一世紀仍有數億的信徒，而且能在近代科學的基礎上解決人們的疑惑。換言之，宗教世俗化本身對宗教就是一種挑戰，只有經得起宗教世俗化挑戰的宗教才能歷久彌新。在世俗化過程中，必然有人警呼「世道中落」、「古風不存」，一如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的反應，但是藏胞的現代化不是任何人或任何政權所可以遏阻的，這是人性嚮往在世完美的一種本性恆力。宗教作為社會現象的一種也只能自我改革去適應變化。所以藏傳佛教的世俗現象只要不是中共以政治暴力去改造，而是政權推動現代化的結果，則外界就很難去指責，在西方拍攝的電影「高山上的世界觀」也是在描述電視進入達蘭沙拉的寺院之後，喇嘛不得不同意小喇嘛熬夜看世界杯轉播的情況。而影片中更深一層次的意義，還在於說明這一個小小的視窗如何打開了封閉的山區，古老的信仰和幽閉的神秘，因此在達藍莎菀的寺院中訓練喇嘛的方式也在更改，也是世俗化的道路上前進。

因此，把傳統神聖化而面對世俗化大加撻伐，事實上只是對傳統的加害而非保存。任何純粹都是在世俗化的過程中調適自我，展現新生命，才有保存的價值。個人曾在一篇論述「中共管理宗教之變遷」的論文作了以下的結語：「藏傳佛教千年以來受到地理的保護，孕育了本身十分優美的文化，是人類文化遺產中十分重要的瑰寶。如今地理的保護因政治和科技而不復存在，任何優美的過去都必須被視為過去的優美，只有在優美過去的基礎不斷發揚、光大和發展，才能使優美延續至今而至未來。」如今重讀，個人仍然可以作為本文的結語。

第六章 藏區開發中中共與達賴互動

第一節 達賴特使訪問大陸之研析

一、事件

2002年9月9日中共接受達賴喇嘛派遣的私人代表，他們是達賴喇嘛駐美國代表嘉日洛智堅參、駐歐洲代表格桑堅參以及二位助理：西藏流亡組織之國際關係與宣傳部副秘書長索南達波、國際聲援西藏中心主任普瓊才仁等四人訪問北京，之後並赴四川、拉薩、林芝、日喀則、上海等地訪問，前後近十六天（2002年9月9日~24日）。事後按西藏流亡組織所發表的聲明，達賴方面對此行的收獲評價不低，他們說：

我(嘉日洛智堅贊)和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代表格桑堅參這次前往中國和西藏有兩個任務：第一是和中國領導人之間重新建立關係，為未來在我們之間舉行面對面的談判創造良好的環境。第二是向中國領導人說明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為了解決西藏問題而提出的互利的中間道路。我們在訪問期間為完成以上特別任務和消除彼此的疑慮、增加信任進行了最大努力….

我(嘉日洛智堅贊)和格桑堅參及兩位助理於2002年9月9日抵達北京。在北京、拉薩和其他地區會晤了各階層領導，而且他們介紹了西藏發展建設項目的實施。特別是藏人領導們的熱忱和能力所感動。而且，他們對西藏發展方面所作的努力表示贊賞，同時呼籲對西藏獨特的宗教、文化、語言等的發展也負起同樣的責任。另外，他們介紹非常重視保護西藏環境，對此問題我們也表達了我方的看法。

我們在藏人領導中會晤了全國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西藏自治區人大主任、副書記熱地、西藏自治區政府主席、副書記列確、西藏自治區統戰部

部長桑珠、四川省政協副主席阿成等。

我們參觀了拉薩的大昭寺、羅卜林卡、噶丹寺、扎什倫布寺、江孜八關佛塔等。由於我們在西藏的停留時間較短所以沒有機會和廣大的西藏人民進行接觸。...

我們盡量想方設法創造了藏中關係新篇章的基礎，我們知道這一目的不可能在相互接觸一次就會有良好的結果，對此各方面要繼續努力。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和噶廈（內閣）噶倫對我和格桑堅參的這一工作的支持和幫助深表感謝。這次的所有情況向噶廈作了匯報¹¹⁸。

此一事件對敵視、冰凍而且互不信任的中共與達賴喇嘛雙方自然是一件令人意外而突破的發展，雖然中共方面對達賴私人代表來訪採取十分低調的態度，只在9月10日由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記者會中，以答詢記者問題的方式，表示「承認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是旅居海外的藏胞，他們以私人身份到中國訪問，我們歡迎他們回中國親眼看看西藏和其他藏族自治區域的發展。」在中國大陸內部除了這一則消息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相關的報導，也沒有任何評論，但無論如何這是雙方自1993年以來第一次的正式、官方、公開的接觸，應該說是意義非凡。從外界的角度來看，仍然對中共何以接受、同意達賴的私人代表訪問大陸，雙方此次接觸的意義為何，對日後雙方互動有何影響，充滿了想像空間。本文針對上述的疑問作一些推論。

二、中共的考量

探究雙方重新互動的真正原因，從外界來看，目前的資料十分欠缺，很難真正探究其原因，不過我們可以從雙方的內在需求來推論雙方是如何考量、如何推論。

按中共內部的工作程序，則此次接觸的先期作業模式大致是：

第一：達賴喇嘛方面主動派人多次試探，最後是7月達賴二哥嘉樂頓珠送

¹¹⁸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特使聲明(全文)〉，西藏之頁，2002年9月30日。
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209/index.html>

去較為確定的信息。何以判斷是由達賴喇嘛方面主動，主要的原因是從中共目前治藏工作的內外環境並沒有異化的變化，從國際壓力到地方情勢均無異常現象，特別是今(2002)年上半年中共成功地派出西藏地區的訪問團出訪，藏青鐵路的施工，西部大開發的啟動等種種跡象，都看不出中共在處理西藏問題本身的急迫感。

第二：中共有關單位將相關信息綜整、呈報，並作出決策之分析與建議。此次的接觸極可能是在印度方面的正式管道中止之後，達賴喇嘛重新嘗試以美國、歐洲的管道重建接觸的努力，也不排除有多種管道的嘗試。不過此次的所有信息的傳遞，大概有一個特色：沒有委託外國人，個人相信如果在接觸中有任何外國人，則事情必然不成功，因為有外國人作中介，中共必然猜疑。其次若有外國人作中介，必然無徹底保密，不是說外國人不保密，而是外國人有自己的國家利益。

第三：上級領導作出可以秘密性、試探性接觸，基本原則是堅持立場，邊走邊瞧，見好再續，見壞就收。中共領導階層在這一類事件的考慮上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政治考量，一是行政考量。政治考量上主要表現在作此一事對黨、對國是否有利，對個人(或決策集體)是否有利，特別是一旦失敗，對個人(或決策集體)是否有害；所謂行政考量是如何進行，可以達到利益(不論是國家、黨或個人)極大化，反之是一旦失敗，如何可以使損失極小化(不論對黨、國家或是個人)。

第四：在多次接觸之後，雙方大致尋找出兩造可以接受的模式方案，同時中共也必然從其他不同管道有過測試，大致確定無誤之後，便進入行政考量，考量原則是如何保密以及來訪之後的行程、接見、會晤人選、評估國際和大陸對此事件曝光之後的反應，以及後續的因應對策。

在行政考量中，中共最重視的是保密，因為行政上若不能保密，必然傷害到政治利益和政治目的，保密的方法是愈少人知道愈好，必須要知道的愈晚知道愈好。

至於中共之所以傾向願意嘗試重開與達賴喇嘛的接觸之門，個人以為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共對自己的治藏政策和治藏工作開始比較有信心。事實上，中共在今(2002)年釋放了六名被控犯有政治罪行的藏胞，放鬆了外國記者赴西藏的採訪，以及派出西藏文化訪問團等舉動，都是直接、間接地代表了中共在這一方面的信心。當然有不少外電猜測中共此次的政策轉變是為了江澤民訪美而作的宣傳，然而此一猜測個人以為多少是忽視了中共內部的工作程序，而且也忽視了達賴喇嘛和流亡組織的角色。事實上，江不是強人，反之，胡錦濤是從西藏發跡起家的，因此，個人以為中共領導階層在西藏問題，胡是不會沒有發言權的。而在中共權力接班之際，作出如此巨大的調整，不是江澤民一人說了算，而是必須有一定的作業流程及黨中央的同意，在此情況下，有資訊顯示中共與達賴原來的協議是明(2003)年春季雙方接觸，其後應達賴喇嘛方面二度要求，先是提早為今(2002)年12月，繼而又提早為今(2002)年9月(註：這一部分資料為大陸學者提供，僅供參考)。在同時站在達賴喇嘛的立場，他們一貫敵視中共，仇恨中國，他們何必在此時對江澤民伸出援手，因此除非我們可以證明此次會面是中共方面主動，而且達賴喇嘛和流亡組織也不反對，並且願意配合，否則會晤和江的訪美就可能是一種巧合而已。當然中共對達賴喇嘛策略的改變也有其他考量，這裡包括了國際形象、反「華」統戰、分裂藏獨、戰略制美四大因素。

首先是重建國際形象：中共自上世紀末開始大力推動睦鄰外交、夥伴外交，領導人紛紛出訪，加大了在國際上宣傳的力度，但是由於制度、價值、文化的不同，加上不時出現的異議人士、分裂份子到處的示威，以及國際反華人士的鼓噪，因此中共在國際形象的改善十分有限。本世紀中共全面融入世界，申奧成功和進入WTO都可以說是具體的成果，但仍然對上述的形象並沒有很大的改變。倘以達賴喇嘛作為突破口，肯定對中國愛好和平，中國是具有理性可協商的國家形象建立是有幫助的，特別是在法輪功事件之後，中共迫害宗教的印象是根深蒂固的，而達賴喇嘛的接觸顯然也可以對國際反華人士攻擊迫害宗教是

一個很好的反擊利器，當然形象重塑是一件長期性的工作，一次的接觸不可能完全改變，但至少是一個開始。換言之，與達賴喇嘛的接觸是中共考量其在國際上的得失，我們只看他所允許訪問大陸的達賴私人代表的另一身份，就可以理解中共的企圖，他們是達賴喇嘛駐美、駐歐，以及公關宣傳的人士，所以我們以為這是中共一個比較戰略性的考量。

其次是分化反華統戰：目前在國際社會中反華的勢力一共有六股力量，分別是海外民運人士(主要是反共)、法輪功信徒(主要是反江、反共)以及台獨、藏獨、蒙獨、疆獨。而其中持續最久，在海外知名度最高也明顯獲得國際力量支持最明確的，就是達賴喇嘛為首的藏獨，因此可以合乎邏輯地去推論，一旦達賴喇嘛放棄了反共、反華的立場和中共接觸、協商、談判得出一個結果的話，對海外其他反共、反華的勢力都是一種沈重的打擊，也就是一種危機，反共、反華的海外勢力其內在一體性就可能被摧毀，至少是大大削弱。換言之，中共自從本世紀初提出對統戰工作檢討之後，我們已經看到中共在國際統戰方面的具體工作，就是從達賴喇嘛入手，逐步瓦解國際華人圈的反共力量、反華力量，最後孤立出階段性的敵人加以打擊。

其三是分裂藏獨勢力：中共一貫認為打擊敵人最容易的是從他們內部的堡壘攻破，而深入敵人內部的方法就是分裂敵人陣營。在海外的藏胞中，很明顯從表面宣傳來看，有主張激進藏獨的，有主張策略性自治的，不論他們真正的企圖為何，對中共而言，那怕敵人「些微的、暫時的、不確定的矛盾」也不應該放過，甚至對沒有明顯矛盾的敵人，中共也想辦法加以區分，如錢其琛區分廣大的民進黨員和頑固的台獨份子就是一例。總之，接受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自然就將達賴喇嘛及其信仰和世界藏族青年大會的頑固、激進份子加以區分，一面使達賴喇嘛的主張在藏族中有更大的迴響的空間，一面也孤立了激進的藏獨派，所以接受達賴喇嘛私人代表的訪問對中共而言，是一種立於不敗的統戰作為。

其四是強化戰略制美：自從「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出兵推翻阿富汗的

塔利班政權，同時也借此次戰後之便，美軍得以進駐中亞地區，美軍的常駐中亞，一方面控制俄羅斯進印度洋的咽喉，一方面也形成對中共的戰略包圍的態勢。對中共而言，中亞各國原本被中共整合進入上海合作機制，不料「九一一事件」引入美國力量的介入，這使中共原來的優勢部署相對弱化，然而美軍已入侵中亞，自然就不可能放棄此一戰略要地，因此中共必須著眼美國勢力已經存在、繼續存在，而影響力不斷擴張的基礎上，重新佈置中國自己的中亞新戰略。以此思考，除了新疆的部署之外，西藏地處南亞之北、中亞之東，倘能徹底解決西藏問題，日後中亞一旦有事，西藏之軍便可以毫無顧忌就近馳援，則西藏駐軍便只是對內鎮壓分裂的角色，無法兼顧中亞。是以西藏問題的解決在此時此刻也是帶有戰略意義的措施，在此新環境的挑戰，解決達賴喇嘛問題，便從解決人的問題上升成為解決中國中亞戰略問題的助力或阻力的問題，同時也預防美國的勢力從西部和西南同時包圍的形勢。

三、達賴流亡組織的考量

從西方媒體對此一事件的反應來看，絕大部分都認為這是為中共江澤民訪美所作的宣傳，在此一猜測的背後，他們都必然地假設了是中共主動向達賴喇嘛示好。

他們的論據是達賴喇嘛是一貫要求與中共接觸、談判，是中共拒絕達賴喇嘛。個人以為如果是中共方面主動要，則中共對達賴喇嘛放寬條件，達賴喇嘛又何必替中共守密，而不向國際宣傳中共的讓步，以爭取日後雙方談判的主動權呢？同時中共既要為江訪美鋪路，理應將此事在國際上大作文章，但是中共與達賴喇嘛都沒有這樣作。事實上依中共政權的性格和集體領導的政治文化，在原則上恐怕很難有讓步的可能，何況在權力接班的過程中，江、胡更不可能在原則上讓步，否則江掌控不了接班主導權，胡則可能接不了班。因此，個人認為事件的推動必然是達賴喇嘛方面積極主動，而中共政權順水推舟。以目前的國際形勢對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而言，我們以為也不是十分順利，特別去

年「九一一事件」之後，達賴喇嘛並沒有發表聲明悼念美國的受難者，其後的聲明也沒有全力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反而在去(2001)年10月24日在歐洲議會講演提到：「在人類邁向地球村的現代，通過暴力—特別是通過戰爭來尋求解決糾紛是不行的」，他還特別說：「通過九一一恐怖事件，我們要吸取教訓，為了產生以和談、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彼此糾紛的文化而必須具有為世界負責的意識¹¹⁹。」

作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達賴喇嘛當然有其和平非暴力堅持的一面，但是以美國利益為最高且唯一原則的美國，恐怕並不滿意於達賴喇嘛的聲明。今(2002)年達賴喇嘛在「九一一」週年的講話上又呼籲「非暴力」原則解決「九一一」事件所產生的爭議，他還說：「任何一個國家再也無法奢望完全殲滅敵人，或是軍方贏得全面勝利，更何況世人並無永遠的敵人…，今日的敵人突然搖身一變成為明天的盟友¹²⁰。」以美方目前的單邊主義霸道作風，自然也不會滿意於達賴喇嘛今年的講法，這對達賴和流亡組織而言自然不是有利的情勢。

因此次的「會晤」在達賴喇嘛方面可能包括了以下的的考量：達賴喇嘛的年齡威脅、美方反「恐」影響—中美關係改變，藏人失去原有的著力點，以及中國日益強大與重視海外藏胞工作的壓力。

從達賴個人的年齡來看：達賴今(2002)年已經67歲，能繼續與中共週旋的日子越來越有限。對中共而言固然要對付一個沒有達賴喇嘛領導的海外反華藏人，其實是有得有失，失是指失去一次解決的方便性，得是藏人分裂反而可以給中共統戰工作增加許多的機會；但是對海外藏人而言，失去此一政教領袖，內部的權力鬥爭、整個流亡組織的派系爭奪，必然趨於明顯，這樣一來，一方面影響戰鬥力，一方面也影響外國勢力的支援，所以達賴喇嘛的存在對海外流亡藏人的重要性是遠遠大於對中共解決西藏問題的困擾，因此趁達賴喇嘛尚能

¹¹⁹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的講話〉，西藏之頁，2001年10月24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hhdl/OUzhou.html>

¹²⁰ 〈達賴喇嘛發表「九一一」週年聲明〉，西藏之頁，2002年9月11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209/index.html#020911.1>

清楚議事的情況，與中共重開接觸，對主張和平、自治解決西藏問題的海外藏人而言是比較有利的，比較能團結更多的藏胞，成為解決問題的主要路線。

從「九一一事件」而言：「九一一事件」對海外藏人的影響有二：一是對原來堅持採取暴力路線、武裝路線，爭取西藏獨立的海外藏人，如藏青會集團而言，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他們所爭取的路線一旦被定位為「恐怖主義份子」，則西藏問題解決就不可能獲得任何公開的支援，所以「九一一事件」使他們不得不慎重考慮改變他們的路線，回到達賴喇嘛所號召的「和平自治」的路線；二是由於中共在反恐問題與美國的合作，以及美國在國際反恐作戰中對中共支持的需要，無形之中壓縮了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我們只要看從「九一一事件」以來，達賴唯一登上國際媒體的就是此次與中共的接觸，就可以知道國際的現實，此一國際情勢的轉變使得達賴喇嘛在國際上可以運用二手策略的機會大大降低，這就逼使達賴集團不得不認真的思考與北京如何開啟對話、協商的可能性。

其三是對中共新領導人的疑慮：從目前的資訊來看，胡錦濤接班已成定局，對達賴喇嘛和流亡組織來看，不免會觸及「1989年3月胡下令鎮壓拉薩喇嘛的暴動」的難堪，在此情況下，對海外藏胞而言，是與目前的江澤民恢復接觸比較容易或是與胡錦濤重新搭橋比較容易呢？顯然胡在接班之初根本無暇顧及達賴喇嘛問題，在此情況下，中共的對達賴政策必然是墨守成規，所以如果有可能在江澤民時代改變，肯定比在胡錦濤時代改變應該是容易得多。而「十六大」之後，江雖然退（不論是全退或是半退），但其影響力依然存在，因此如果在江時期已經打開接觸之門，新領導必定是「江規胡隨」，則西藏問題就有機會在達賴喇嘛有生之年解決有望。不論這是否帶入過份的期許，但在邏輯上是有可能的。

其四就是中國的日漸強大以及中共政權最近一、二年不斷派遣西藏文化訪問團：西藏地方官員直接率隊出國訪問，借官方之便傳播西藏的第一手資料，從而大大影響海外流亡組織在國際上宣傳現況的獨佔性，中國的日漸強大的趨

勢，一方面使得中共政權更有機會在國際上發揮其影響力，使得流亡組織在國際上的活動、宣傳效果大不如前。另一方面中共政權也更能大力支援西藏，改善藏胞生活，拉大拉薩與達蘭莎拉的差距，而且也大大影響了藏族青年對原來西藏文化的熱衷。外電報導指稱：

許多西藏和尚已經放棄向外國人要達賴喇嘛照片的老做法。個別的藏人仍然藏有達賴喇嘛照片，但他們已經停止了公開抗議。西藏政治犯人數最近幾年逐步下降，越來越少的和尚和尼姑願意冒險抗議。

同時，北京正在通過對這個貧窮地區輸送資金來買支持。北京在 2001 年到 2005 年給西藏地區分配人民幣 900 億元(超過 160 億美元)，比過去半個世紀的總和還多 50%。西藏 90%的行政經費都是靠北京，同時中國正在興建投資 40 億美元的進藏鐵路。

共產黨官員聲稱他們把西藏帶入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這種說法太誇張，西藏仍然是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但經濟的確在繁榮。

在爭取西藏靈魂方面，中國官員理解時間在他們一邊。漢族人大量移民正在改變拉薩的面貌，漢語已經成為當地政府和商業的主要語言。西藏少年說他們仍然信仰佛教，但他們很少有時間去寺廟。他們承認對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了解比父母要少得多。

中國的流行文化、電視、電影和音樂正在變得越來越強盛。在拉薩的夜總會，藏人經常用漢語唱歌，因為那「更時髦」¹²¹。

相對而言，流亡組織的影響又無法公開地、順利地伸入西藏地區，因此除非和中共談判，否則海外藏人必然有一種邊緣化的感覺。除此之外即使是在海外，中共每年大約總有兩次派遣西藏的文化代表團以及藏族官員出訪，這將使得海外藏人的直接鬥爭的對象從漢族官員轉為海外藏人對西藏藏胞之間的鬥爭。對海外藏人而言，如果不去抗議，則就是認同這些藏胞，那麼外國對他們

¹²¹ 同註 1。

支持肯定下降，如果抗議，這種抗議和鬥爭就變得十分不得人心而且荒謬，藏人抗議自己同胞，抗議自己的文化表演，則抗議正當性何在？總之，此一趨勢的發展必然使海外藏人在西藏問題的著力點將從原來的族群意識變成族內之爭。個人以為這也是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最終必須和中共會談的考量。

四、結果

以目前的資料和形勢來看，其實是無法預估未來的可能發展，但從各方的反應來看，似乎此次的私人代表訪問是一次雙贏的接觸，從西藏流亡組織自己的反應到國際上各國的反應，大致都是肯定，尤其是流亡組織達賴本人對此次成功的訪問均有相當的期待。

首先從西藏流亡組織的反應：除了正式的聲明(如前文所摘)，在聲明主動肯定了中共之西藏當局對發展西藏，保存並發展西藏獨特的宗教、文化、語言、環境的努力，同時也肯定治藏官員的熱忱和能力，對北京聲明中說「比起當時(八〇年代)的中國領導人，感覺現在的中國領導人邁向了開放」，這種對中共官員和治藏官員的評價在以往的西藏之頁網站上是看不到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流亡組織立即發出一個極端示好的信息：

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二日呼籲支持者，在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本月稍晚訪問美國和墨西哥期間，不要進行抗議活動，以便為爭取與北京恢復對話創造氣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向流亡海外的藏人發表聲明，他說：「正當國際社會面臨恐怖主義、暴力和戰爭叫囂威脅時，藏人停止示威將是我們要求對話、非暴力及和解的積極姿態。」聲明特別呼籲，流亡海外的藏人不要在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本月稍後訪美時舉行反華示威¹²²。

當然最後一段是流亡組織用以考驗中共方面此次與達賴喇嘛接觸是為江訪美的權宜之計，或是認真解決西藏的開始。

¹²²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將訪問蒙古共和國〉，西藏之頁，2002年10月30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c.org/b5/xzxinwen/0210/index.html>

西藏流亡組織除了在正式聲明對此行給予極高的評價和期待之外，在其他的宣傳上仍然對中共政權有所批判和攻擊，可見在流亡組織也十分小心謹慎。至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反應也是十分正面，但是仍有習慣性的懷疑，如美國政府就表示：「這是(雙方)增進相互瞭解的機會，也是重要的一步」，美方相信「對話能夠解決雙方長期的歧見，並為西藏人民帶來更多自由，包括宗教自由。」有些媒體稱：「產生了正面的效果，不過雙方長久以來的歧見仍深，很難克服」。總之，一般的國際輿論都表示了樂觀其成，但也清楚了解問題的困難程度，特別是中共在「十六大」前夕改變對西藏政策的可能性是一種不合中共慣例的轉變，所以大家都強調繼續觀察的重要性。

但是在各方熱烈期待之中，作為談判要角的另一方中共，對此事的反應則極為冷漠。從中央到地方都沒有任何報導，中共這種只作不說的方式在以往並不多見，或許此次的訪問在中共中央的內部尚無一致性的意見，有人主張從大戰略的角度不妨一試，有人則對達賴喇嘛的「形自治，實獨立」的主張大不以為然。有人認為在過去十餘年在大陸內部有關達賴喇嘛的問題已經定性、定調，如今與之接觸，一時之間很難自圓其說，以致此次訪問不得不以淡化的方式，以便有時間在對內的政治社會化中逐步調整。另一種可能是先對此次雙方試探性的接觸作出效果性評估，再來決定下一步政策應如何進行，因此暫時不作宣傳，以保留未來的彈性。以上的三種可能性，個人以為最後一種可能性是機率最大的一種。果如是，中共將如何評估此次接觸的得失呢？

第一：對國際的反應中，中共特別重視是各國政府和輿論是否將此次的訪問定位為「兩國」的接觸，因此他們不但是閱讀國際輿論中贊揚接觸此事，而且是注意這些輿論從何種角度來贊揚。

第二：對達賴喇嘛而言，雙方立場第一次坦誠的、直接的說明，此一說明無助於雙方理解對方的立場，但是開啟善意溝通之門，而後中共會「觀其行」，看看達賴喇嘛如何做，特別是達賴喇嘛每年三月固定發表的講演，將是決定中共與達賴喇嘛關係走向的里程碑。

第三是對流亡組織實力的考驗：從宣傳上說，流亡組織十分刻意強調這是「兩國」之間「一名外交官對另一外交官的形式進行¹²³」，「這是中國與流亡政府的官方接觸¹²⁴」，或是說訪問「西藏首都拉薩¹²⁵」。我們以為中共政權未必真正在意，因為中共出面會晤是統戰部長、民委副主任與各地方官員，這就已經說明了一切。不過中共會很注意流亡組織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所呼籲的不對江澤民訪問墨西哥、美國進行示威抗議，這是提供中共檢視流亡組織在海外藏人心中影響的最佳佐證。如果是十分有效的，我們相信中共的新領導人有可能尋此途徑與達賴喇嘛進行會談；反之，中共對達賴的政策改變的可能性相對比較有限。依其後發展來看，雖然江澤民訪問的沿途仍有藏民抗議，但是在規模上是比過去為小，對中共而言，又有了新的困擾，這是應該解讀為流亡組織的影響力，或是影響不全面，不過無論如何一次的證據，仍不足以論斷。

五、綜述

中共政權突然公開與達賴私人代表見面一事，從研究中共與達賴喇嘛互動的半世紀歷程來看，確實是十分突然，此一突破對僵持已久的兩岸關係有何意義？我們從目前有限的資訊來看，此一突破是建立在：

第一，秘密管道的磋商結果：我們認為在嘉日洛智堅參和格桑堅參等四人獲准訪大陸之前，中共和達賴私人代表之間必然是經過反覆不斷的磋商，包括入境的身份、方式、行程、會晤人員等，否則不可能成行，所以秘密管道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在磋商中任何一方公開會談的默契，則必定不可能有此次的會晤，因此在雙方完全無互信的基礎上，只要雙方仍然有解決問題的意願，則秘密交涉是可以嘗試作為建立互信的第一步。

第二，尋求各自表述的空間：在雙方基本原則差距極大的狀態下，不可能在一開始就要求對方放棄其原先的原則立場，而為了雙方會晤得以進行，相互

¹²³ 〈達賴特使稱中國之行取得突破百分百〉，多維新聞社，2002年9月30日。

¹²⁴ 同註 1

¹²⁵ 同註 1

尋找一個可以自圓其說的彈性空間，是開啟接觸十分重要的智慧，以此次接觸為例，中共稱是私人訪問，安排的官員只有統戰部、民委和地方官員，是以十分符合中共自己政治邏輯，因為對象是私人性質的訪問，有統戰價值的海外藏人，所以統戰部、民委出面接待安排，對達賴喇嘛這一方面也講得過去，中共是派了部長級的官員接待和會談，所以是政府對政府，這就是各取所需的方式。

第三，利用國際環境：此次的接觸在某種意義中共與達賴喇嘛雙方都利用了「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國際新形勢，中共希望藉此徹底解決達賴喇嘛困擾，加強其對中亞的戰略態勢，而達賴喇嘛在美國同意將疆獨納入所謂「反恐」對象之一，加強所謂「反恐」戰爭，以及美國與中國關係的明顯改善，因此利用「九一一事件」改善與中共政權的關係，也是一種親美和獲得美國人士同情的方法之一。雙方都在相互利用國際環境上出現交集，出現合作的可能，而達賴喇嘛這種對國際環境的認知和利用國際環境的變化，我們以為這對台灣如何正確解讀國際形勢，利用國際形勢，重塑兩岸關係應有十分重要的啟示。

第四，利用中國大陸的變化，創造有利空間：大家都知道中共將在11月8日召開「十六大」，一般而言，中共在權力過渡期間政策變化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此次的變化正是出現在「十六大」權力轉變的過程中，顯然一方面是因江澤民訪美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胡錦濤曾經作過西藏的區委書記，而且曾經出兵鎮壓西藏佛教喇嘛的暴動，因此胡上台之後，對達賴喇嘛而言，問題將更容易解決或是更加困擾，雙方均無把握，因此趁江澤民需要一些新的政治資產時，啟動接觸，對繼任的胡而言，可能是壓力，可能是路線，也可能是助力，改變其鎮壓暴動的形象，就視胡的智慧而定。

第五，有效的善意跟隨在誠意接觸之後，以便增加雙方進一步接觸談判的可能：我們當然了解以目前來推論中共與達賴喇嘛的正式談判仍然太早，但是我們注意到西藏流亡組織在雙方接觸之後，立即發佈充滿善意和期待的正式聲明之後，又針對中共領導人最在意的在外國被示威失面子的顧慮，而要求今(2002)年江澤民外訪時暫時停示威行動，我們認為這些對中共政權而言，都是

十分受用的善意，而非只說不做的空言，甚至連口頭說法都吝嗇的虛言。

第六，不能忽視中共改善和調整其國際形象後對台的壓力：中共在近幾年以來加入 WTO、主動與加拿大召開「人權論壇」的對話、長期與義大利聯合召開「軍控會議」等一系列的作為中，可以看出中共一方面正在強化自身的建設、改造，一方面透過以參加各種國際組織、雙邊對話的方式融入國際，則塑造其願意融入國際社會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可說在適當時期去改變國際規範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在此種情況台灣是很難不被邊緣化和狹窄化，一旦中共與達賴喇嘛開始正式談判，台灣亦將不免感到必須「談判」的壓力。而一旦台灣是處在國際上認為中共也是理性、務實的政權之形象下，兩岸的談判台灣就可能處於下風。

六、小結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完全看出達賴喇嘛在因應中共的壓力時，在完全沒有武力憑藉的情況下，以弱勢與強勢的週旋之道面對中共的交班，未來領導人對西藏問題看法不確定的情況下如何尋找出路，以及中共如何利用國際有利形勢，在堅持原則的情況下，以靈活的手段解決多年十分棘手的問題。對台灣的執政當局而言，是否也應該學習類似的智慧處理兩岸問題，也有相似的和智慧開放的心胸來解決兩岸之間的困難呢？

第二節 達賴特使二次訪大陸之分析

一、前言

達賴喇嘛私人辦公室在印度北方達蘭莎拉地區，於今(2003)年5月26日發表聲明，指出：「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特別代表嘉日洛智堅參、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代表格桑堅參及兩名助理5月25日離開印度前往中國北京。這是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特使自去(2002)年9月前往中國北京後，西藏政教領袖達賴

喇嘛特使代表團第二次前往北京進行談判¹²⁶。」這是中共與達賴喇嘛雙方自從去(2002)年9月開始接觸以來的第二次。有此次的接觸，根據達賴喇嘛特使的報告¹²⁷，有以下的重點：

第一、此行目的：報告說：主要目的是繼續保持去(2002)年9月負責西藏問題的中國領導人的聯繫。另外還有三個目的：

- (一)前往各地和更多的工作人員接觸，更深入的瞭解中國的情況；
- (二)會晤中國各佛教領袖，朝拜各佛教聖地；
- (三)參觀各藏區的同時會晤藏人幹部等。

第二、友好之旅：雙方都肯定了此一類型的接觸。報告指出：「雙方同意，我們過去的關係經歷了許多的曲折，許多領域的分歧依然存在，我們認為有必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以便解決存在的問題，實現相互理解和信任。」後來依據側面獲知的信息是劉延東簡報有關中共新領導政策、中共的經濟發展、中央政府對西藏之支援，並重申中共將有條件地解決西藏問題，同時亦肯定達賴方面營造良好關係的努力；達賴代表團花費很長時間解說達賴喇嘛對解決西藏問題的「中庸之道」，對於藏人及中國人民均可互蒙其利。也可以佐證雙方的氣氛是友好的。

第三、理解之旅：代表於報告中提及：「我們參觀了江蘇、浙江、雲南等省，感覺這些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對嘉唐(中甸)進行了短暫的訪問。而且，去了雲南省德慶藏族自治州境內的由第五世達賴喇嘛創建的噶登森則林寺院。在雲南省我們有機會會晤了省、州級藏人幹部。他們在努力保護嘉唐美麗的環境，還有看到我們訪問的那些家庭的狀況使我們有所欣慰。但是，我們鄭重的向幹部說明了發展物質的同時愛護繼承西藏的宗教、文化、民族是非常重要的。在雲南我們有機會參觀了彝族、納西族、白族等少數民族地區。

¹²⁶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特使二次前往北京會談〉，西藏之頁，2003年5月26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5/index.html#030526.1>

¹²⁷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特使聲明〉，西藏之頁，2003年6月12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6/index.html#030612>

這些民族在歷史、文化、宗教等上和藏人有關係。能和這些民族的領導人進行會晤我們感到高興。」

第四、宗教之旅：報告說：「這次我們和以上各省的高層幹部進行了會晤，並且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了交流。這次我們參觀了浙江的普陀山和雲南的雞足山。這兩座山是在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傳統中是聖地。我們非常幸運的參觀了這些聖地。特別在北京會晤了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和一誠副會長¹²⁸。在會晤宗教人士和和平人士時我們有機會說明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部分觀點。」

第五、任務之旅：報告說：「這次訪問的主要任務是改善這一關係的基礎上尋找雙方接受方法，最終進行真實談判。」

其後達賴喇嘛辦公室表示，達賴喇嘛特使的訪問是成功的。雙方討論了西藏問題，著眼於建立信任和消除誤會¹²⁹。

二、各方的回應

(一)中共反應：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孔泉表示，藏胞回大陸有助於他們對大陸變化的瞭解，尤其是與達賴關係密切的人士到訪，有利於他們實事求是地協助達賴瞭解中國大陸的現狀。一年多來，達賴的代表多次赴中國大陸訪問，並與北京有關單位負責人會面，證明中央政府與達賴有一定的溝通管道，而中國政府對達賴的政

¹²⁸ 法音 1993 年第 12 期/總第 112 期第 49 頁，資料來源：<http://fy.fjnet.com/china/b93fdh01.htm>

會 長	趙樸初
副會長	帕巴拉·格列朗傑（藏）、嘉木樣·洛桑久美·圖丹卻吉尼瑪（藏）、李榮熙、貢唐倉·丹貝旺旭（藏）、烏蘭·圓拙、隆蓮（女）、刀述仁（傣）、周紹良、多吉紮·江白洛桑、明·伍並亞·溫撒（傣）、布米·強巴羅卓（藏）、真禪、茗山、卻西（藏）、阿嘉·洛桑圖丹久美嘉措（蒙）、淨慧、策墨林·丹增赤烈（藏）、一誠、聖輝、香根·巴登多傑（藏）
秘書長	刀述仁（傣）（兼）
副秘書長	遊驥（留任）、蕭秉權（留任）、學誠、那倉·向巴昂翁（藏）

¹²⁹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特使返回印度〉，西藏之頁，2003 年 6 月 11 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6/index.html#030611.1>

策也是一貫的，並沒有改變。

(二)美方反應：

美國明白這是接著去(2002)年9月份他們雙方之間重建接觸後的又一次中國之行，美國正期待著聽到更多有關這次交談的結果。布希總統和鮑威爾國務卿繼續與中國領導人談論通過跟達賴喇嘛或他的代表進行實質性對話來消除這一長期存在的異見的必要性。美國政府將深切關注這次訪問的情況並希望這次的接觸將雙方帶向展開對話的捷徑上。

(三)德國反應：

德國外長費雪於五月底會見達賴喇嘛時，指出「西藏是中國之一部分」，並向達賴表示「德國支持西藏人民在中國統治下保有宗教和文化自治的渴望¹³⁰」。

(四)印度反應：

印度外交部長Shri Jaswant Singh先生的回答是「印度政府對西藏問題『雖然傷已愈，傷疤仍然存在』，如今印度政府對印中關係方面不回憶過去，正在努力和中國政府建立積極的關係。不過，印度政府知道幾個月前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代表前往北京和中國官員接觸的事。而且繼續會支持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和中國官員開始和平談判¹³¹。」

但是民間的反應則有好有壞，如國際聲援西藏組織運動美國的行政主任瑪麗貝特·馬爾凱說：「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堅決支持並一直為通過和談使西藏問題得到解決而工作」。馬爾凱說：「我們希望代表團能夠進行第二次訪問顯示了中國方面就通過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對話而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也希望它不是為了減輕國際社會的壓力而擺出的空洞姿態。」馬爾凱認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繼續在受著侵犯，對於國際社會的西藏運動而言，最關切的問題就是此次訪

¹³⁰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會晤德國外長〉，西藏之頁，2003年5月31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5/index.html>

¹³¹ 〈印度國會議員呼籲政府支持達賴喇嘛〉，西藏之頁，2003年5月2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5/index.html#030502.1>

問是否一次能結出碩果的接觸¹³²。

又如長期關注西藏問題的茉莉(曾接受達賴喇嘛教化的民運人士)則認為：「為什麼中國政府一方面要向國際社會做這種積極的漢藏會談『秀』，另一方面卻更無情地侵犯西藏人民的權利，更肆意地摧殘西藏民族精英，對達賴喇嘛的批判仍然一如既往地嚴厲。自西藏特使第一次訪華到第二次訪華的九個月的時間裡，中國政府在藏區繼續侵犯人權，劣跡斑斑」。又說：「但就在西藏特使第二次訪華期間，由於中國政府軟硬兼施的壓力，尼泊爾政府居然向中國遣返了18名西藏難民，違背了有關人道對待避難者的國際準則。這是中國政府發出的非同尋常的一個信號，這個信號絕對不是善意的，它表明：中共要顯示它對鄰國的巨大影響力，要斬斷弱小的西藏流亡政府和它的人民之間的聯繫」。茉莉仍然保留原來的觀點：只有中國目前的政治制度發生變化，西藏問題才有真正解決的希望¹³³。

從以上的報導資料來看，我們發現大體而言：

第一、官方的回應比較具有正面的期待，而部分國際民間團體對此較保留；

第二、中共官方的回應仍是以低調為主，這代表了中共官方對達賴喇嘛的態度仍有保留，但是檢視近半年多來中共官方對達賴喇嘛的攻擊性字眼，在次數上也有減少和強度上也有降低的趨勢¹³⁴。

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中共內部對達賴的政策已經有所調整；第三、國際民間社會對中共的誠意表示懷疑，基本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畢竟他們對中共的現在低調和對藏胞所謂的人權迫害以及過去統治的紀錄並不放心，特別是在人權問題，他們和中共之間的認知差距很大，所以對反共人士而言，比較會有盲目認定中共崩潰，西藏問題才有真正解決的可能；第四、除中共之外，

¹³² 〈西藏聲援運動歡迎達賴喇嘛代表第二次訪問中國〉，西藏之頁，2003年5月26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5/index.html#030526.2>

¹³³ 〈漢藏二次對話，中共誠意何在?〉，西藏之頁，2003年6月25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6/index.html#030625.2>

¹³⁴ 張聖岱，〈放棄獨立換取真正自治〉，聯合報，民國92年8月2日。

各方的回應也都強調國際壓力對於促成中共與達賴喇嘛談判是有效的辦法，因此特別是國際民間也都異口同聲提醒各國的官方對中共的壓力而不是放鬆，但是個人以為他們似乎過份強調國際壓力，如各國的責難，是否真有直接的效果，抑或是中共自身經濟的發展以及面對全球化以及其新領導人以現實主義的態度來處理融入國際社會的問題，恐怕才是關鍵所在，如果說壓力，我們可以說是正面的壓力。事實上中共面對上述壓力不是只有談判乙途，中共運用了輸出西藏文化、打開西藏市場、開放西藏觀光等手段，讓世界了解現代西藏的作為，而這些作為反過來對達賴喇嘛的流亡組織也同樣是有壓力，所以各方的回應除了鼓勵和懷疑中共必須與達賴喇嘛對話之外，也必須鼓勵海外藏胞相信達賴喇嘛的判斷，以及以新的眼光和思維來看待中共，才有可能真正促成雙方進行耐心而持久的對話，以便尋找雙方均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如果各國的官方真正聽從了國際民間社會的說法，只知道繼續對中共以負面施壓的方法，其結果恐怕是適得其反。

三、接觸以來的雙方互動

中共與達賴雙方自從重新正式接觸以來，究竟雙方的互動是否有所改善，使得雙方朝著正面的和建設性的方向調整，這是我預測中共與達賴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從此一角度來檢視，我們可以說信息仍然十分混亂，既有令人欣慰的一面，也有令人難以理解的發展。

從正面的信息來看：首先是雙方都能信守九月份會談的協議，在今(2003)年七月之前舉行第二次會談，雖然如今第一次會談的細節並未透露，個人相信在上一次的會晤中，雙方對第二次的會談已經有了時間和人選上的默契，所以去(2002)年流亡組織的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才會提出「明(2004)年6月我們也許能看出北京是否有誠意」的說法¹³⁵。

其次是雙方的領導人物都對目前的發展持正面肯定的態度，特別是中共的

¹³⁵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桑東仁波且接受記者採訪〉，西藏通訊第42期，2002年11月-12月號。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nl/42/index.html#16>

統戰部長劉延東如果能在與達賴代表的會談中「肯定達賴方面營造良好關係的努力」，這對達賴喇嘛而言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鼓舞的信息，因為這是中共領導人很罕見地對達賴喇嘛的肯定。

其三是中共在今(2003)年的人事調整中，原西藏區人大主任熱地調升至北京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這是西藏的阿沛阿旺普美之後另一個西藏人民擔任中共的國家領導人的職務。他與胡錦濤是舊識，又是原來的長官與部屬。按中國官場文化，有關西藏問題胡的圈內多了一個藏胞的顧問，對中共的治藏政策的理性肯定是有所協助的。

另外從達賴喇嘛流亡組織方面的作為來看，首先我們讀到達賴喇嘛在今(2003)年「三一四」的講話中，對中共的權力轉移、改革開放、釋放若干政治犯、和流亡組織的接觸都給予正面的評價¹³⁶。這是以往的「三一四」講話中對鎮壓者很少有的肯定。

其次是對中共新一代領導人胡錦濤的看法。他們認為：「我們不能僅僅以3月8日《西藏日報》所刊登之胡戴著鋼盔與戒嚴部隊官兵站在拉薩街頭的照片為由，草率地獨斷他是鎮壓『抗暴』事件的主謀。其實，在1989年的西藏抗暴事件中，胡因始終保持低調、冷靜的態度，最終成為政府與武警兩邊不討好的人物¹³⁷。」達賴喇嘛對胡的說法是：「很自然，與其他中國領導人相比，他至少對西藏有所了解，可能成為有利因素。但是，他在西藏的經歷，到底在什麼程度上有助於西藏問題的解決，我們還得看一看¹³⁸。」

其三，達賴喇嘛對於此次的雙方接觸給予更大的肯定。他表示：「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中國政府官員的態度更加積極了。現在我們正努力建立信心，因

¹³⁶ 〈達賴喇嘛在西藏三·一四自由抗暴四十四週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西藏通訊第43期，2003年1月-2月。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nl/43/index.html#1>

¹³⁷ 〈胡錦濤的西藏情結〉，西藏通訊第42期，2002年11月-12月。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nl/42/index.html#14>

¹³⁸ 〈BBC記者陳立專訪達賴喇嘛〉，西藏通訊第43期，2003年1月-2月。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nl/43/index.html#7>

為中國政府總是非常多疑的。」¹³⁹同時最近又傳出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計劃二度訪問西藏。嘉樂頓珠說不久他將前往西藏的衛藏、康區和安多進行為期3個月的訪問。他說去(2002)年訪問西藏時和中國有關領導人進行接觸後建立了良好的渠道，所以他這次再次前往西藏三區認真的瞭解西藏現況和接觸全西藏的當地人民是主要目的¹⁴⁰。

其四在西藏流亡組織的官方網站中的即時新聞對中共所進行的謊言式的攻擊已大大減少，取而代之是對事件、價值認知、解釋角度或是歷史認識的不同，這也是比過去進步和正面的地方。

從負面的信息來看：根據茉莉的說法，中共繼續捕捉西藏人民中主張獨立的人士和中共繼續以嚴厲的語氣攻擊達賴¹⁴¹，這一部分我們相信是有可能的，不過我們迄今無直接的證據，嘉樂頓珠指控中共地方當局禁止藏人慶祝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華誕等宗教信仰的行為。他說這些是地方當局官員所為，中共中央官員是否知道這一問題都是值得懷疑的事¹⁴²。另一方面在西藏之頁對中共治藏政策的攻擊仍然很多：

第一，在西藏生態問題上：西藏流亡組織針對中共所發表的西藏生態建設與環境白皮書，流亡組織也同樣發表西藏環境白皮書加以反駁，該文說：「總的說中國政府在努力保護西藏環境，但是，由於中國政府繼續進行著鐵路、石油和天然氣輸送管道、化工廠、水庫、飛機場、公路、軍事基地、農村城市化等建設。所以，完好的保護西藏環境絕對有問題。最使人擔憂的是中國政府遷移數百萬的中國人到西藏的政策對西藏人民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壓力。中國政府進行的所謂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對保護西藏生態環境沒有任何的作用，將會造成更

¹³⁹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感到鼓舞中國反應低調〉，西藏之頁，2003年6月6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6/index.html#030606>

¹⁴⁰ 〈達賴喇嘛哥哥嘉樂頓珠計劃二度訪問西藏〉，西藏之頁，2003年7月21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7/index.html#030721.2>

¹⁴¹ 西藏之頁引BBC中文網的說法是「中國政府最近雖然還是批評過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但是語氣要溫和的多。」〈英國報刊報導西藏問題〉，西藏之頁，2003年8月30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8/index.html>

¹⁴² 同註 23

大的破壞。」《西藏環境白皮書》總結了中共統治西藏五十年來由於對西藏生態環境沒有進行護理而現在西藏大量的植物面臨滅絕、自然草原退化、西藏河流泛濫造成水災。還總結了五十年前生存著大量野生動物的草原是什麼樣的情況下處於如何的這種危險地步等¹⁴³。

第二，認定中共在篡改西藏歷史：西藏之頁稱：「中國政府在編寫所謂的西藏通史時卻硬性割裂西藏的歷史，並根據中國的朝代分類，完全是中共修史為政治服務的那一套。西藏學者認為，這種抱著極為明顯之政治動機和目的編寫的所謂『通史』，不過是一種政治宣傳而已，並不能正確地反映西藏的歷史。西藏歷史專家還指出：中共這樣做不過是為了掩蓋其非法侵占西藏的事實，企圖通過竄改歪曲歷史為其侵略西藏的罪惡行為尋找根據而已。但是，歷史事實無法改變的 不論中共怎樣歪曲西藏歷史，都改變不了西藏做為一個被中國所侵占之國家的事實¹⁴⁴。」

第三是西藏文化被摧毀：西藏之頁說：「西藏人面臨著兩難境地：是學習他們的傳統文化，保持他們的淵源文化；還是學習佔中國社會多數的漢族語言，從而擺脫這個地區普遍的貧窮。漢語技能非常重要，因為漢族移民通常比藏人具備更好的經商技巧，他們主導著西藏不斷增長的私有經濟。所以流亡的藏人的不滿在於，他們認為西藏文化的核心，也就是他們獨特的宗教，正在遭到駐在當地的中國統治者的摧毀¹⁴⁵。」

第四，他們也指控中共開闢內地到拉薩的航線和大學生參與西藏建設的作為：他們認為中共入侵西藏五十多年來為徹底控制西藏和加快同化西藏，投資大量的資金修建了數條公路和中國成都至西藏首都拉薩的航線。這些公路和航線對中共控制西藏和同化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所以，中共加大了對公路、鐵路

¹⁴³ 〈西藏流亡政府發表《西藏環境白皮書》〉，西藏之頁，2003年7月14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7/index.html#030714.1>

¹⁴⁴ 〈中國文化已主宰西藏大城市〉，西藏通訊第41期，2002年9月-10月號。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nl/41/index.html#26>

¹⁴⁵ 〈西藏的核心文化在被摧毀〉，西藏通訊第41期，2002年9月-10月號。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nl/41/index.html#28>

和航空的投資。借交通方便之長鼓勵大量的中國人移民西藏和輸送軍事物資。從而得逞“一進一出”之陰謀，最終達到改變西藏傳統文化、宗教、信仰的目的¹⁴⁶。又指出中共規定「大學生在西部服務期間，每年有 7200 元生活補貼和 1000 元交通補貼；到西藏服務的學生的生活補貼為每年 9600 元。另外，南京大學還給前往西藏的學生每人每年增加 1200 元的生活補貼。」中共的這一政策對整個西藏造成很大的衝擊。首先，中共派遣的這些中國大學生在“黨”的優惠政策的保護下浩浩蕩蕩進入西藏。本來就業問題非常嚴重的西藏將會使西藏的很多人會失業，或對他們的就業問題造成威脅。其次，每年數以千計的中國學生進入西藏對其面臨的傳統文化將造成巨大的威脅。再次，中共派遣中國大學生進入西藏將會造成大量的中國人移民西藏，在人口上西藏人民的生存造成威脅。另外，有關分析人士認為：中共派遣的這些中國大學生其實對西藏的建設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因為他們在藏期間只是等待儘快結束中共規定的駐藏時間而沒有任何的責任和長期的計劃。他們只關心在藏的待遇和回中國後所得的利益而非西藏當地的人民的發展及福祉¹⁴⁷。

以上西藏之頁對中共治藏政策的攻擊，個人以為有些流亡組織的擔心有一定的道理，如漢人入藏援助建設，確實他們的心不在西藏，且有可能只為了待遇而去，是以對西藏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是否在執行面出現問題，確實令人憂慮；但是如果漢人無心經營西藏，但達賴喇嘛的漢民大量移入西藏之說就不成立；又如歷史問題，確實漢人不能只以自己為中心來寫「中華民族(包括五十六個少數民族)」的歷史，否則就無法避免被認為是民族沙文主義，就不可能使漢民族真正尊重少數民族，學習民族的長處和優點。這是中共當局以至漢民族都必須反省和檢討的部分。但如果流亡組織自己也必須認真指正漢人在西藏有那些是錯，證據為何，正確的史實為何，不能只是情緒攻擊。另外也不應該總是將中

¹⁴⁶ 〈為加強控制西藏中共再開廣州至拉薩航線〉，西藏之頁，2003 年 7 月 29 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7/index.html#030729>

¹⁴⁷ 〈中共不擇手段派遣中國學生前往西藏〉，西藏之頁，2003 年 6 月 16 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6/index.html#030616>

共在西藏所有的作為視為破壞，如經濟建設等同於環境破壞、交通建設就是掠奪資源、發展教育導致文化消滅、對口支援就是漢人入侵，結果中共的政策對西藏完全沒有正面的意義，完全不顧在藏胞改善生活的要求，甚至在攻擊出現邏輯上自我矛盾，如一面稱漢人無心在藏，一面又說漢人大量移入西藏，則雙方之間必然無法誠心對話，事實上如交通建設、生態維護等問題，這是在其他變遷社會都無法有定論的問題，何況中共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呢？個人以為西藏流亡組織在指責中共對西藏建設作為時，必須在政治上以達賴喇嘛所號召的「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高度自治」為立場，則西藏建設自然不能大大落後於內地其他省份；其次必須以在藏區生活的藏胞民意為基礎，他們要什麼，難道藏胞不要經濟的改善，生活水準的提高嗎？如果未來真有一天流亡組織的幹部去管理西藏地區時，他們會在經濟發展上如何選擇呢？有了此一心態，才能說出令人折服的理由來採納流亡組織的建議，這才是真正有利於西藏發展的建議。

四、未來發展

在上述資訊之前，我們對中共與達賴雙方未來的發展應該作何種預測呢？基本上個人是比較樂觀的來看待事情的發展，但是也有若干變數值得雙方留心：

第一、互信建立的過程必定是漫長的；中共與達賴雙方敵對了五十餘年，如今雙方的主要癥結——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已經化解，個人看不出其他的枝節問題會變成嚴重的分歧。坦白說，中共在與達賴喇嘛代表的二次接觸中，應該有許多方法可以測試達賴喇嘛公開宣佈不追求獨立的誠意，剩下是歷史解釋，這是中共必須自我修正的，不能扭曲歷史，否則就不是真正在撰寫歷史，對史實我們必須以相對價值來超越主觀意識，才能真正促進民族融合。對於大西藏的問題，個人以為達賴喇嘛是清楚熟知西藏歷史的智者，如果他認為大西藏是正確的，則他必須不只對漢人要回藏區，而且必須公開反對印度吞併錫金(錫金在漢人歷史稱哲孟雄，在藏語中為提供米糧的地方，這是原來藏族人民的土地)，

應該要求印度將錫金成為西藏的一部分，另外麥克馬洪更是西藏的土地，因為這裡曾是五輩達賴的出生地，這些原來在喜馬拉雅山的南側沃土均為藏人所有，則大西藏為何只要北方的脊地而捨棄南方的沃土呢¹⁴⁸？達賴喇嘛果能全面尊重藏族自己的歷史，對所有事物採取同一價值標準來發言，漢人自然也必須尊重他族詮釋自己歷史的權力，重新認真討論吐蕃¹⁴⁹的區域何在。總之，雙方的癥結問題已經有了抒解的可能性，互信的建立就必然可以慢慢建立起來，當然雙方在建立互信的過程中也必須互有耐心，互有信心，不因偶然事件而誤解，就能使雙方真正尋求解決之道。

第二、中共自身建設呈現出越來越大的信心：在解決西藏問題中，關鍵在中共政權自己的信心，中共對自己治藏的所作所為越有信心，越能真正得到藏民的支持，則中共政權對達賴喇嘛及流亡組織開放的程度也越大，同時對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攻擊也應該越有反省的度量和可能性。但如果中共因大陸「改革、開放」的成功而盲目認定建設西藏也就是發展經濟，而拒絕傾聽異音，則必定再犯錯而遭致失敗。中共在自身邁向完全性大國的過程中，不妨大量傾聽西藏之頁的攻擊，將之成為思考改善治藏政策的忠言，其結果就會是一個良性的循環，直到最終流亡組織內除了極端偏激的民族主義狂熱者之外，便無可攻擊，則中共與達賴喇嘛的目的也就雙贏。中共目前與達賴喇嘛代表接觸的作法，事實上已經造成海外藏胞的分裂，其中激烈的藏胞組織甚至要對達賴喇嘛進行攻擊，這就可以看出中共在治藏方面有了一定的成績，我們相信中共將沿此道路前進，逐步地解決西藏問題。

第三、中印外交的改善：最近一、二個月中、印的外交關係突然大幅改善，特別是中印的邊界問題談判也在有序地進展之中，這對達賴喇嘛而言，自然是繼中美外交改善之後，另一個重要的國際形勢的變化，而且此一變化對達賴喇

¹⁴⁸ 此一見解為蒙藏委員會陳又新參事於民國 92 年 7 月 29 日蒙藏現況研討會上所指教，特別引用並致謝。

¹⁴⁹ 吐蕃(音勃)今之西藏，西藏為滿人(康熙 48 年)命名，今為尊重吐蕃族自身的稱呼，則中共應重新將西藏改回吐蕃之名。

嘛暨流亡組織而言是更直接、更現實的變化。可以假想中、印關係加上俄國在其中的撮合和推動，有可能出現突破，如果中印關係出現如五十年的情況，則達賴喇嘛的流亡組織將何去何從？遷到美國嗎？縱使不到這一步，達賴喇嘛和流亡組織所受的限制也有可能增加。總之，中印關係的改善是增加了中共解決西藏的籌碼，而約束了達賴喇嘛的行動選擇，對達賴喇嘛暨其流亡組織而言，他們不得不無奈地何不去贊成和歡迎中印關係的改善以及中、印之間的邊界談判，否則他們的處境立刻就出現危機，但是也因此達賴的作為就受到藏青組織的批評，流亡印度藏人社團「西藏青年會」主席卡桑朋措對西藏流亡政府未對印總統訪大陸期間表達「印度政府承認西藏自治區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進行駁斥相當不滿，表示該組織將不排除訴諸游擊行動對付達賴喇嘛。假如此一消息為真，則對達賴喇嘛而言就真正是十分困擾的事，此一處理將使得雙方的談判和接觸變成十分重要而且是十分必要的發展。中共政權如果明白此一道理，在此種情勢下能夠使達賴喇嘛這一邊能從中共方面獲得更具體的治藏的保證，相信對解決西藏問題必然產生莫大的助益。但是反之如果中共當局認為海外藏胞的分裂是中共可以困擾達賴喇嘛，要求達賴喇嘛作出超越歷史的承諾，以便一舉解決西藏問題，則反而有可能弄巧成拙。真正治本地、長期地解決西藏問題，目前確實處於關鍵的時刻。

第四、外國勢力自然有可能繼續以兩手策略來破壞中共解決西藏問題效果，例如美國的作為就十分典型，一方面歡迎雙方的接觸談判，一方面又在財政報告中提撥支援西藏流亡者的經費，發表國務院西藏事務官間接鼓勵西藏海外藏人的分裂運動。因此中共必須冷靜應付，更重要的是達賴喇嘛及其流亡人士必須汲取帝國主義侵入西藏的教訓，記取藏人流亡海外帝國主義援助的教訓，認清帝國主義的面目，不為其兩手策略所迷惑，真正認清西藏的未來，不作任何外國人的反華棋子，而專心追求作中國人的領導者，則中共與達賴喇嘛之間的和解是有希望的，我們欣然看到達賴喇嘛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的聲明，可以看出達賴喇嘛自己的智慧和不以美國小布希政府馬首是瞻的勇氣。我們希

望中共的領導人也注意到此一發展，則雙方都能從正面來看待問題，從樂觀面來期待未來，西藏問題的解決自然是可以樂觀的。

五、台灣立場的反省

中共與達賴喇嘛之間的互動原本是與兩岸關係並無直接的關聯，如果有關聯也應該是中華民國為立場，同情藏民的反共，而且願意給予支援，但不支持當時達賴喇嘛與海外部分藏人所鼓吹的分裂運動，中華民國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的立場，既不為反共而違憲，也不為國家統一而不反共，此一立場的堅持使得台灣在中共與達賴喇嘛不論是鬥爭或是聯合，終將是一個活棋，但是自從李登輝違憲地邀請達賴喇嘛來台訪問之後，台灣不但沒有因此增加對抗中共的籌碼，反而淪為達賴喇嘛的棋子，特別是中共要求達賴喇嘛必須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才與達賴喇嘛舉行談判，台灣就成為中共與達賴喇嘛準備談判這頓餐前小點心。中共如果堅持，達賴喇嘛屆時為了藏民的利益也非講不可。當然，誠如達賴喇嘛所說「和中共談判不會犧牲台灣的利益」¹⁵⁰，當然不會犧牲，因為台灣的利益並不在達賴喇嘛手上，同時就算達賴喇嘛講了「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台灣的現狀也不會因此而改變。因此達賴喇嘛所言完全為真，問題在於台灣自己必須認清：

第一、在台灣與中共鬥爭的情況下，任何政治實體或國家想要與中共的關係從鬥爭轉為和解，台灣都只是廉價的小菜，這種口惠式的贈與中共或許不會傷害台灣的現實利益，但是必然對我方構成心理層面的打擊，從而使台灣增加對中共的仇恨，只要我們外交繼續沉迷於國際空間，則這一類的挫敗便不可能中止。以達賴喇嘛訪台為例，如今雙方尚未談判，達賴已經延遲訪問了兩次，而且在5月底，與台藏基金會成員見面時還表示年底是否成行必須先取得中共方面的諒解。這不就是政治現實嗎？

第二、達賴喇嘛從追求獨立到如今要求高度自治，他在選擇戰略轉變的時機

¹⁵⁰ 〈和中共談判不會犧牲台灣的利益〉，西藏之頁，2003年5月28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305/index.html#030528.2>

是在中共往上升而自己尚未向下掉的時刻，大約在 1988 年他在歐洲史特拉斯堡講演之時，達賴喇嘛對吐蕃前途戰略目標的調整，使得十餘年來達賴喇嘛本身和流亡組織的談判籌碼一直沒有遞減，反而是中共不得不在戰術上作出調整，恢復與達賴喇嘛的接觸。而台灣的鬥爭策略則令人費解，從 1980 年台灣經濟具有極大的優勢到如今台灣主要的出口依賴大陸，可以說優勢盡失的情況下，我們還在陶醉於以「三通」交換否定一中原則的不可能交易之中，可以說被虛偽的「台灣獨立」所矇蔽，由此可見台灣的政客不但沒有自保的智慧，同時也欠缺鬥爭的高手。

第三、台灣與吐蕃的情況最大的不同之點當然在於吐蕃已被中共統治，而台灣不在中共管轄之下，但是按此邏輯，台灣對中共的鬥爭策略必然是手段更靈活，選項更多元。然而以目前台灣的因應之道來看，台灣反而十分被動，在對付中共方面重覆李登輝的技倆，希望激怒中共已經失效，大聲喊叫我們不是別人的一州，也只能在自己人面前阿 Q 式的自慰，最終仍然必須俯首貼耳地聽命。反之，達賴喇嘛卻智慧地運用了吐蕃獨立和西藏高度自治之間的政治差距，以及其對中共的鬥爭內涵之得失的道理想通之後的政治表現。事實上當達賴喇嘛主張吐蕃獨立之時，世界各國想要支持或是利用藏獨必然受到國際法的若干局限，因而不可能有公開或實質的協助，這就使得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在國際上陷入孤立，因此對中共而言就只有困擾而沒有壓力。其後達賴喇嘛轉為爭取西藏高度自治，卻贏得更多的國際同情和支援，世界各國官方與民間可以用人道關懷作為名義，公開聲援或支持達賴喇嘛，這樣就變成了中共內在的麻煩，而西藏的達賴喇嘛就可以和民運及反共人士大大方方的結合，對中共形成巨大的壓力，使得中共當局不得不認真面對，重新思考。反之，在台獨除了反對「一中原則」之外，沒有能技巧地、靈活地使用「一中」原則作為台灣反共的武器，結果我們的反對不只是中共的打壓，而且挑戰的是國際法的某些根本原則，試想世界各國怎麼可能為了台灣而拋棄保護他們自己國家利益的國際法原則呢？因此台灣所能開闢的戰場就越來越少，所得到的支援也就越來越少，而且願意

還站在台灣這一方的，多數都是為了要吃台灣、花台灣、用台灣，這些基本的問題我們如果不作反省，台灣現在雖然和吐蕃不同，未來可能變成和西藏相同。

六、小結

果如上述的發展，我們以為中共與達賴喇嘛關係的發展對兩岸關係最大的啟發在：台灣的政治人物應該虛心地學習達賴喇嘛的「智慧」，不能一頭熱以為可以利用達賴喇嘛，結果反為人所用，應該轉而真正為台灣人民、為台灣長遠的前途著想，尋找一個與中國大陸和平相處的康莊大道，如此才能將目前台藏關係轉而成為我們理性處理兩岸關係的資產，而改變目前我們受制於人的狀態。

第三節 達賴特使三訪大陸之分析

一、前言：

中共與達賴喇嘛之間已經有了三次的接觸，前兩次分別在 2002 年 9 月，上一次則在 2003 年 5 月。此次則在今(2004)年 9 月中旬出現。9 月 30 日特使返抵印度首都，此次的中共與達賴喇嘛的接觸在國際社會的反應上已經不如前兩次的轟動，國際的期待和好奇也相對降低不少。個人以為，一方面是媒體的性格使然，因為媒體是為求新奇而存在，任何一件事一但是例行化或是平常化，媒體普遍不太給予注意，除非爆發某些不尋常的事才有可能再次引起注意。而中共與達賴喇嘛代表的接觸已經是第三次，自 2002 年以來，幾乎是每年一次，因而失去新奇感；二方面兩次的會面也沒有任何結果，雙方的互相攻擊並沒有完全停止，足見雙方的會談並未見實質的效果。既無結果，則代表會面只是一場表演的秀而已，因此國際間對第三次的會見也不抱期待；三方面是因為中共對西藏的「改革與開放」，使得西藏的神秘色彩也逐漸淡化，因此西藏問題也有存在著世俗化的趨勢，一但俗化就必須在現實主義中相較其客觀的重要性，而西藏地區顯然在戰略位置、戰略資源上都不是重要的地區，因此受重視的程度也

漸漸下降；四方面也因為最近這一段時期，國際上受重視的新聞很多，如美國大選、油價飛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爭、中共的胡錦濤全面掌權、歐亞領袖會議、印尼的總統更替、中印關係的好轉等等，於是中共和達賴喇嘛私人代表的會見，自然不是國際上足以影響大局的事件。由是觀之，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中共也已經掌握了媒體的性格，懂得如何反向操縱國際媒體，以避免將自己陷入不利的局面，因而中共多次對達賴喇嘛私人代表面晤一事均十分低調，恐怕除了政治理由外也有媒體的理由。但是無論如何，立足在解決問題的立場，中共與達賴喇嘛私人代表三度晤面一事，總是對雙方解決歧見、持續溝通，最後獲得問題的解決一事是一個重大的發展。尤其站在台灣的立場更有重視的理由。

二、片面的資訊：

第三次中共與達賴喇嘛私人代表的會晤，一如以往的兩次會晤，中共官方沒有任何主動的新聞發佈，甚至在被動的作答時也十分簡略¹⁵¹。可以用除證實有海外與達賴喇嘛關係密切的藏胞人士回國來訪之外，沒有任何信息可言；至於達賴喇嘛方面則不一樣：

(一)2004年9月13日、9月14日在西藏之頁的網站上連續有五則消息，其中包括西藏通訊、達賴喇嘛辦公室、美國之音、BBC一則，以及美國之音引法新社的消息共四則，主要內容綜合達賴喇嘛辦公室在9月13日聲明與西藏通訊¹⁵²。在相關消息包括以下的幾點：

1. 代表團的人其人選和規模幾乎與前兩次相同；
2. 11日的消息和13日的聲明不同之處在於正式聲明指出代表團將前往西藏一些地區而非西藏；
3. 明確提到代表行前在9月8日曾向達賴喇嘛請示工作，而特別強調首席

¹⁵¹ 〈美國之音報道達賴喇嘛特使訪中〉，西藏之頁，2004年9月14日。資料來源：
<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09/index.html#040914.5>

¹⁵²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特使12日前往中國〉，西藏之頁，2004年9月11日。資料來源：
<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09/index.html#040911.1>

噶倫桑東仁波切在場¹⁵³；

4. 對此次訪問希望能有一些實質的進展。

(二)在訪問的過程中，一如以前兩次訪問，不論在中共方面或是達賴喇嘛之組織方面都沒有進一步的消息。這樣的密約，一方面是雙方的默契，主要還是來自中共方面不願他們的行程曝光，不願此事受到國際媒體的重視和介入。

(三)在訪問結束後，也同樣只有西藏流亡組織方面的消息，中共方面則是隻字未提。綜合西藏之頁的相關訊息共有四則消息：

1. 是延遲發布訪問結果：比較特殊的是代表團在9月30日下午回到新德里(New Delhi)之後返回達蘭莎拉，由於當時達賴喇嘛正在中南美洲訪問，所以官方消息只表示「代表團9月12日抵達北京並前往西藏康區達孜朵(康定)、雅榮(新龍)、甘孜、達武(道孚)等地區進行參觀訪問。結束對中國和西藏的訪問後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特使代表團於9月30日經香港返抵印度首都新德里。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特使此次前往中國和西藏訪問，是藏中恢復接觸後第三次成功接觸。由於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正在中南美洲薩爾瓦多訪問，所以，代表團未晉見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前沒有透露更多的有關這次訪問的情況¹⁵⁴。」從此一消息可以理解到，第一、達賴喇嘛並不對此次訪問感到興奮；第二、中共會見特使團的層次不是很高，因此雙方可能沒有太具體的結論；第三、此次的訪問結果可能不符合原先的期待。

2. 達賴喇嘛在墨西哥的發言：10月6日達賴喇嘛在墨西哥相關的訪問也表示¹⁵⁵四個主要重點：

(1)是「與北京的談判進度緩慢，我們目前的努力目標建立相互信任，為以後的細節談判打下基礎，所以在不同領域的詳細討論還沒有開始。」

¹⁵³ 〈達賴喇嘛辦公室有關特使的聲明〉，西藏之頁，2004年9月13日。資料來源：
<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09/index.html#040913.3>

¹⁵⁴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特使返回印度〉，西藏之頁，2004年10月1日。資料來源：
<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10/index.html#041001.1>

¹⁵⁵ 〈達賴喇嘛表示與北京的會談進展緩慢〉，西藏之頁，2004年10月6日。資料來源：
<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10/index.html#041006.1>

(2)是「他的代表首先清楚地表明他們不追求西藏獨立，中國政府官員還充滿懷疑，在這種情況下很難進行討論。達賴喇嘛強調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3)是「多少年來，他都渴望訪問中國，不僅是作為參觀者，而且是作為朝聖者。達賴喇嘛希望在中國政府認為方便的任何時候成行。」

(4)是「我(達賴喇嘛)越來越老了，這是事實，不過共產黨也越來越老。一切都在變化，中國也不是30年前的中國了。達賴喇嘛說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共產黨也成為一個越來越理性的對手。」。以上四點的前兩點可以說已經透露了雙方的第三次會訪並沒有實質的進展，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共對達賴不信任，任何目前努力的目標是建立互信，而後兩點則是在建立互信的範圍來著墨，尤其是使用「朝聖者」、使用「越來越理性」的形容詞，可以說是很技巧地努力建立信任感。

3. 特使團記者會¹⁵⁶：10月13日，特使團在達蘭莎拉舉行記者會，透露信息如下：

(1)是會晤的官員「在9月12號到29號的訪問中，達賴喇嘛的特使洛地嘉日和格桑堅贊跟中國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部長劉延東等官員舉行了會晤」。

(2)是會晤的氣氛「洛地嘉日在發表聲明的記者會上表示，雙方進行坦率、但是融洽的會談。洛地嘉日說：他認為這次和北京的會談是真正開誠佈公的一次，也是討論問題最詳細的一次。雖然這次會談在真正意義上還不是談判，但對將來繼續深入討論解決西藏問題奠定了基礎、具有重大意義」。

(3)是會晤的發現「顯然，西藏流亡政府跟北京政府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還有深刻分歧，有些是根本的分歧。聲明說，雙方都認識到有必要進行更具體的討論，以縮小這種分歧」。

(4)是日後的努力「洛地嘉日說，解決西藏問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不能急於求成。西藏問題需要時間和耐心。速戰速決地了斷分歧對西藏來說不一

¹⁵⁶ 〈達賴喇嘛特使:與中國官員坦率會談〉，西藏之頁，2004年10月14日。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xzxinwen/0410/index.html#041014>

定是好事，解決西藏問題一定要穩步前進」。特使團能間接證實了達賴喇嘛在墨西哥受訪的內容，不過也透露對與中共由會晤而談判的信心。此一信心似乎來自特使團相信中共對達賴喇嘛的公開宣示有誤解，同時也來自雙方的溝通之門並沒有關閉，對此美國之音的記者還在文字稿中引述了西藏和台灣問題，指出「西藏問題分析人士說，北京的學術界已經開始對照台灣問題討論西藏的前途。有觀點認為，如果北京當年和蔣經國展開談判，雙方在國土認同上至少還有一致的基礎，而現在和台灣的民進黨政府談判，困難就太多了。西藏問題也是如此，一但較為溫和的達賴喇嘛不在人世，西藏前途的歸屬將會更為棘手」。所以從記者的角度認為雙方最終的會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4. 達賴喇嘛接受美國「時代」雜誌訪問時，更明確指出三點，達賴喇嘛這三點的表述應該說是令人十分驚訝的調整：

(1)他強調了與中共談判中善意和誠意的重要性。因此為了達到談判的目的，他十分努力地而且是持續不懈的營造氣氛，甚至在他的長兄和海外其他藏人對此有所批判，他仍然堅持以中間路線來建立誠意，以與時俱進來營造善意。

(2)是承認中國在西藏現代化發展中經濟發展的貢獻，這是在西藏之頁的言論從未見過也不曾發生的言論，以藏青鐵路為例，過去總是以破壞生態、以方便和人更大量的移入西藏，甚至是方便解放軍入藏對印度不利的說法來加以定位和形容。而今達賴喇嘛已經有條件地調整，他也承認西藏的落後有條件地需要中國的援助和開發，達賴喇嘛的這種言論也是十分冒險的，因為它有可能導致左和右的不同人對他的攻擊和不信任，對那些原來支持他反中、反共的人，或許今認為他軟弱了，或是被中共統戰了，因此批判他；對那些原來就不信任他的人會強調達賴喇嘛的「有條件」部份，而認為他在耍陰謀、玩花樣，而且中共當局也不會如此輕易地就相信了他的調整是真心誠意的調整。因此我們可以預見達賴喇嘛對「時代」雜誌的言論，應該是並不討好的，但是達賴喇為什麼要作此調整呢？我們以為他還是真心為藏胞的幸福和長期的發展所做的調整。

(3)是達賴喇嘛的達觀和見識決定了他的調整，我們在訪問新聞稿中讀到「達賴喇嘛稱，四十五年的流亡令他失去了國家，成為無國家的人，卻也獲得學習新事物的機會。他說，“我是一位罕有的宗教人士，與別人比較，我結交了許多其他傳統文化的真正朋友”」，可以理解到他的達觀，對一個四十五年不能返家的、而又心繫故土的領袖能夠在流亡時看到光明面的新生事物，能夠將禍福是非自身加以調整，從流亡中得其自在，從絕望處營造希望，從痛苦處轉生智慧，足見其豁達和智慧之高妙。

三、評估：

雙方的第三次接觸已經結束，雖然至今為止個人所獲得的仍是片面的資訊，但是已經足夠使我們對此事接觸作出若干初步的判斷，至少從達賴喇嘛的角度來看，此次的接觸是一次的誠信之旅，雙方都肯定了接觸會談的必要性，因此雖然沒有進展，但是接觸之門是敞開的。雙方也承認問題的解決需要時間，而不能一蹴即成；其次這也是一次奠基之旅，特使團說「雖然這次會談在真正意義上還不是談判，但對將來繼續深入討論解決西藏問題奠定了基礎，具有重大意義」。從以上的說法來看，我們以為此次的會談至少使得雙方正確解讀對方的說語，理解雙方的根本分歧，突顯日後解決分歧的起點和方式，至少是避免分歧的深化，對減少誤解的擴大是有幫助的；其三對達賴喇嘛方面是一次展開善意的接觸，是一次建構善意之旅。我們詳細閱讀訪問新聞，我們發現特使團在記者會上的小心和謹慎。該說的就講、不該說的不講，這是遵守默契的作法，也由於特使團在前面兩次的接觸後的記者會沒有破壞默契，從而建立了雙方例行會面的慣例，所以此次的接觸應該不會出現無預警式的中斷。同時，此次接觸也是胡錦濤全面接班之後的第一次，胡掌權以來的第二次，雖然此次中共派出接觸的官員層級只是正部級，但是做為例行性的接觸可以說是已經是具有相對決策權力的領導，而且劉延東還是胡錦濤的重要幹部之一，配合上達賴喇嘛在「時代」雜誌的訪問中提出的說法「只有我們要求獨立，才會出現贏或輸的

二分法」，說起來達賴喇嘛是在持續傳達「不追求獨立」的善意。而進求一種雙贏的局面，對中共現今務實的技術官僚的領導而言，應該是一種善意的延續。因此個人以為經過此次接觸之後，大致而言，營造善意、雙贏目標和運用時間這三點大概是已經是雙方的共識，綜合以上的發展來看，個人以為從特使團所得的訊息雖然不是十分振奮，但是也仍具有期待性，經過了達賴喇嘛近半個月的思考之後，達賴喇嘛大概已經決定要主動加碼、積極回應，以便爭取他在有生之年可以解決問題。究竟達賴喇嘛的調整是否能夠奏效，最終達成雙贏的結果，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四、反省：

中共與達賴喇嘛之間曾經經歷兩次的戰爭殺戮，根深蒂固的文化落差，統治與獨立的政治對立，愛國主義的自尊和帝國主義介入的糾葛，其問題的複雜度、困難度沒有一項不比台灣問題來的複雜，但是兩岸之間至今不能談判，而中共與達賴喇嘛雙方已經開始了例行性的接觸，這裡自然存在著急於建構雙方和平新秩序，而兩岸和平新架構的台灣可以自省和效法的地方：

(一)原則妥協：這是達賴喇嘛最重要的智慧，他以主張「高度自治」、主張「一國兩制」來挑戰中國的「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淡化稀釋「西藏獨立的訴求」，此一變化使得中共與達賴喇嘛的鬥爭居於下風，使得國際組織支持支援西藏流亡組織具有法理上的正當性。中共只能反對，只能抗議，但是效果始終有限，所以世界上除了中共，沒有人認為達賴喇嘛是「麻煩製造者」。換言之，達賴喇嘛讓了原則，而自己無傷反而贏得更多的奧援，因此原則的妥協，反而使達賴喇嘛出拳更有力。事實上個人以為這也是中共不得不恢復與達賴喇嘛接觸的原因，否則在西藏議題上，中共政權將更站不住腳。

(二)策略配合：中共的解事方法在過程中喜歡低調，不張揚。這種策略並不利於居小的一方，因為在秘密的進行時，小的一方一但吃虧也無法公開於眾，所以過程透明化是在實力不對稱情況下自保的手段，然而達賴喇嘛十分清楚、

十分準確地研判中共當局行動的可能性，在策略上願意放棄自保的策略，配合中共在過程中完全保密，而且在事後的記者會也同樣緊守雙方的約定該說的說，不宜公開的不講，這種策略配合是建立互信，建立誠信的主要方法，本身也就是一種最好的善意，因此雙方的歧見也就比較容易解決之道。事實上不管是專制或民主制度在重大協商過程的保密都是理所當然，事後的公開、結果的公開、去接受監督、去接受考驗就可以防弊。

(三)與時俱進：任何策略和妥協都必須和時代變化、客觀環境相對話，依照客觀形勢變化而適應、調整以至創新策略。我們看看達賴喇嘛對「時代」雜誌所做的答覆就是有條件地贊成中共開發西藏的政策，這種轉變因為是有條件地，而條件滿足的解釋權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既可以解釋自己的變化，也可以認定毫無變化，因此敵人的應對必然陷入被動的態勢之中，這也包括達賴喇嘛在答覆有關自己轉世問題時也是一樣有變化，以往達賴喇嘛曾經說過不再轉世的個人決定，現在他說人民決定，同時也預測中共有可能另選一個達賴喇嘛的變化，是應該中共的變化顯然在班禪喇嘛大師圓寂之後中共願意尊重西藏宗教的舊傳統，使班禪大師轉世成為可能，因此達賴喇嘛自己的轉世，中共方面肯定不會貿然停止，所以剩下的問題就是大家相信所選擇的轉世靈童的問題，因此達賴喇嘛調整了自己的策略。

站在台灣的立場，我們覺得近年來台灣只有一種策略，就是對抗，以至對抗到我們自己不得不依賴另一個強權，依賴到失去自己的主體和獨立的法人人格，縱使我們提出一些橄欖枝的善意也十分粗糙，帶有一種將對手一軍或是吃對方豆腐的實質內容，因此幾乎沒有一個善意的策略可以奏效。看看達賴喇嘛的成功，台灣當局實在有自醒和檢討的必要，甚至在與達賴喇嘛的交往中，我們也沒有因為多了達賴喇嘛這樣的朋友而使自己更強大，反而是達賴喇嘛因為有了台灣而多了一個與中共交手的籌碼，優劣之間顯而定見，因此我們的策略實有檢討的必要。

第七章 西藏大開發與中、印關係 之戰略分析

中共的「西部大開發」的構想並不是一個純然經濟建設的計畫，而是一個綜合性的戰略構想，例如：西北部的大開發自然包括了經略中亞的戰略構想，而滇、黔、桂南的開發自然是針對東南亞發展戰略設計，因此西藏地區的大開發當然就是著眼於南亞地區的綜合關係的發展。南亞地區對中共政權而言，也是一個十分有爭議的地區，最早在中共政權建立的初期雙方的關係，維持了一定的邦誼，然而，由於印度自獨立建國以來，就承繼了其宗主國英帝國主義的想法，希望在中印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區。因此，在西藏與中國統一之後，中印之間就無法真正建立成一個坦誠友好的鄰居關係，到了1959年拉薩發生動亂達賴喇嘛隨眾叛逃，而印度政府給予政治庇護，雙方關係的潛在不隱的因素就逐步浮現出來，特別是雙方在以「麥瑪洪線」為主的邊界糾紛愈演愈嚴重之後，中共就發動了「懲印戰爭」，印軍慘敗，印度對中國就從不友好、猜忌轉為仇視，雙方關係就一直處於一種警戒狀態之中，在冷戰時代裡，印度採取「不結盟政策」以便從美、蘇雙方得利，從而增加印度自身的安全。1980年代以來，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綜合國力大大提高，印度自認的危機感也因而提升，於是印度對中國就採取「防禦」和「拉攏」並用的策略。從「防禦」的角度來看，印度於1998年5月公開走「核武化」政策，使印度成為核武國家，其後數年之間，印度更是大幅提升其國家軍力，而且所有的軍力提升無一不是以反華為藉口，以中國為假想敵，然而，印度的片面擴軍卻構成對宿敵巴基斯坦重大威脅，自然而然地刺激了巴基斯坦的擴軍，巴基斯坦也同樣發展核子武器以對付印度可能的「核訛詐」，進而巴基斯坦也和中共合作研發軍機，以茲因應。其結果是南亞的局勢大為緊張，這一趨勢的發展對印度並不有利，何況，印度

的國內尚存在著十分嚴重宗教、民族、經濟、社會等複雜的問題。同時，從印度的角度來看，西藏的大開發一但有成，印度手上的「達賴牌」就可能只是印度與中國開展新關係的一種負債而不再是一種的資產。

為了緩和印度自身壓力，印度的瓦杰帕依(Atal Bihari Vajpayee)總理在就任之後，開始改變了印度傳統的對華策略，改採拉攏的策略。以下本先針對中印關係的近期變化，作一描述；再就西藏地區的大開發對中共的南亞戰略的影響，進行分析。

第一節 中印關係之評析

一、基本情勢回顧

印度位居南亞次大陸，相對於亞洲大陸而言，在喜馬拉雅山的阻隔之下，是亞洲大陸的相對獨立地區，南邊的印度洋雖為東西海上交通必經之道，但對陸權國家而言，其重要性相對比較有限，在次大陸上中部有三個大國，也是南亞最主要的國家，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北部有三個小國，即尼泊爾、不丹、錫金(1975年被印度吞併)，南部則有二個島國，即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印度之西南，印度洋上群島國家)二個國家，總面積400多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為12億，¹⁵⁷同時也是世界四大古文明發源地和三大宗教的誕生地。自十七世紀西方帝國主義東侵以來，南亞次大陸也同樣遭受數百年的殖民統治，特別是十九世紀中葉1849年英國侵略而且征服了南亞的三大國，1858年印度的民族主義戰爭被鎮壓，開始了英國對印度半島的殖民統治，到1947年結束，印度宣佈獨立，同年巴基斯坦也獨立，不過分裂為東西兩塊，1971年東巴基斯坦獨立改名為孟加拉國，但是由於宗教上印度為印度教，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為穆斯林教，歷史上在抗英過程的齟齬以及建國理念，加上克什米爾的歸屬等因素的影響，以致

¹⁵⁷ 朱昕昌，《中國週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頁325。

南亞的二個大國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形成世仇之勢，這就增加了南亞在二戰之後的緊張關係¹⁵⁸。然中印關係在五十年代初並不壞，中共與印度在 1950 年 4 月 1 日建交，印度是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1954 年，中印兩國總理實現互訪，兩國領導人共同倡導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6 年周恩來總理再次訪印。直到 1959 年達賴集團出走，印度加以收留，之後兩國關係發生變化。1960 年初雙方為麥克馬洪線的領土爭議發生戰爭，兩國關係大幅下降¹⁵⁹。直到 1976 年大陸文革結束之後與印度關係才恢復正常。

回顧冷戰期間，印度在態度上比較親俄，而巴基斯坦比較親美，當時南亞的局部矛盾服從於國際的意識形態大矛盾之下；八十年代阿富汗戰爭結束，巴基斯坦對美國的战略價值也大大下降，冷戰結束之後，俄國的力量退回中亞以北，此時國際性矛盾和解了，代表世界大戰的可能已經逐漸消失，而局部的矛盾也趁勢而起，印、巴之間的矛盾自然也日益凸顯，從喀什米爾糾紛到宗教和民族的仇恨、猜疑、報復，造成南亞次大陸的軍備競賽，1998 年印、巴相繼進行核子試爆，此舉使得南亞次大陸變成世界另一個具有爆炸性衝突的地區，此一地區的危險性的增加本身對中共的西南部疆域就是一種威脅，特別是中國與印度的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邊界糾紛問題、處理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矛盾、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友好以及兩國有關喀什米爾的「邊界協定」、印度吞併錫金問題以及印度對中國強大的本能不安感，1998 年 3 月印度瓦杰帕伊總理(Atal Bihari Vajpayee)上台之後，以中國核彈威脅印度為由，於 5 月 11~13 日連續五次進行核試，巴基斯坦立即跟進，將印、巴推向核子國家。印度的核試的藉口可以說是完完全全推翻了中印自 1976 年互派大使其後多次的領導階層互訪，以至 1996 年雙方領導確立的「面向 21 世紀的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之間虛偽的「友好」關係使得中印關係又陷入膠著狀況¹⁶⁰，但似乎有助於印度自身建立面

¹⁵⁸ 同註 1，頁 327-332。

¹⁵⁹ 〈中國與印度的關係〉；資料來源：

<http://211.99.196.217:89/gate/big5/www.fmprc.gov.cn/chn/3119.html>

¹⁶⁰ 同註 3。

對中國的自信心。

雖然如此，但是冷戰結束之後，兩國基本上都是以國內發展為首要課題。在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以年均增長 9% 的速度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2000 年鋼產量達到 1.28 億噸；世界貿易中的份額繼續增加，2000 年已達 4743 億美元；2000 年底，外匯儲備增至 1656 億美元。2001 年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階段。國際奧委會決定由中國主辦 2008 年夏季奧運會，也生動地反映了中國的歷史巨變。

印度在經濟發展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最近十年來，印度經濟以年均 6% 以上的速度增長，迄今已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其科技水平和中國基本上處在同一層次，即屬於發展中國家中的科技先進國家。特別是印度的信息產業發展迅速，已成為世界主要軟件中心之一。2000~2001 年度，印度軟件業生產總值達 82.6 億美元，較上一年度的 57 億美元增長了近一半；軟件出口值達到 62 億美元，比上年度增長 55%。國外輿論認為印度將很快成為「軟件超級大國」¹⁶¹。

中、印兩國有了上述的經濟發展作為基礎之後，兩國的國家戰略開始修正，而兩國的關係也出現變化，但是兩國之間的問題仍然十分複雜，因此其關係的改善有進步也有困難。

二、中印關係的問題與癥結

(一) 中印之間的問題：

按中印多年的互動來看，中印之間主要的問題有四：

第一是邊界問題：邊界問題對這兩個在歷史都背負著被殖民歷史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國家來說，領土是神主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在中共愛國主義的教育和鼓勵之下，早已被西方反華勢力指為「中國威脅論」；對印度而言尚有 1962 年懲印戰爭的陰影，此一「恥辱」對印度而言，也是印度發展軍備的最佳藉口，對印度而言，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說：「印度需要和平與發展，但印度在領土問題

¹⁶¹ 程瑞聲，〈論新世紀的中印(度)關係〉，《中國外交》2002.04，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頁 51。

上寸土不讓，如果有人想染指印度的主權，我們將被迫實施核反擊。中印兩國在邊界問題上雖已進行多輪外交談判，但仍沒有徹底解決分歧。在領土問題上，印度既不會主動放棄非法侵占中國的 9 萬平方公里土地，也不會放棄對中印邊境西段我國 3.5 萬平方公里國土的覬覦」¹⁶²。因此雙方從 1988 年開始有邊界小組進行談判，但是由於雙方立場差距太大，所以迄今一事無成，只能消極維持不出現緊張而已。

第二是中印雙方對對方境內的民族分裂主義者的態度：在中國有西藏的達賴喇嘛，在印度則有阿薩姆邦(即喀什米爾)的分裂主義者，但是印度對達賴喇嘛集團是保護、包庇，而中國政府的態度則是不干預內政，所以印度官員也說：「中國從來不鼓勵阿薩姆邦的極端主義鼓動者非法越過邊界到中國去並把問題國際化。中國的這種合作性的不干涉的立場使印度獲益匪淺。印度政府應真心誠意地採取行動，拋棄英國殖民主義在西藏問題上的兩面派政策，消除印度在西藏問題上的盲點，並通過有意義的行動向中國保證，印度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¹⁶³。」

第三是錫金(Sikkim)問題：錫金是中、印邊界上的一個小國，原本在十七世紀建國，其後在英國殖民印度之後，1887 年強占錫金，1890 年將錫金納為保護國，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印度獨立，就繼承了英國人的權利，1949 年進軍錫金，1950 年簽訂兩國的「和平條約」，錫金成為印度的保護國，1975 年印度軍隊軟禁錫金國王，不久印度國會通過決議正式把錫金變成印度的一個「邦」¹⁶⁴。印度的行徑自然引起中國安全上的顧慮，然而中國在此一問題態度比較慎重，1994 年錢其琛在印度指出雙方正在討論，這一問題「將逐步解決」，¹⁶⁵不過印度仍然十分關心中國在此一問題的立場。

第四是中巴關係：中國高度重視巴基斯坦這個值得信賴的朋友。每當巴基

¹⁶² 羅援，《世紀回顧與前瞻：2002 版戰略評估》，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頁 169。

¹⁶³ 同註 5，頁 51。

¹⁶⁴ 郝文明 主編，《中國週邊國家民族狀況與政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頁 408。

¹⁶⁵ 同註 5，頁 51。

斯坦遇到困難的時候，中國總是給予有力的支援，而在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巴基斯坦對中國的立場總是表示支持。中巴關係對中國保持在南亞的政治影響力，防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蔓延意義重大。但是，印度對中巴友好關係耿耿於懷，抱怨中國對印度的「安全關切」缺乏「足夠的敏感」¹⁶⁶。印度學者指出：「中國在核領域對巴基斯坦的援助違反了國際上所有的核不擴散條款，事實清楚，印度政府的文件可以提供證據。根據印方的情報中國一直向巴轉讓可以生產核武器的裝置和M11s的運載裝備，甚至向巴提供用來重新加工核原料不和生產M11s的整座工廠，而且現在依然沒有放棄的打算。並且中國還對巴和朝鮮的相關領域的合作提供方便，在中國的默許之下，巴航飛機在九十年代後半期一直以中國新疆的烏魯木齊為中轉站，頻繁地從平壤向伊斯蘭堡運送朝鮮的Nodong導彈及其部件。事實已經證明，巴基斯坦發射的高裏導彈正是貼著把本土標籤的Nodong。更讓印度不安的是，據2000年7月2日的《紐約時報》報導，中國正在繼續幫助巴基斯坦發展能夠攜帶核彈頭的遠程導彈，現在正在加緊向巴運送特性鋼和制導系統，同時根據美國的情報近期在巴的導彈工廠附近發現了中國的工程技術人員的身影¹⁶⁷。」

以上的四個問題可以說是中印關係友好的難題，而且平分秋色中國、印度各有兩個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十分棘手難解的問題，反映到中印關係上就十分矛盾曲折，而問題癥結在於以下幾點。

(二)中印關係之癥結：

第一、印度的自信心弱於中國：中印都是文明古國，但自1960年初兩國發生衝突之後，印度對中國就陷入一種極端無自信的階段¹⁶⁸，因此印度在南亞鼓吹

¹⁶⁶ 馬加力，〈中印關係為何這樣難？〉，人民網 2001.03.15；

<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a/24/20010315/418021.html>

¹⁶⁷ 昌德拉斯卡蘭，〈“周邊看中國”：三國鼎立---三種安全觀的較量與沖突(1)〉，資料來源：

<http://www.people.com.cn/BIG5/junshi/62/20010423/448982.html>

¹⁶⁸ 巴什亞漢·卡斯圖里，〈“周邊看中國”——中國：印度的敵人還是朋友？〉，資料來源：

<http://www.people.com.cn/BIG5/junshi/62/20010425/451538.html>

「不結盟」的外交，將任何南亞國家與外國的結盟¹⁶⁹，尤其是巴基斯坦與任何國家結盟，都視為是針對印度的敵對行為，但印度自己則是親俄，希望聯俄制中，此一情結一直到印度有了核子彈之後才有所改善。到今年五月底印度總理瓦杰帕伊訪問中國，記者闡釋印度總理訪華的意義是說「總理傳達的信息是毋須懼怕中國」¹⁷⁰，才算走出了印度自 1960 年以來對中國的外交陰影。對中國而言，這一方面的心態比較不重，但對印度也存有戒心與不安，例如在此次的中印互動之前，大陸媒體在討論不多的中印關係中就刊登過〈西部大開發—印度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中國專家推測：印度可能挑起邊界爭端〉、〈我們不應該輕視印度〉、〈印度真會超過中國？〉、〈中國應該向西藏和新疆大量增兵〉、〈印度的真實戰略意圖〉等文章¹⁷¹。足見中國對印度的戒心。當然中國比印度更早具有自信，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比印度為早。

第二、印度對中國的關係建立在仇恨和戒心，而中國對印度則比較務實：印度對中國的仇視和誤解，巴什亞漢·卡斯圖里認為，長時間的隔閡和相互的猜疑使印度政府很難瞭解中國真正的戰略意圖，實際上中國遠沒有印度想像的那麼複雜，他的戰略意圖無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中國意在成為世界一流強國，他不會容忍印度對其內政和外交的任何干涉。

2、中國尋求和巴基斯坦建立特殊的夥伴關係來徹底孤立印度，並試圖在南亞地區架空美國的影響。

3、中國進行核擴散既有物質利益上的考慮也有地緣政治上的考慮。

4、中國尋求和緬甸加強雙邊關係的目的在打通進入印度洋的陸上通道。

同時他也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窮兵黷武的傳統，且對武力特別迷信，因此對待中國最好的方法就是以牙還牙。基於上述理由，在印中邊界相對中國駐

¹⁶⁹ 同註 1，頁 336。

¹⁷⁰ 資料來源：<http://www.rediff.com/news/2003/jun/27china.htm>

¹⁷¹ 資料來源：<http://www.cmilitary.com/topicReader.php?topicid=44>

軍來講在地緣上尚處在劣勢的印度軍隊需要進行重新部署，以迎接未來中印關係可能出現的緊張局面。此外，在討論影響未來中印關係的因素時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被忽略了，那就是印度水資源面臨著被中國控制的危險。印度有兩條大河發源於中國(布拉馬普特拉河和印度河)，一旦中國在上游建立水壩蓄水發電，或者任由上游的洪水不加控制的流向印度，這對印度來講都意味著一場災難，最近印度軍方就有人向政府提出，去年印度東北部的洪水和中國境內的水壩破裂崩潰有很大關係。在經濟方面與中國進行互惠交流是必要的，但要搞清楚中國的外貿規則，特別需要研究的是為什麼中美貿易會出現如此大的有利於中國的逆差，這項研究將有助於印中貿易的健康發展¹⁷²。

反之，中國的學者則認為，雖然中國的學者和科學家一直關注著印度核力量的發展，但是即使是在 1998 年印度核試驗和 2000 年印度成功發射烈火II型中程導彈後，中國也只有極少數人認為印度是中國安全的威脅¹⁷³，而印度學者在撰文中竟然認為這是令人費解的事。事實上，這正是因為印度對中國有仇恨的情緒，而中國人對印度則沒有類似的仇恨，更進一步中國學者在撰述中印關係時，大部分都是希望兩國能夠友好相處，如趙干城認為，儘管印度有人將中國視為威脅，但中國目前並沒有將印度視為現實威脅的想法，因此這種判斷敵我的狀態，至多也只是單向的，這個事實本身就是改善和穩定兩國關係的基礎¹⁷⁴。程瑞聲認為，中印關係是比較複雜的，既存在共同的利益，也有一些有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兩國的共同利益是全局性的、戰略性的、長遠的；而兩國之間存在的問題則是局部的、次要的、暫時的，其中有些正在獲得解決，有些則通過雙方努力可望在今後解決。因此，兩國的共同點遠遠大於兩國的分歧¹⁷⁵。

第三、中共對印度的不放心：中共原先對印度的關係不錯，其後之所以發

¹⁷² 巴什亞漢·卡斯圖里，〈“周邊看中國”——中國：印度的敵人還是朋友？〉，資料來源：
<http://www.people.com.cn/BIG5/junshi/62/20010425/451538.html>

¹⁷³ 昌德拉斯卡蘭，〈“周邊看中國”：三國鼎立---三種安全觀的較量與沖突(1)〉，資料來源：
<http://www.people.com.cn/BIG5/junshi/62/20010423/448982.html>

¹⁷⁴ 趙干城，〈論中印關係在中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中國外交》2003.02，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頁 32。

¹⁷⁵ 同註 5，頁 55。

生猜忌，與 1959 年印度收留達賴喇嘛而且提供達蘭莎拉助其建立流亡組織，攻擊中共的治藏政策存在直接的相關性，其後達賴喇嘛一直以印度為基礎，連絡海外藏胞大肆反對中共；從中方看來，印度一心想接收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全部遺產，所以吞併錫金，強占麥克馬洪線的中國領土，與巴基斯坦爭奪喀什米爾的主權，進而侵略西藏，以便使西藏成為中、印之間的緩衝區，上述這些作為從印度的角度來看，是他們反殖民主義心態下民族主義的實踐，但是對中國而言，印度的民族主義實踐卻影響到中國的民族主義的體現，而收留達賴喇嘛正是印度此一心態的反映，所以印度一日不肯正視達賴喇嘛及流亡組織借印反華的事實，則中印關係就必然無法順利發展，印度一日不肯以合作的態度共同處理麥克馬洪線的未定界，中國對印度就不能真正放心。印度自然也很了解中國的憂慮，但是麥克馬洪線是印度的面子，達賴喇嘛暨流亡組織是印度的棋子，印度豈肯輕易放手。

三、中印新關係的特點

從以上的所討論的中印關係的複雜性，就不難瞭解過去中印之間相關改善關係的努力何以都成效有限，反之此次瓦杰帕伊總理訪問雙方所簽訂的「中印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所代表的兩國關係，應該說是中印關係的轉捩點，因此稱此一文件為中印新關係的宣言並不為過。具體而言，此一新關係則是兩國從原先相互防範和威脅的關係，轉而為健康的競爭對手關係。具體而言，新關係的特點如下：

第一、從反華先鋒到合作推手：中印的高層雖然在近幾年互訪的次數很多，涉及的種類也多，但是印度現任總理在近一個月內與中共國家主席見面三次，而且最後的一次是印度總理十年以來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兩國領導如此頻繁的見面，可以說是少見的，更令人重視的是目前大力推動中印全面合作的總理正是當年信誓旦旦以中國威脅而堅持發展核武的總理，五年後他的政治態度竟然出現如此巨大的變化，其動態令人難免懷疑。

第二、合作內容更加全面：中印之間在 1988 年簽署聯合新聞公報，在 1993 年又保持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和平與安寧的協定、環境合作協定、廣播電視合作協定，1996 年雙方簽訂了「面向 21 世紀的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並就雙方保持高層往來，推動兩國經濟合作，加強在國際領域的相互支持等廣泛的共識，但上述的協議事實上都不及此次協議，從解決糾紛到國防軍事到經貿合作再到文化、教育、科技、媒體、青年的交流，而且雙方同意指派代表，探討解決雙方最棘手的邊界問題。足證在中、印兩國各自有了自信之後，和平的手段就更加成為解決問題的重要手段。

第三、更具互利性：中印之間以往由於長期的互信不足，因此近十餘年雙方的領導人互訪、協議的簽署，雖然也都具有一般外交辭令，但是我們在雙方學者在本世紀初的雙邊關係討論中仍然看到的是雙方的猜忌，尤其是印度的學者，但是經過十餘年的努力，還是起了建立與積累互信的功能，因此此次的瓦杰帕伊才有可能以其就任之初強烈反華，組建印度核武力量的鷹派形象，反而與中共建立具體而互利的合作關係，例如印度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內的自治區¹⁷⁶，而在錫金問題中共也同樣開放了錫金的中印邊貿¹⁷⁷，中方學者認為這是策略性承認錫金為印度的一個邦¹⁷⁸，又如在兩國相互的投資方面，印度政府也鼓勵其商人爭取 2008 年的奧運商機¹⁷⁹，特別在資訊技術方面，印度也鼓勵軟體公司到中國投資，而且在資訊的教育和訓練各方面雙方都將合作¹⁸⁰，中國自然也很歡迎印度資訊技術來華投資，所以此次的合作是具體的而且互利的。

第四、進一步消除中國、印度、巴基斯坦關係的猜疑：由於此次的雙方合作是具體、全面而互利互惠的新關係的建立，可見中方和印方在對自己有信心

¹⁷⁶ 《中國和印度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資料來源：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4/1932878.html>

¹⁷⁷ Anil K Joseph, *Sikkim issue unresolved: China*, June 24, 2003;

<http://www.rediff.com/news/2003/jun/24china.htm>

¹⁷⁸ 胡仕勝，〈中印關係邁入良性互動全面合作期〉，人民網 2003.06.28，資料來源：

<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033/1940900.html>

¹⁷⁹ *Vajpayee markets Indian IT for 2008 Beijing Olympics*, June 26, 2003;

<http://www.rediff.com/money/2003/jun/26pmchina1.htm>

¹⁸⁰ *IT majors welcome move to China*, June 27, 2003;

<http://www.rediff.com/money/2003/jun/27priya.htm>

之後，都發現一個市場大國和一個軟體大國的合作是十分必要，問題在於中印關係的突然提昇是否打破了原來的中、印、巴三角關係，而引起巴基斯坦的疑慮，中國方面在此問題上一再表明希望三國的三角關係呈現良性循環同步發展，所以中國主動與印度、與巴基斯坦分別改善關係，而且也歡迎印巴之間任何有利於改善雙邊關係的舉措，對敏感的喀什米爾問題，中國的立場是不介入、不偏袒及和平解決¹⁸¹。以往中共也坦誠這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收獲十分有限，原因在於印度難以脫離戰略思維模式的外交思考，如今印度也願意與中國合作，而巴基斯坦又將至少在現階段或表面上是採取贊同期待的態度，¹⁸²這就為傳統的三國三角關係找到了新的出口。

四、中印關係改善對中國的意義

第一、有助於中國戰略目標的實現：眾所週知中共自九十年代開始為因應天安門事件的孤立以及後冷戰的國際新秩序，中共大力強調和平與發展的重要性。在九十年代中共的和平睦鄰政策有了相當的成效，大陸學者稱此外交政策是從和平共存邁向和平發展¹⁸³，但是在中國週邊的鄰邦中，只有印度一直無法與中國真正和平共存，如今如果印度也能和中國發展互利、互惠的新關係，對中國而言，是從戰略上完成了週邊和平的重大任務，肯定對中國的西部開發和繁榮是大大有利的發展，對中國未來的戰略就形成攻守兼備的形勢；守則為陸權大國，攻則為陸權、海權並重的大國。

第二、有助於中國國家安全係數的提昇：自從印度在 1962 年戰敗之後，印度對中國不論在心理上、情緒上和真正的軍備上，都是以中國為敵，雖然印度的發展仍然不及中國，但畢竟是中國西南邊境的不安因素，而且印度自從核試之後，一定企圖在世界扮演成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此一國家如果是與中國

¹⁸¹ 同註 1，頁 383。

¹⁸² Indo-Asian News Service, Sino-India ties in Islamabad's interest: Musharraf, June 28, 2003; <http://in.news.yahoo.com/030628/43/25i1i.html>

¹⁸³ 吳紫辰，〈中國外交思想的演變：從「和平共處」到「和平發展」〉，《中國外交》2002.09，頁 9-10。

長期為敵，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影響必然很大，假如中國面臨西南有印度，東南有台灣，東北有日本，則中國的安全性自然是可慮的，如果中印關係倘能真正好轉，自然大大提昇了中國的安全係數。

第三、有助於解決西藏問題：西藏問題是中國在內政上的麻煩，達賴喇嘛流亡組織常駐印北，對中國解決西藏問題自然構成不便，而中印關係的改變必定壓縮了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空間，這也有助於西藏問題的解決，同時也可以穩定中國與中亞的關係，削弱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影響力，因此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極大的利多。

第四、有助於中國將國家注意力東移：這對台灣而言自然比較不利，中印關係的改善對中國而言，等於是西線無戰事，因此在中國完成小康社會的建設過程中就可以專注於東南方的麻煩，因此台灣所感受的壓力無形之中自然是大大增加。

第五、有助俄國總統普京所提議的中、印、俄三國的軸心同盟：俄國的提議從短期來看可以制衡美國在中亞的野心，阻止美國控制中亞的油源；長期而言，則有助於重新聯合世界上最大的陸權、海權國家掌握世界的陸地資源，重塑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原本中、印、俄之間，中俄、俄印的關係都具有傳統的基礎，也有現實的利益，只是中國與印度之間相對疏離，因此此種聯合幾乎沒有任何可能，而中、印新關係的建立為此一軸心帶來了很大的可能性。此一構想本身對現存的國際秩序的衝擊自然是十分直接和巨大。

然而我們也不可以片面的預測此後的中印關係將是一帆風順，畢竟自從1988年拉吉夫·甘地訪問中國以來，中、印兩國都希望能改變兩國的關係，結果我們還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兩國之間簽訂的協議、和約並不少，而究竟實踐的情況如何呢？恐怕令人質疑。特別是印度的仇華心態又大大勝過美、日，所以兩國之間的問題不可能因為瓦杰帕伊的訪問而能完全解決，再加上美、日等國是否樂見中印關係的改善也是一大疑問。中印關係糾葛在如此複雜的、不明的國際關係之中，其實尚有很大的困難橫互其中，不過其中最大的

變數還是印度自己的心態如何，印度一直不能調整其仇華心態，則無論兩國的努力為何，都是白費心機。所幸由於中國自身的強大和國際地位的提昇已經使得印度各界開始提出若干自省。印度內閣秘書處前負責人普拉薩德日前呼籲，印度各界必須要以現實的眼光在各個層面正視印度和中國之間的競爭。印度總理瓦傑帕伊日前也表示，印度與中國相互間是一種「健康的競爭關係」。印度的許多分析人士認為，在全球化飛速發展的當今世界，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加上又是鄰國，中印存在競爭是完全合理正常的，但應該是在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基礎上的友好競爭¹⁸⁴。

第二節 西藏大開發與中共南亞戰略

一、四大工程與西藏：

在中共的西部大開發的規劃中有四項極付野心的浩大工程：「青藏鐵路、南水北調、西氣東輸和西電東送」，而其中的前兩項工程都與西藏直接有關，按中共的說法是「青藏鐵路西寧至拉薩全長 1956 公里，其中，西寧至格爾木 814 公里已於 1979 年鋪通，1984 年投入營運。今天開工修建的青藏鐵路格爾木至拉薩段，北起青海省格爾木市，經納赤台、五道梁、沱沱河、雁石坪，翻越唐古喇山，再經西藏自治區那曲、安多、當雄、羊八井、南至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全長 1142 公里，其中新建線路 1110 公里。格拉段沿途經過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地段有 960 公里，翻越唐古喇山的鐵路最高點海拔 5072 米。根據設計，青藏鐵路施工總工期為 6 年。

中共西藏自治區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國勇說：「交通不便，導致人口流、物資流、資訊流不暢，是制約西藏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他認為，青藏鐵路

¹⁸⁴ 錢峰，〈印度愛和中國比：上海VS孟買〉，資料來源：
<http://www.cmilitary.com/articleReader.php?idx=33816>

的建設對西藏來說是一場革命。它將帶來一系列根本性的變化：思維觀念的變化，生產力佈局和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等等。青藏鐵路正在成為西藏百姓談論的熱門話題。西藏社會各界人士普遍認為，交通「瓶頸」成為制約西藏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目前青藏公路承擔著 85%以上進出藏物資和旅客運輸的巨大壓力，而民航運輸則由於高成本和低運量，不能滿足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青藏鐵路的建成，將填補中國西部鐵路路網的空白，形成北京至蘭州至拉薩的運輸大通道，成為西藏與內地聯繫的重要交通要道。西藏官員預計：「鐵路建設將推動西藏高原特色經濟與內地經濟的融合，西藏的產業和產品將沿著這條鐵路線走向全國和世界。」礦產、藏醫藥、農畜產品和民族手工藝等高原特色產業，都將受益於青藏鐵路，從而產生出巨大的經濟效益。在研究方面據有關部門提供的資料顯示，青藏鐵路沿線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僅藏北「資源走廊」礦產資源潛在價值高達 6 萬億元，佔西藏礦產資源價值的 60%，顯示出巨大的經濟開發潛力，被稱為西藏的「金腰帶」。青藏鐵路建設總指揮部總指揮長盧春房說，青藏鐵路將成為西藏資源開發的「快車道」，為將西藏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提供原動力。在觀光旅遊方面，有關人士也認為青藏高原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一直吸引著眾多的國內外遊客，每年的進藏遊客量呈大幅上升趨勢。僅去年，西藏旅遊業總收入比上年增長 29%。但由於目前遊客進出西藏主要靠航空通道，運力有限且費用高。青藏鐵路的建成，將使青藏高原成為中國西部黃金旅遊熱線。為此西藏已經提出了新世紀「跨越式」發展藍圖：「十五」期間經濟增長速度達到 12%以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 2005 年進入西部地區前列，到 2010 年達到全國中等發展水準¹⁸⁵。

南水北調工程分西線、東線、中線 3 條調水方案。西線方案是從長江上游的通天河、雅礱江、大渡河，引水入黃河，以解決西北地方的缺水問題；東線方案是從長江下游揚州三江營江面抽引長江水，沿著京杭大運河蘇北段和沿途

¹⁸⁵ 〈青藏鐵路將成為西藏社會經濟發展的“快車道”〉，新華網 2003 年 10 月 31 日；資料來源：<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qzt/432889.htm>

河湖北上，在山東東平附近穿過黃河進入河北、天津；中線方案由漢江上游的丹江口水庫引水，跨長江、淮河、黃河、海河四大流域，經過河南、河北等城市一直流向北京、天津。如此宏偉的工程，在世界水利史上也是罕見的。南水北調工程的偉大意義，在於它是我國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水資源的一次帶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的結構調整。這項工程完工後，它將淮河、黃河、海河流域相連相通，統一互用，構成我國水資源“四橫三縱、南北調配、東西互濟”的新格局。南水北調工程全部建成以後，每年的調水量相當於在北方再造一條黃河，將從根本上扭轉中國水資源分佈嚴重不均的被動局面¹⁸⁶。」

西線調水工程位於長江源上通天河、雅礮江、大渡河的上游，地處高原寒帶、亞寒帶及寒溫帶，海拔 3400~4500m，工程區面積 30 萬 km² 左右，這一地區生態環境平衡條件極其脆弱，一旦破壞，永久不能恢復。大規模的工程建設可能給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工程實施後將改變原地貌，破壞原生植被，縮小涵養水源的高原草甸、沼澤、森林面積，擴大沙漠化荒漠化的趨勢，加劇水土流失。使長江上游的水環境更加惡化，從源頭上影響長江的造水功能。…西線調水工程，實際上是一項調長江源頭之水以補充黃河水源的引水工程。從已經專家審定的《南水北調西線工程規劃綱要》來看，工程的可行性、有效性以及經濟合理性都存在較大問題，工程面臨的巨大風險還缺乏確切的科學評估。因此，規劃尚需從長計議，決策更應慎之又慎。倉促定案，一旦造成決策失誤，將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¹⁸⁷。

不過按中共的計劃這項大工程一個是希望徹底改變西藏與大陸各省、市的交通連絡，從可以大大拉近大陸各省市人民和西藏人民的地理距離和心理距離；另一項工程更是改變全中國水利資源、生態環境的重大工程，有於平衡中國全境的經濟發展，建立一個整體的經濟區塊，當然到目前為止，西線的南水

¹⁸⁶ 〈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中國民族雜誌 2001 年第 8 期；資料來源：

<http://www.56-china.com.cn/china1-12/8q/zgmz-nw8m31.htm>

¹⁸⁷ 魯家果，〈南水北調西線工程決策要慎重〉；資料來源：

<http://bbs.newssc.org/disppbs.asp?BoardID=9&ID=75117&page=1>

北調工程尚僅止於評估和論證階段，並未真正啟動，相信在取得精確地科學論證以前，中共應不致貿然啟動。

二、各省、市對口支援：

一、資料蒐集：

中共治藏之後，在五十、六十年代曾在西藏地區進行了大規模建設支援，總得來看，支援可以分為三大類：財政補貼、項目援藏和幹部援藏¹⁸⁸。到了「改革、開放」之後，對西藏更是大力支援，而在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分別進行了 43 項和 62 項的中央與各省、市的大規模援藏的建設¹⁸⁹。應各省、市的援藏部門，以

¹⁸⁸ 靳薇，〈援藏項目效益調查報告〉，《中國藏學》，2000 年第 3 期，頁 1。

¹⁸⁹ 一、《43 項工程》

1984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會議決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四川、廣東、山東、福建等 9 省市和水電部、農牧漁業部、國家建材總局等有關部門，幫助西藏建設 43 個近期迫切需要的中小型工程項目。這 43 項工程從同年 3 月陸續開始動工，到 1995 年 12 月，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經過 1.9 萬餘名建設者的艱苦奮鬥，全部建成投產或交付使用，向西藏自治區成立 20 周年獻上了一份厚禮，凝結著中共中央、國務院對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切關懷，飽含著全國人民對西藏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誼。

(一) 專案安排:43 項工程

按《行業》分：能源 7 項、交通 2 項、文化及體育 9 項、醫療衛生 4 項、教育 2 項、旅遊 9 項、建材 2 項、商業 4 項、市政建設、加工業及其它 4 項；

按《地區》分：拉薩地區 24 項，日喀則地區 6 項，山南地區 3 項，昌都地區 3 項，那曲地區 4 項，阿裏地區 3 項；

按《承擔援建任務的單位》分：江蘇省 8 項、浙江省 3 項、四川省 8 項、山東省 6 項、天津市 4 項、廣東省 3 項、福建省 2 項、水電部 3 項、農牧漁業部 1 項、國家建材總局 3 項、西藏自行承擔 2 項；此外，北京和上海兩市及機械工業部也派人進藏參加了有關專案的援建。援建單位主要負責工程的施工，一般不承擔專案的投資。

(二) 完成投資

建設 43 項工程，共完成投資 4.8 億元，其中：中央財政補助投資 1.78 億元、國家有關部委投資 0.62 億元、西藏地方投資 2.4 億元。在共完成投資 4.8 億元中，按行業分：能源 0.59 億元、交通 0.30 億元、文化、體育 0.65 億元、醫療衛生 0.36 億元、教育 0.16 億元、旅遊 1.85 億元、建材 0.28 億元、商業 0.12 億元、市政建設、加工業和其他 0.41 億元以及有關項目配套投資 0.08 億元；按地區分：拉薩地區 3.33 億元、日喀則地區 0.37 億元、山南地區 0.23 億元、昌都地區 0.13 億元、那曲地區 0.31 億元、阿裏地區 0.15 億元以及有關專案配套投資 0.28 億元。

二、《62 項大慶專案》

1994 年 7 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決定，由國家有關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幫助西藏建設 62 個專案，以此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 30 周年。各專案工程從同年 7 月陸續開工動工，截至 1997 年底，除 2 個專案還在繼續抓緊建設外，其餘項目均已建成投產或交付使用。總體上看，工程進度快、質量高。

(一) 專案安排

62 項大慶工程項目的安排，與 43 項工程相比，經濟發展專案多於社會事業發展項目。經濟發展項目達 39 項，占 62 個項目的 62.9%，而在 43 項工程中僅占 30.2%。62 個項目按行業分：農牧林水 6 項，工業 11 項，能源 15 項，交通、郵電、民航 7 項，文化、教育、衛生和廣播電視 13 項，市政建設及其它 10 項；在農牧林水、工業和能源項目中有 4 個交叉項目未重複計

中共自己的說法是：自 1994 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了「分片包乾、對口支援、定期輪換」的對口支援西藏決策以來，西藏縣域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經濟實力正在增強。「中央關心西藏，全國支援西藏」是黨中央國務院為加快西藏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西藏局勢的進一步而穩定而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以後，全國 15 個對口援藏省市和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認真落實“三次座談會”精神，把援藏工作作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來抓，設立機構，制定規劃，及時研究解決問題，不斷加大援藏資金投入力度。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的 62 項工程，累計投資 48.6 億元，其中國家和各省、市、自治區、國家部委、金融機構投入 46.81 億元。在 5 年中 15 個省市還無償援建 576 個建設項目，投資達 22.37 億元，各部委援建項目 140 個，投資 9.2 億元。這些專案涉及農牧業水電、工業、市政、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廣播電視等領域。這些專案的建成，大大增強了西藏的經濟勢力，增強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後勁。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又擴大了援藏力度，從原來的全國 15 個省市擴大到幾乎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和部分全國重點企業，現在西藏所有 73 個縣都有一個對口支援地區，援建專案也有了增加，除了中央確定的 70 個項目外，

算，即東久林場開發包括的林場電站計入能源專案個數，申紮金礦和易貢茶廠分別包括的甲崗電站和茶廠電站也未計入能源專案個數，滿拉水利樞紐工程電因發電裝機容量較大(2 萬千瓦)而只計入能源項目個數，來計入農牧林水項目個數。從 62 個專案分佈的地區看，拉薩地區 14 項，日喀則地區 5 項，山南地區 8 項，昌都地區 8 項，林芝地區 6 項，那曲地區 5 項，阿裏地區 3 項；跨地區專案 11 項，還有 2 個專案建在區外(格爾木煉油廠至 101 油庫輸油管線和北京西藏大廈)。承擔援建 62 個專案的單位，不僅是國家各有關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而且還有有關省市的一些地級市；所有援建單位不僅要原擔專案投資，而且其中多數單位還要承擔施工任務，直到專案建成“交鑰匙”。

(二)落實投資

62 項大慶項目，原定總投資 23.8 億元。在實施過程中，鑒於西藏的特殊情況，國家有關部委和對口援藏省市根據專案建設的實際，相繼增加了建設投資。截至 1997 年底，共落實投資 37 億元，實際完成投資為 25.3 億元，占落實投資的 68.4%。

落實投資 37 億元，按《投資來源》分：國家各有關部委 27.8 億元、各省、市、自治區 9.2 億元。按《行業》分：農牧林水 0.66 億元、工業 2.55 億元、能源 20.36 億元(包括甲崗電站、東久林場電站、易貢茶廠三個交叉項目)；交通、郵電、民航 3.17 億元，其中：交通 1.42 億元、郵電 1.28 億元、民航 0.47 億元；文化、教育、衛生和廣播電視 3.45 億元，其中：文化 1.08 億元、教育 0.69 億元、衛生 1.40 億元、廣播電視 0.28 億元；市政建設及其它 6.81 億元，其中：市政建設 3.12 億元、其他 3.69 億元。按《地區》分：拉薩 6.37 億元、日喀則 9.05 億元、山南 8.93 億元、昌都 2.73 億元、林芝 1.49 億元、那曲 2.06 億元、阿裏 0.44 億元、跨地區專案 4.01 億元、區外專案 1.92 億元。新聞來源：《西藏日報》2002 年 8 月 13

日；<http://www.chinatibetnews.com/GB/channel16/85/200208/14/1037.html>

各省市、自治區新增援藏專案約 1008 個，為縣域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活力。對口援藏，不僅提高了政府的能動力，而且增強了縣域經濟的競爭力¹⁹⁰。

在中共召開第四次西藏工作會議之前，中央和各省、市先到西藏實地考察之後，確定了拓寬援藏的領域，加大了力度，中央確定有 117 個重點項目，總投資 317 億多，這些建設項目正在進行落實，同時全國其他兄弟省市對口援藏的項目也不少，總投資大概是 10 億多¹⁹¹。如果細部來看，中共在 1984 年 3 月之後，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¹⁹²，制定援藏 43 項工程，包括能源、交通、商業旅遊、文教體育、醫療衛生和市政公用等方面的基礎建設，其中 20 項建設在拉薩，其餘則分布在日喀則、山南、那曲、昌都和阿里等五個地區，總經費 4.77 億元，參與的省市包含江蘇、天津、廣東、浙江、山東、四川、福建、北京、上海等九個省市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而 1994 年的援藏工程中，其中由中共中央承辦 30 個項目，18.02 億人民幣，負擔 75.7% 資金，而各省市地方對口支援 32 個項目，5.78 億人民幣，負擔 24.3% 資金¹⁹³。從援建形式來看，分為三種：第一是交鑰匙工程，由援建單位直接設計施工，最後把鑰匙繳給受援單位；第二是援建單位提供資金，由西藏自治區自行設計施工；第三是援建單位派出工程技術人員主持項目¹⁹⁴。至於受援地區可細分為自治區 20 項、拉薩市 7 項、山南地區 8 項、日喀則地區 5 項、阿里地區 3 項、那曲地區 5 項、林芝地區 6 項、昌都地區 8 項¹⁹⁵。以上的政策作為雖然在需求上，產生「西藏要資金，中央給政策」的需求，然而，從戰略上的角度理解可以有以下三點：

首先是民族認知和情感的影響：按中共的兄弟省、市的對口支援，並不只

¹⁹⁰ 〈西藏發揮對口援藏優勢促進縣域經濟〉，新華網西藏頻道 2003-12-04；資料來源：

http://www.xz.xinhuanet.com/zhongyangguanxinixizang/2003-12/04/content_1293297.htm

¹⁹¹ 〈手足情深-----全國援藏工作成效顯著 9 月 30 日〉；資料來源：

<http://www.cctv.com/overseas/chinareport/200109/30.html>

¹⁹² 第一次的援藏工作係於 1965 年，中共於西藏成立西藏自治區之後完成。多吉占堆，〈四十三項工程惠澤今日高原〉，《中國西藏》1995 年第 1 期，頁 5。

¹⁹³ 李瑞環，〈振奮精神，乘勢而上，扎實援藏〉，《西藏六十二項援建工程》，北京：中國藏學，199 年，頁 143。

¹⁹⁴ 廖東凡，〈六十二項援藏工程始末〉，《西藏六十二項援藏工程》，頁 171。

¹⁹⁵ 王維芳，〈中共內地援藏工程簡析〉，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第 10 卷第 1 期，民國 90 年 1 月，頁 45。

是金錢、工程項目的支援而已，必然需要各支援省、市派出幹部、人員進藏援助，而且每一項目常常須時數年之久，因而派出的人員也不會很少，何況此類的援助自八十年代以來就發動過兩次，基本上可以說各省、市的援藏工作已經成為該省市的長期性的業務¹⁹⁶。換言之，大陸的各省、市已經是長期有幹部或人員往來于省、市和西藏之間，如此頻繁的互動肯是有助于大陸各省、市漢族幹部、人民對西藏和藏胞的文化與宗教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也增加藏胞對大陸各省、市漢族人民和文化的認識和理解，相互理解，是建立民族認同和民族團結的基礎和起點。

其次是此種對口支援也有利于將中國大陸的各省、市間團結成一個整體的、利害共同的統一市場，從而產生更密切的「利益扭帶」和「政治扭帶」：從「利益扭帶」來看，各省、市的對口支援雖然是無償的援助居多，但是責任往往是長期的，所以援助工程的品質優劣各省市之間存在著競賽的心理，於是在援助省、市與自治區之間，就形成一種官僚利益的共同体，同時由於官方的互動就形成一種對民間投資和貿易的鼓勵¹⁹⁷，個人在西藏訪問時在拉薩、日喀則、澤當等地，就接觸過溫州、上海、福州、四川、陝西、山西、甘肅各省、市的漢人在當地經商，他們的利益自然就和西藏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脈動是息息相

¹⁹⁶ 根據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關於“對原未列入受援範圍的西藏 29 個縣，區別不同情況，以不同的方式納入對口支援範圍”的決定，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日前正式確定由天津、吉林、黑龍江、上海、安徽、福建、山東、廣東 8 省市和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等 15 戶中管大型企業對口支援西藏尚未納入對口支援的 29 個縣和雙湖特別區。另外，再次選派 127 名援藏幹部，其中 8 省市選派 97 名，15 戶中管大型企業選派 30 名。對口支援工作開展 7 年來(自 1995 年起)，15 個省市和中央、國家機關 50 多個部委先後選派了三批共 1954 名幹部進藏工作。先後有 259 名省部級領導幹部親自帶隊赴藏考察、指導。各省市、各部委以幹部支援為紐帶，對西藏進行了多渠道、多形式的援助。據統計，到去年上半年，有關省市和中央國家機關無償援建專案 716 個，投入資金 31.6 億元；第三批對口支援幹部進藏後不到 1 年時間，有關省市和部委又確定了 388 個援藏項目，涉及資金總額 30.77 億元。

資料來源：〈西藏所有縣區全部納入對口支援範圍〉，新華網

2002-05-24;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5/24/content_407504.htm

¹⁹⁷ 山東省援藏幹部引導民營企業家來藏投資，在日喀則組建肉聯廠，與內地簽署了長期供銷合同，建廠不到一年，產品已供不應求；福建省援藏幹部，在林芝地區八一鎮引進福建私營企業，投資 6000 萬元建造福建大酒店；廈門市援藏幹部利用各種渠道，為米林縣招商引資，成功簽署投資合作協定 7000 多萬元。堆龍德慶縣援藏幹部引進 17 家企業，其中犛牛骨粉加工一個項目，年產值預計可達 6 億元。現在招商引資專案和企業合作，正在成為繼援藏專案後的西藏經濟發展和促進縣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資料來源：同註 32。

關的。這就促使他的更注意的西藏地區的發展之路；從「政治扭帶」來看，西藏的政治和政局的穩定和變化，由於利益扭帶所產生的相關性自然也成為援助省、市的漢人，至少是部份漢人所關心的議題，總之，在對口支援政策下大性各省、市與西藏自治區之間，漢族與藏族之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關係，這是不爭的事實。

其三是心理和地理距離的縮小，達賴流亡組織也認為中國政府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在西藏推行所謂發展與建設政策，其真實的目的是把西藏完全納入中國的經濟體系中，從而使西藏與中國其他省份之間沒有區別¹⁹⁸。以示漢族人遠藏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不但風土人情、文化宗教的陌生，特別是對「高原症」的恐懼，對密宗的無知和恐懼，當然特別是交通的障礙，都使得漢人進藏是一件大事，在中共中央發動了多次援藏工作之後，漢藏之間的心理和地理距離，明顯地縮小許多，舉例來看在大陸的每年三大長假，已經就出現漢人選擇西藏作為旅遊的選項，而且我們不論何時到西藏各地，也都會遇到不少大陸各省、市的遊客，2002年，西藏自治區接待國內外遊客85萬人次，旅遊收入達9.7億元，比上年分別增長24%和29%¹⁹⁹。這也說明了藏、漢之間距離的縮減，這都是以往難以想像的事，總之，對口支援政策實施以來，不但改變了西藏的風貌，而且大大地改變了以往的藏、漢關係，這是值得注意的變化。

三、戰略價值之調整：

中共學者認為「西藏是保障我國國防安全的重要屏障，有著廣闊的邊境線，而從藏區和藏傳佛教所影響的範圍來看，更是要涵蓋我國2/3以上的邊境長度。基于西藏對國家安全所負擔的上述關鍵意義，西藏的發展不能從單純的區域經濟自身發展來考慮，而必須放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定位和建構。在西部大開發

¹⁹⁸ 〈從民主改革到與中國經濟一體化的過程〉，西藏之頁/文獻與檔案庫，資料來源：<http://www.xizang-zhiye.org/b5/arch/books/duizang/dui3.html>

¹⁹⁹ 〈西藏自治區最新情況介紹〉；<http://www.chinaconsulatesf.org/chn/zhuanti/xz/t56275.htm>

中，西藏應作為一個特殊的區域單獨研究²⁰⁰。」但是一個貧困而落後的西藏對中共而言就是一種安全上的負擔，但一個接近小康的西藏則中共和週邊的國家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第一、西藏是中國大陸最貧窮的地區之一，而西藏的貧窮又和其他省份的貧窮又不相同，其他的省份的貧窮主要的原因在於地理區位、氣候原因、地質資源等自然的因素居多，而西藏則另有更重要的因素是宗教信仰和人文價值的原因。加西藏絕大部份是處在高寒地區，生長期很短，因此，長期以來西藏的經濟無法自給自足，必須依賴中央財政的無償補貼，一般稱之為「輸血型經濟」，因此，在西藏的「西部大開發」其中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將日前「輸血型經濟」逐步轉變成為「造血型經濟」，一旦西藏經濟能夠轉型成功，則代表全中國的經濟都上了一個台階，那麼屆時中國的國力就不是印度所能匹敵的，特別是屆時的中國如果仍然是大力支持巴基斯坦，則印度非但不能與中國對抗甚至無法稱霸南亞，這就絕非印度所願。對西藏週邊的國家而言，西藏的發展轉型代表了佛教文化和現代化經濟的成功結合，這應該是繼儒家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結合之後的又一個大的文化脈動，是以，對附近的佛教文化的國家將不可避免地產生重大的影響。這樣的結果將使中國在南亞地區也必然扮演一定的角色，代表了一定影響力。因此，中印雙方都開始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盡快建立起雙方的關係，以便增加彼此的理解和互信，為未來關係注入健康的因素。印度學者梅拉·辛哈在接受訪問時曾表示：「中國與印度都在 21 世紀面臨了新的問題，比如恐怖主義、世界新秩序等等。此外，我們也會在商業貿易、金融銀行等很多方面展開合作。那樣中國人與印度人也會互相瞭解更多，就不再是陌生了²⁰¹。」又說：「我必須通過你們向中國公眾澄清這種看法。印度沒有興趣在西藏問題上給中國製造麻煩。中國與印度的經濟都在建設中，我們需要加強邊

²⁰⁰ 杜平、石培華等編，〈西土取金—西部大開發的政策背景與機遇〉，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0，頁 353-354。

²⁰¹ 〈連線新德里智囊：印度主流並不把中國當敵手〉，中國新聞週刊總第 136 期，2003 年 6 月 23 日；資料來源：<http://www.chinanewsweek.com.cn/2003-06-26/1/1690.html>

境貿易的發展。我要強烈爭辯說，我們需要開發西藏的水資源與喜馬拉雅地區的資源以尋求共同發展，包括喜馬拉雅周圍國家比如尼泊爾等等，當然還有中國、印度。我希望表達得很清楚，這裏面是沒有任何傷害的。我相信大部分印度人都相信沒有把中國看作威脅，這也是印度政府的立場²⁰²。」

第二、中國的西部大開發不論未來的成長究竟如何都代表一種無可避免的趨勢，那就是中國的能源消耗將大幅而且快速增加，因此我們注意到中共去(2004)年一整年的外交努力，重點都在確保和保障其能源的供應不會發生短缺或不足，最新的看法是中共在爭取俄羅斯西伯利亞油管的安大線²⁰³失敗之後，便全力確保中亞哈薩克的採油權和海上運油安全，前者據中東經濟調查(Middle East Economy Survey)報告稱:2004年5月中共和哈薩克重新簽署建造連貫兩國的輸油管大型開發計畫，由大陸國有的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向哈薩克投資95億美元，從哈薩克延伸到新疆省獨山子石化公司，預計每年可輸送1千萬噸原油，價值約7~8.5億美元。除石油管道專案外，哈薩克也對鋪設通向中國大陸的天然氣管道專案進行研究²⁰⁴。另外蒙古共和國也邀請中共聯合開發境內的石油資源²⁰⁵；至於後者，以往相關的信息有過報導如下:中國大陸的石油進口主要依賴海上，其中進口總量7成的石油都是透過麻六甲海峽運輸。目前麻六甲海峽為新、馬、印尼3國共管，2004年4月美國透露將在麻六甲駐軍以防止恐怖攻擊，大陸學術界質疑美國其實是在搶佔這塊戰略要地，並以「麻六甲之痛」形容中共在此問題上的困境。為走出「麻六甲困局」，中共能源機構曾提出3個解決方案:建立泰國南部沿海的「海陸聯運陸橋」、建立「泛亞洲石油大陸橋」及開鑿「克拉地峽運河」。據悉，開鑿「克拉地峽運河」的方案目前已在審議中。中共並積極規劃鋪設油管，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泰國等4國的油管

²⁰² 同註45。

²⁰³ 安大線是指由安加斯到大慶。

²⁰⁴ 鄭偉靜主稿，〈近期中共能源外交與策略〉，《大陸工作委員會·大陸工作簡報》2004-09-08，資料來源:<http://www.future-china.org/fcn/ideas/fcs20040908-1.htm>

²⁰⁵ 資料來源:香港商報2004年7月22日。

路線，由於牽涉能源戰略、經濟效益及與鄰國互動關係，目前仍在審慎評估中²⁰⁶。而最近的報導更進一步指出根據「華盛頓時報」獨家取得的美國防部題為「亞洲的能源未來」報告指出，中共正採取「珍珠鏈」方式，從地中海到南中國海以設立軍事基地或投射軍力方式，確保石油運輸通道不受威脅。報告說，此舉危及在公海航行的各國船隻，而由於美中之間存在「台灣問題」，一旦衝突爆發，勢必對美國海軍構成威脅，報告說，中共相信一旦「台灣問題」衝突爆發，美軍將打斷中國大陸能源供應。該報告是由美國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主導，該單位負責為國防部長倫斯斐研究長期戰略趨勢。「華時」取得報告的複印本。根據報告，中共的相關部署如下²⁰⁷：

(一)瓜達爾：中共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建造新的海軍基地，並在該處設立電子監聽站，瓜達爾港位在巴國西南端最接近波斯灣之處，可監視從赫姆茲海峽到阿拉伯海之間的船行航行動態。

(二)安格達旭：中共在孟加拉的吉大港建立貨櫃港，並加強和孟加拉海事關係及商業關係。

(三)烏瑪：中共與仰光軍事政權發展密切關係，把緬甸當成中共接近麻六甲海峽的一處「衛星國」，中國大陸八成的石油船運進口需行經麻六甲海峽。

(四)柬埔寨：2003年11月，中共與柬國簽署軍事協議，柬國並協助北京興建連接中國西南方至柬國海港的鐵路。

(五)南中國海：中共在南中國海積極加強軍力，以期能夠從內地大陸與海南島投射海、空軍力。中共最近翻修了在Woody島的機場並且加強了探油平台裝備及海洋調查船。

(六)泰國：中共考慮資助在克拉地峽建運河，運河預計需要兩百億美元。有了運河後，船隻就不必再經過麻六甲海峽。

²⁰⁶ 同註 48。

²⁰⁷ 〈中共建「珍珠鏈」確保油源〉，中國時報大陸新聞中心 2005-01-19，資料來源：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5011900089,00.htm>
!

美國官方甚至指出以中共和印度為首的亞洲新興國家進一步朝著工業化方向發展，再加上當地汽車數量日益增加，這兩個因素使得未來二十年的能源需求大幅增長；亞洲將超過北美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區，今後廿年內全球石油需求增長的 80%將來自亞洲。同時孟加拉、緬甸、澳洲和印度等新天然氣出產地也正在興起，如此使得亞太各國之間形成了一個新的、建立在能源基礎上的同盟夥伴關係，如中共與澳洲、韓國，印度與孟加拉、緬甸，日本與俄羅斯，伊朗與巴基斯坦和印度，還有土耳其與俄羅斯以及以色列等潛在的能源戰略夥伴關係²⁰⁸。從此一戰略形勢來看西部大開發的成功，不論對中共陸上或海上的能源保障都是極有利保證，因此，中共必然全力協助西藏完成其小康的計劃，以便確保中共經濟發展和小康計劃的實現。

第三、毫無疑問地站在中共的立場：他們十分相信在藏胞中之所以西藏獨立的主張仍有市場，主要是由於藏胞的宗教信仰和經濟落後所致，在「迷信」宗教的問題根源於教育不普及和科學知識的欠缺，所以中共在宣傳的政績時對西藏教育的普及率、鞏固率和提高率就十分重視，在中共所發表的「西藏文化發展」的白皮書中就提到：

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以來，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一直把發展人民教育事業，提高藏民族整體科學文化素質作為一個重要任務。為依法保障人民的受教育權利，西藏自治區於 1994 年頒佈實施了《西藏自治區義務教育辦法》和《西藏自治區義務教育規劃》，同時在資金投入上對教育實行傾斜政策，明確規定自治區年度財政預算和年度基本建設投資計畫中教育部分所占的比例均要達到 17%。1990~1995 年，自治區地方預算內教育事業費累計投入 10.3 億元。目前，西藏已初步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教育體系，教職員工已達到 22279 人，其中專職教師 19276 人，以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師資占 80%以上。西藏的教育事業發展迅

²⁰⁸ 〈確保能源運輸 中共將沿中東至南海建戰略防線〉，中國時報大陸新聞中心 2005-01-23，資料來源：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5012300064,00.html>

速。據統計，目前西藏已擁有中學 101 所，小學 820 所，教學點 3033 個，中小學在校生 354644 人，其中區內初中在校生 34756 人，普通高中在校生 9451 人。西藏的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 83.4%，實現了在牧區普及三年義務教育、農區普及六年義務教育、主要城鎮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同時，建立了 16 所中等專業學校，在區內外學習的中等專業學校學生達到 8161 人。隨著成人教育的發展，西藏的青壯年文盲率由 1951 年前的 95% 下降到 1999 年的 42%。高等教育發展很快，先後創辦了西藏民族學院、西藏農牧學院、西藏大學、西藏藏醫學院 4 所高等院校，現有在校學生共計 5249 人。幾十年來，西藏已培養大學畢業生 2 萬餘人，中專畢業生 2.3 萬餘人，有了一批藏族博士、碩士，並已擁有一大批藏族科學家、工程師、教授、名醫、文學藝術家等專業人才²⁰⁹。至於經濟落後的部份當然就依賴經濟現代化來改善，有不少的學者會認為中共對藏胞，特別是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的成員追求獨立的真正需求理解錯誤，然而，從中共治理西藏的角度來看，則可能展現出不大相同的圖像：首先是在中共的政策作為下，藏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準確實出現很大的變化，以個人在西藏地區實地的見聞來看，應該說藏民內心深處信仰或許尚未完全消失，但是十分明顯地事實是藏民已經不是以往那種處處依賴宗教，事事依靠喇嘛，例如，個人在西藏地區參訪過程中，常常遇見藏胞在餐廳辦婚禮，喜宴中沒有喇嘛，沒有宗教儀式，完完全是現代的婚禮，又如，個人在藏區的商店中看到有人販賣泥塑頌經小尊喇嘛像，姿態各異，栩栩如生，神態莊嚴，唯妙唯肖，原本以為只是藏民家中的小擺飾，詢問之下才知道是藏民買回家中供奉或收藏，以便家中出現重要大事時，用以取代聘請喇嘛前來家中誦經、作法之用，足見藏民信仰的現代化模式，已經隨著現代化的生活變遷而出現變遷，這種隨著現代化而出現自然同化現象，必然隨著時間而深化，反之，原來的信仰則隨著時間而淡化。同此，改善藏胞生活的努力肯定是有意義地有影響的政策。

²⁰⁹ 〈西藏文化的發展〉，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0 年 6 月；資料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4/content_630034.htm

其次經濟生活的改善縱使不能消除民族獨立的根源，但至少可以暫時軟化追求獨立的激進行動，進而可以分化主張獨立團體，減少追求獨立人口，弱化鼓吹獨立的正當性，總比不事生活改善、經濟發展的統治要好得多，何況，對比達賴喇嘛的流亡組織所統治的藏民而言，當前「西藏自治區」的藏胞生活顯然要優渥許多²¹⁰，當然是中共可以大肆宣傳的政績，假如中共治藏五十餘年，如果藏區的藏民連生活水準，都比不上流亡在印度的藏人，那麼中共的治藏還有任何正當性可言嗎？

其三中共在反藏獨的作為上，當然也不是只有經濟和教育兩種手段而已，其他還有更多的懷柔的和霹靂的手段，恩威並用，剛柔並濟，以收實效。因此，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中共都不可能放棄在西藏進行經濟發展，進行現代化的建設的努力。如果我們再從本章上一節所分析的中、印關係的角度來看，西藏大開發的陸續完成有助于中、印關係的改善，而中、印關係的改善又有助于中共反藏獨的成功。只要中共反藏的成效，日益明顯，中共未來在中亞和南亞的戰略地位，也必然日趨重要。

²¹⁰ 參閱翁仕杰，〈南印度西藏流亡社會發展現況及其困境——以農業生產和醫療照護為主的探討〉，蒙藏現況雙月報第十三卷第六期，民國93年11月，頁1~17。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中共開發西藏地區從以往強迫性的政治制度變遷，而到其後的經濟變遷，對藏人的社會衝擊自然是十分巨大的外力，對藏人長期與世隔絕的生活習性和獨立封閉的文化系統而言，確實是十分嚴肅的挑戰，而對此種挑戰凡是原來既得利益被剝奪的階級自然是全力反抗，而對於依靠新政權而起家的新興階級，會全力贊成新措施，以致反對舊階級，阻止中共當局與海外藏人的接觸聯繫，以免失去權力這也是十分常見的事。是以我們在分析、理解和評價西藏現況，以及藏人對當前中共的治藏政策的效果時不應只以中共文件或是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文件為主，尤其不應以某些民運人士的部份言論來理解藏人地區現代化的發展，而應以衝突文件對話的方式，特別再以實地觀察的確實方法，便對其現代化可以有一個屬研究者自己的評價。

二、對藏區現代化成果的優劣，只有藏區生活的藏胞才是最有資格去評價的。因此在研究中有必要創造機會與藏人直接交付、直接了解，這是最佳的方法可以感受到社會變遷之外，個人的複雜心態當我們問在西藏的藏胞對今日的拉薩和日喀則，澤當、那曲等城市的變化感覺如何，大概我們得到的回應以正面居多，然而涉及個人生活變化時，則有褒有貶，評價不一。總的而言，生活有改善，個人也有在快速變遷中的不適應，所以對個人有利有弊。然而我們比較聽到對藏族文化失落的憂慮，對藏族而言生活在藏區沒有文化失去的問題，因為對老人而言，他們在羅布林卡(達賴喇嘛的夏宮)仍然可以看藏戲，聽藏歌，平日去寺、院、宮朝拜也沒有困難，雪頓節的典禮，浴佛節的熱鬧也依舊，對年輕人而言，他們關心的是個人的前途、財富的問題，所以宗教的調適、文化

的變遷都不是藏區人民最直接關心的議題，而是知識份子尤其是受了現代化教育的知識份子反而有所憂慮，生態環境的問題也是如此，一般的藏胞未必覺悟到自己的行為是建設或是破壞了藏區的環境，這就是真實的西藏。當我們進入西藏，我們就會發現治理者所面對的現況和知識份子所討論的社會是有距離的結果。我們不願意與社會真誠的對話，我們就不會有自己的心得和收穫，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創見。

三、我們從事藏區的研究必須一方面進入藏區，一方面也傾聽達賴喇嘛的說法，學習他的智慧來處理自己的問題。多年以來，我們看到達賴喇嘛無私地為藏民、藏區、藏文化的奉獻、奔走和努力，這件事本身就是令人感動的，對達賴喇嘛而言，他可以說已經到了是不忤不求、隨心所欲的境界。但是仍然與時俱進、心平氣和、豁然達觀地為西藏的未來來奮鬥，其堅定的意志和靈活的手法都是台灣跨足國際的樣板。但是我們也必須檢討以往在政治上自毀憲法，巴結達賴喇嘛的做法所帶來的負面結果，在政治上台灣必須有為有守、有堅持才能有彈性。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呈現自己的價值。

四、中共政權與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互動過程中，中共對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作為的批判從來沒有停止，反之，達賴喇嘛流亡組織對中共政權的治藏政策也從未停止攻擊，雙方在近三年中一直是處於各作各的努力，同時又處在相互攻擊和相互會見的情況下，外人看來有些困惑，然而事實上這就是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自立性、獨立性的展現。從長時間來看，雙方都在鬥爭中認識對方，又在新認識的基礎上改變其鬥爭的策略，特別在每年三月達賴喇嘛的演講中可以得到證實，是以分析中共在大張其鼓宣傳和實踐西藏大開發之際，同時分析中共與達賴喇嘛私人代表的會見和互動，既可以檢證三年來中共治藏和開發藏區的真正績效，又可以借鏡雙方互動的策略作為我方與中共交手的參考。

第二節 宗教經濟之必要性

一、傳統民族政策學理基礎：

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主要的依據：在理論上是以馬列主義的民族理論為主，在心態上是以中國傳統的夷、夏之辨作基礎，在作為上則是仿效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東方的翻版。而上述的三套學理各有自己的內容有些可以相容，有的則相互矛盾，從而注定了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雖有其可取之處，也有其窒礙難行之處：

政策根源	主要學理	軟政策	硬政策
馬列主義的理論	唯物史觀	社會主義改造	統戰、鬥爭
中國傳統觀點	文化差異論	朝貢體制	剿撫兩手
西方帝國主義	國家統治論	現代化改造	武力征服

以上的三種學理必然導出三種民族政策所追求的目標：普世價值、平等價值、進步價值。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中國傳統的文化差異以及西方近代政治學的國家論，三種理論思考均帶有強烈的「天下皆然」的普世心態，因而自然而然也這些統治階層都會從此一立場去理解其境內外的不同民族，由於其他民族和自己民族不同(即特殊性)所以民族政策的首要目標就是確立我民族的看法、價值的普世性。而在上述前題下其民族政策就是「化異為同」，因而在手段上有硬有軟，在內容上有政治、經濟、社會等政策來改造對方。一旦對方不願領情，則必然繼之以各種手段，恩威並用，利、力並施，以收全功。然而此三種目標價值的確立，又必須立足在承認民族間的特殊性、落差性和可改造性的基礎上。這就使得各國的民族政策之間不得不存在著強烈的矛盾和衝突，特別是近數十年世界的後現代思想潮流的影響，使得世人們更加注意到「差異」存在的必要性、珍貴性，因而對各國在思考其民族政策時，不得不適度修正原本

的觀點和政策，增加了更多的包容和保留，但是這是否就是最適切的作法呢？仍有進一步分析的必要。

二、後現代民族政策思考：

所謂「後現代」簡單說就是不再相信「現代」觀點建立的一切準則：科學的判準如理性、客觀、進步、通則；中心主義的主張如，秩序、等第、格局等，主張多中心、存差異、好游牧、擅漂泊、去方法。將這些想法用之於民族之間來思考時，對傳統的民族觀自然產生很大的批判，例如石之瑜教授就說：中共黨國體制下的官員與大陸學術界看待少數民族時，均以反映其身份的三種角度切入，即現代化、國家主義及全球化。現代化角度的觀察基礎是線性史觀，關注某一社群目前處於歷史的哪一階段，以及要進入下一階段的條件為何？研究者總是站在歷史的終點看那些還在掙扎的落後社群，如何往自己經驗與預設的現代化方向走來。國家主義角度的少數民族政策，強調政治體制的安定、民族的團結及公民素質的提昇，亦即不容許少數民族身份的消失，但也迴避民族身份的特殊內涵。現代化與國家主義角度的終極目標的均是將少數民族融入主流民族。從全球化角度看待少數民族，主要在於維繫民族疆界與保護民族特色，前者可以突顯少數民族「被代表」的地位與需要，後者則可通過主流文化的翻譯後成為吸引消費的號召²¹¹。個人十分同意石教授的批判，然而這裡還是會遭遇兩大問題：一是目前幾乎是所有的少數民族都已經被深深地「現代化」觀念所「異化」，他們身為少數民族而所追求的確是現代化的一整套觀念、價值和生活方式，他們之中並不乏有識之士，然而大家都生活在強大的、無所不在的現代性生活世界包圍之中，是以討論時候的慷慨激昂，遠遠比不上週遭的「實在」影響，所以常常形成一種矛盾的反差或行動的落差。二是我們這些已經在享受「現代化」，而且還在繼續以「現代化」生活來加重生態負荷的民族，有何資格和立場要求那些少數民族去「享受」我們「教導」的後現代的生活，縱使是我們甘

²¹¹ 請參閱石之瑜，〈「十六大」後的民族觀〉，政策專題研究《政策報告 No.920001》，中華歐亞基金會，民國92年2月12日，頁1。

願放棄「現代化」自願「游牧、漂泊」，他們也還是有質疑，我們這些已經享受過「現代化」生活的民族有何權利要求他們不能享受一回「現代化」呢？是以除非我們可以提出一套調和的路徑，否則一切的檢討都不存在正當性，如同西方學者、達賴喇嘛流亡組織對中共治藏政策的部份批判，就是如此，是以本人在研究中提出「宗教經濟」的概念，就是為了彌補上述的矛盾。

三、宗教經濟之構想：

「宗教經濟」是全社會經濟的一個次經濟系統，也是全社會經濟的一環，具有經濟學理所講的一切特性，不過相對而言，「宗教經濟」應具有自己的特點：即以宗教為對象的一切經濟行為，一般而言包括了傳教經濟、寺廟經濟到經營宗教三個階段，在傳教經濟時期，是屬於一般商品經濟的廣告時期，先行投入資金、人力和技術，吾人可以視為傳教成本，此時的投入是為了在當他發現和創造出宗教需求，而且由於宗教本身的特性，因此該「需求」一旦開發成功它就形成「排它性」，這是沒有其它「商品」可以替代的，於是其中的「供、需關係」就是一種相對封閉的系統，甚至是一個長時期的封閉的系統；在寺廟經濟時期，基本上就形成一種以宗教場所為中心的經濟時期，此一時期開始形成一定經濟規模，此時的宗教與信徒之間，形成複雜的、多元的經濟關係，宗教一方面提供了信徒精神和心理的需求，同時也還提供物質的需求，反之，信徒也必須付出「信教成本」和「信仰成本」，初步可以將「信教成本」定義為：信徒為其固定的宗教場所所付出的有形和無形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質的成本；至於「信仰成本」則是指信徒因其信仰所產生，在其固定宗教場所以外的付出成本，綜合而言，包括了宗教活動、宗教節目、和宗教觀光等圍繞宗教場所、宗教場合所產生的各種消費行為，都可以稱之為寺廟經濟，也因為寺廟經濟有了信教和信仰成本的供給，因此，也就促成了具有規模性的宗教經濟；到了宗教經濟時期，其經濟活動的範圍也大大地擴增，它不僅僅可以涵蓋上述的寺廟經濟，而有能力發展新的傳教經濟，在此一時期的活動就包括宗教學校、宗教醫院、宗教書局、宗教媒體、宗教公司等全面性的經濟活動。

我們將此一概念引入西藏地區的發展和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就有可能將西藏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從目前政府推動轉而成為藏傳佛教自身的需要，則藏教自身也必需開始研究新的教義，以便在宗教教義上，重新發現藏佛教在世俗

上必要的經濟基礎，取得藏傳佛教和西藏經濟之間的互補性，結果就能使二者均得到相互辯證地發展。而西藏的經濟發展就真正找回藏胞在因應現代化時，特有的自信，又能按藏胞的自然需要與時俱進地保留自己民族的特色，實現現代化與後現代化的結合與超越。

第三節 建議事項

一、鼓勵台灣之藏學研究，並優先補助赴藏地區的田野研究，始得真正培養對西藏議題具有深度理解的學者，不受中共資訊之左右亦不媚於達賴喇嘛的魅力，而任其擺佈。

二、台灣的宗教經濟具有一切的規模和成就，此一經驗績累的過程具有一定的示範作用，理應加以學理的綜整，之後可以透過宗教交流、學術交流、經濟交流等途徑，提供藏佛教參考。

三、在民族政策方面，中共的「民族自治區」理論上可以而且也必須提供少數民族自主的空間，然而中共基於漢族沙文主義的心態對少數民族採用了西方殖民主義政策，使得中國大陸境內的少數民族不但未能自主、自治，而且不能自保，這是我們實行民族政策必須借鏡和警惕的地方。

四、有關處理達賴喇嘛流亡組織和中共政權之間的事，吾人理應批判性地吸收以往的作法，保留以往有利於己的政策和策略，何謂有利，則需檢討在以往過度遷就達賴喇嘛的政策下，究竟我們獲得的真正利益為何。反之，達賴喇嘛及其流亡組織又從台灣獲得多少利益，雙方的成本效益都是可以客觀評論，從教訓中績累經驗，糾正偏差才能在中共政權與達賴喇嘛流亡組織的互動中，爭回台灣的自主性。

參考書目

A、中文書目

1. 〈進軍西部：高層領導談西部大開發〉，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1。
2. 〈當代藏學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蒙藏委員會，2003。
3. 〈達賴特使稱中國之行取得突破百分百〉，多維新聞社，2002.9.30。
4. 中央文獻編輯組編，〈進軍西部—高層領導談西部大開發〉，十五年以來重大問題幹部文獻第二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5. 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編，〈走進西部—西部大開發與西南民族研究〉，貴州民族出版社，2001。
6. 丹增、張向明主編，〈當代中國的西藏(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7. 王天津 等著，〈西部開發與西藏的可持續發展〉，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
8. 王維芳，〈中共內地援藏工程簡析〉，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第10卷第1期，民國90年1月。
9. 王戰英，〈淺論我國西部大開發與民族問題的關係〉，《徐州教育學院學報》，徐州：徐州教育學院，2000.04。
10. 石之瑜，〈「十六大」後的民族觀〉，政策專題研究《政策報告 No. 920001》，中華歐亞基金會，民國92年2月12日。
11. 多吉占堆，〈四十三項工程惠澤今日高原〉，《中國西藏》1995年第1期。
12. 安七一主編，〈中國西部概覽—西藏〉，民族出版社，2000。
13. 朱昕昌，《中國週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14. 吳紫辰，〈中國外交思想的演變：從「和平共處」到「和平發展」〉，《中國外交》2002.09。
15. 宋國誠主編，〈21世紀中國西部大開發(卷一)〉，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2。
16. 李廷玉，《游蒙日記》，列《清末蒙古史地資料匯萃》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出版，1990.01。

17. 李瑞環，〈振奮精神，乘勢而上，扎實援藏〉，《西藏六十二項援建工程》，北京：中國藏學，199年。
18. 杜平、石培華，〈西土取金—西部大開發的政策背景與商業機遇〉，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0。
19. 杜平等著，〈西部大開發戰略決策若干問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20. 沈函剛，〈政策學〉，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年。
21. 周興維著，〈戰略重心的西移〉，民族出版社，2001。
22. 帕塞裏尼，〈大眾記憶中的法西斯主義：都靈工人階級的文化經歷〉(Luisa Passerlin, *Fa-scism in Popular Memory: the 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Turin Working Class*)，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23. 林照真，《喇嘛殺人》，台北：聯合文學出版有限公司，1999〈民88〉。
24. 林聰，〈著力提高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幹部隊伍的素質〉，《學術論壇》，南寧，2000.06。
25. 祁若雄，〈五十年代中國共產黨處理新疆少數民族宗教問題的方針與實踐〉，《中共黨史研究》，北京：中共黨史研究中心，2000.06。
26. 香港商報2004年7月22日。
27. 徐亞非、溫寧軍、楊先明，〈民族宗教經濟透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
28. 徐明旭，〈陰謀與虔誠〉，香港：明鏡出版社，1999年。
29. 翁仕杰，〈南印度西藏流亡社會發展現況及其困境—以農業生產和醫療照護為主的探討〉，蒙藏現況雙月報第十三卷第六期，民國93年11月。
30. 郝文明 主編，《中國週邊國家民族狀況與政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31. 馬岳勇，〈西部大開發及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發展關鍵在人〉，《新疆師範大學學報》，新疆：新疆師範大學，2000.04。
32. 馬俊毅，〈論鄧小平民族理論與西部大開發中的民族問題〉，《民族問題研究》(月刊)2001.01，第一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01.01。
33. 崔成男等，〈西部大開發—解決民族關係深層問題的有效途徑〉，《民族問題研究》(月刊)2001.02，第二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01.02。
34. 張玉忠，〈在西部大開發的新形勢下進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中國統一戰線》，北京：中國統一戰線雜誌社，2000.12。

35. 張聖岱，〈放棄獨立換取真正自治〉，聯合報，民國 92 年 8 月 2 日。
36. 曹陽，〈大西北開發與西藏〉，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第十卷第六期，民國 90 年 11 月。
37. 陳又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新政之研究〉，政大碩士論文，民 70 年 6 月
38. 陳耀，《西部大戰略與新思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
39. 傅桃生 編著，《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思考》，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0。
40. 博迪蘇，《朔漠紀程》，列《清末蒙古史地資料匯萃》，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製中心出版，1990.01。
41. 程瑞聲，〈論新世紀的中印(度)關係〉，《中國外交》2002.04，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42. 黃國雄、李穎，〈西部開發與新形勢下的民族統戰工作〉，《民族問題研究》(月刊)2001.01，第一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01.01。
43. 黃速建等主編，《西部大開發與東中部地區發展》，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01。
44. 楊長春著，〈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
45. 楊淑媛，〈民族文化與西部開發〉，《貴州師範大學學報》，貴州：貴州師範大學，2000.04。
46. 楊開煌著，〈札西德勒—中共，達賴喇嘛與台灣〉，海峽交流出版社，2003。
47. 虞寶棠、李學昌，《當代中國四十年紀事(1949-198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8. 賈東海，〈西部大開發的內涵與民族工作的重點〉，《民族問題研究》(月刊)2001.01，第一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01.01。
49. 賈國富，〈我國西部開發中參與國際分工的戰略思考〉，《民族問題研究》(月刊)2001.03，第三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01.03。
50. 靳薇，〈援藏項目效益調查報告〉，《中國藏學》，2000 年第 3 期。
51. 廖東凡，〈六十二項援藏工程始末〉，《西藏六十二項援藏工程》。
52. 廖揚、修臣，〈論西部大開發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完善〉，《民族問題研究》(月刊)2001.02，第二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01.02。
53. 趙干城，〈論中印關係在中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中國外交》2003.02，

-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54. 趙貞、徐紅雲，〈我區公安邊防官兵學藏語、用藏語促部隊建設〉，西藏日報第五版，2004年8月9日。
 55. 劉江海，〈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民族因素的思考與對策研究〉，《民族問題研究》（月刊）2001.03，第三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2001.03。
 56. 鄭長德，〈論西部民族地區的大開發〉，《西南民族學院學報》，成都：西南民族學院，2000.11。
 57. 穆赤·云登嘉措，〈藏傳佛教信眾宗教經濟負擔的歷史與現狀〉，西藏研究2002年第1期。
 58. 蕭萬源、任伍雄編，阿不都秀庫爾，〈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史〉，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9. 羅援，〈世紀回顧與前瞻：2002版戰略評估〉，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
 60. 譚·戈倫夫著，伍昆明、王寶玉譯，〈現代西藏的誕生〉，中國藏學出版社，1987年初版，1990年中譯本出版。

B、英文書目

1. Tom Grunfel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NY: M.E. Sharpe, 1996。
2. Ardley, Jane (1999a) 'Resistance, Religion and Politics: the Tibe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Keele University: unpublished Ph.D. thesis
——(1999b) 'From theocracy to democracy? Modernising the Tibetan polity', paper given at the 1999 PSA Politics and Religion Group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3. Conner, Victoria and Robert Barnett (1997) *Leaders in Tibet: A Directory*, London: HarperCollins
4. The Dalai Lama (1962) *My Land and My People: Memoirs of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New York: Potala Corporation
5. Gyaltzen, Kelsang (1997) 'The Middle-Way Approach' in *Tibetan Bulletin* 1 (2)(July-August 1997)pp.14-16

C、網站資料來源

1. 〈西藏開發統一政策即將出爐〉, www.fTimes.com.tw 2000. 11. 24。
2. 西藏之頁<http://www.xizang-zhiye.org/>
3. 中國西藏信息中心<http://www.tibetinform.com/>
4.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
5. 學習時報<http://www.studytimes.com.cn/>
6. 中國西藏新聞網 <http://www.chinatibetnews.com/GB/index.html>
7.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22/content_638035.htm
8. 學說連線<http://www.xslx.com/>
9. 人民網 <http://www.xslx.com/>
10. <http://www.rediff.com/money/2003/jun/26pmchina1.htm>
11. <http://www.rediff.com/money/2003/jun/27priya.htm>
12. <http://in.news.yahoo.com/030628/43/25i1i.html>
13. 遠景基金會<http://www.future-china.org>

附錄一：2004 年赴藏區參訪見聞

一、時 間：2004 年 8 月 5 日~8 月 19 日

二、參訪人：楊開煌教授/東華大學公行所教授兼大陸研究中心主任

馬彥彬副教授/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

三、地 點：西寧、青藏公路、拉薩、日喀則、江孜、澤當

四、參訪紀要：

1999 年 6 月江澤民在西安提出「西部大開發」的國家戰略以來，三年多來(引用者按至 2003 年止)，中共陸續安排了一大批重大開發專案。建設項目大體可分為三大類：

- (1) 立足西部、全國受益的項目。
- (2) 改善西部基礎設施狀況的建設項目。
- (3) 提高西部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項目。

據統計，2000~2003 年三年間，西部共投入國債資金 1600 億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 6000 多億元，專家預測，預計五年內將達到 1 萬億元。與此同時，國家在扶貧解困、財政轉移支付、稅收返還等方面向西部傾斜。由於投資的大幅度增加，西部地區 GDP 增長連年加速。2000 年增長 8.5%，2001 年增長 8.7%，2002 年增長 9.9%，四川達到 10.6%，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²¹²。因此西部大開發的計劃，確實是對中國大陸擴大的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拉力，中共在西部大開發中投資建設的五大標誌工程更是中共，企圖改變西部落後面貌的重中之重，此五大工程為生態環境建設：

1. 包括天然林禁伐、退耕還林還草、防沙治沙、天然草原恢復等，是為防

²¹² 林凌 劉世慶，〈審視西部大開發〉，2003 年 12 月 11 日；

資料來源：<http://www.xslx.com/htm/jjlc/hgjj/2003-12-11-15654.htm>

治長江洪澇、黃河斷流、北方地區沙塵暴的主要舉措，也是為了進行全國性的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工程。

2. 西氣東輸:主要是把新疆、陝甘寧、青海、重慶、四川的天然氣輸往中部和東部，為這些地區提供民用、發電、化工原料的氣源。

3. 西電東送:主要是開發廣西、雲南、貴州、四川、黃河上游的水電和陝西、山西、內蒙古的坑口煤電的輸出工程，以便為大陸的南部、東部、中部、北部各省的更快發展提供清潔、廉價的能源，改善全國的能源結構和治理環境污染。

4. 青藏鐵路:完全建在西部，首先對西藏的開發建設及交通運輸有重要意義；但更為重要的，是為加強全國的民族團結、建設西部邊疆和鞏固國防提供重要保障。

5. 南水北調:更是關係全國大局的工程。工程的西線涉及雅礮江、大渡河、通天河等幾條長江上游的重要江河。在這些江河上，既要建設電站、承擔向東部提供電力的任務，又要承擔向黃河輸水、解決西北缺水的責任²¹³。而以藏人生活的地區來看，生態環境和青藏鐵路是最重要的，此次在藏人生活地區實際的造訪，也對生態保護和青藏線的印象最為深刻。

從生態報保護而言:總得印象是官熱民冷，官方的環保政策、法令相對完備，但藏民的環保意識並不到位，此處的官方主要是以青藏地方官員，還有在青藏鐵路線上施工的工程人員，例如以青藏鐵路的路線必須穿越青藏高原，從而有可能阻害到高原野生動物的遷移，因此在築路時，加設了許多旱地橋墩，將鐵路抬高了五、六米高，以便動物可以在橋下自由通行，是以未來的旅客有可能在車廂欣賞到野生犛牛、羚羊壯觀穿越的神奇場面；又如青藏路的車廂設計為全封閉式加壓的車廂，既有舒適清潔的效果，也使得使用的乘客不能將垃圾外擲，除此之外，我們也注意到中共在青藏高原普遍重植防沙林帶，既保水土兼具治沙功能，對藏羚羊的保護，不僅禁獵，在海關嚴守，而且設置專門警力，

²¹³ 同註 1

配合義工，設立廁所、哨站，認真保護等等都很令人感動，然而也就在青藏公路上我們則常常也看到從前車拋出的垃圾，在各中途站的附近以及河邊岸上，更是垃圾滿地，令人不忍猝睹，在河邊向遊人乞討食物的藏童，也同樣在食物用完之後，塑膠袋盒就隨地拋棄，當然大量的垃圾還是來自外地的遊客，有不少的山羊、犛牛就在垃圾邊上覓食，我們不難想像有多少垃圾會進入動物的胃腸之中，對他們構成致命的傷害，在拉薩、日喀則等城市中，也是垃圾處處，因此在生態環保的問題、個人清潔衛生的問題，決不是法令規範或政策寬嚴或官方努力的問題，而是全民意識的問題，生活習性改造的問題，此一工程的浩大，如果不為藏民所認識，則環保的努力有可能付之東流。

從青藏建設而看：這是西藏地區的第一條鐵路，也是標誌著大陸所有省區均能通行鐵路的工程，對大陸、對西藏均是極具意義的工程，而其中最難的工程在於凍土層的施工問題，凍土層的困擾在於冬季土質堅硬無比，可以是很好的路基，一旦夏季冰雪融入土質鬆軟，即成泥淖，牛羊穿過均視為畏途，是在施工一大技術的難題，大陸工程人員除了以鋼板、灌漿等傳統施工方法之外，主要以太陽能極棒導熱深入地下，利用太陽能的調節，以使地下凍土保持常溫，不受外在天氣的影響，以使路基穩定的施工方法來克服此一問題，一旦青藏鐵路的施工完成，有可能成為全球其他地區在建築施工上的一大突破，除此之外，基樁擴張術的施工也大大增強了橋墩基樁的穩定性，這些都是青藏鐵路上的特點，相比之下高原鐵橋，數十米橋墩，則主要只是表現其雄偉和氣勢，真正的技術和技巧，反而是在地下視而不見的地方，這是第一印象，此外青藏鐵路的完成對於輸藏物質上也是一大突破，目前西藏地區不論是民用、軍需的活用品均來自公路，不但費時、危險、不確定因素太高，而且數量有限，價格昂貴，西藏的貨物也無法外送，一旦鐵路通車則運量必將大大提高藏人生活水平與內地人民的拉近，也就可以成為可以期待的目標，因此青藏與內地的一體化也會因為青藏鐵路的完成而縮小了大陸內地的空間、時間的距離，也就有助於縮短青藏與內地心理上、文化上、價值觀念上的距離。同時對中共政權也具有鞏固

西南邊陲，放眼南亞安全等重要戰略意義的重大工程。目前青藏鐵路在格爾木到沱沱河段已經竣工，也在貨運上開始利用，拉薩到那曲段也在趕工之中，那曲到沱沱河段也在施工，預計 2007 年可以完成，不過當地的居民都希望施工的鐵路單位可以趕工，以便儘早完成入藏的運輸大動脈，足見藏人盼路之情。

附錄二：訪問摘要

Q: 西藏人口中有多少外來移民？5 年來有什麼變化？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是什麼？如何保證西藏人也從經濟發展中受益？

A: 現在我給大家兩個數字。第一個數字：西藏有 266 萬人口。這是按照國家人口統計規範性做法得出的數位，包括長期在西藏辦企業、經商、打工，但戶籍不在西藏的人，不包括在外面學習、經商的藏族人。其中，藏族占 92.2%，漢族占 5.9%，其他少數民族占 1.9%。第二個數字：255 萬，是按戶籍所在地統計，戶籍在西藏的人中，藏族占 95% 以上。現在每年西藏新增人口 3 萬左右，年出生率為 18%，死亡率 6%，自然增長率 12%。

應該說隨著經濟的發展，西部大開發進程的推進，外來人口每年都會有所增加。但西藏不存在移民的問題。由於西藏高寒缺氧，條件比較差，中央政府沒有對西藏移民的政策，我剛才講的 5.9% 的漢族人口基本上是到西藏打工、經商、辦企業的，他們的流動性很大。

外來人口到西藏從事經濟活動確實給藏族勞動力帶來就業壓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是很正常的。我們不能完全封閉和排斥。從長遠看，沒有競爭，就不利於藏族勞動力技能的提高和競爭力的增強。為了減輕藏族人的就業壓力，我們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企業雇用當地人超過 30%，可以享受包括稅收方面的很多優惠政策。另外，現在全國各地都在幫助我們培訓藏族勞動力。藏族人經商、打工、辦企業、組織施工隊伍等可以享受許多優惠政策。現在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已經達到 7700 元，在全國也名列前茅。

Q:您能否介紹一下中央西藏工作座談會的情況？胡錦濤主席為西藏的建設做了哪些工作？中央政府和達賴進行的談判有沒有取得進展？

A:中央分別在1980年、1984年、1997年和2001年專門就西藏工作召開了四次座談會。會議是不定期的、根據需要召開的。在我們國家，中央為地方的發展召開專門會議，唯有西藏，說明中央對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視。其中，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是江澤民總書記親自主持的，制定了中央治藏方略，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會議。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決策，並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以實現西藏的快速發展和長治久安，使西藏能夠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

中央明確指出，西藏的發展關係到全國的發展，西藏的穩定關係到全國的穩定，支援了西藏的工作就是支援了全國的大局，絕不能讓西藏分裂出去，也絕不能讓西藏長期處於落後狀態。為此，中央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實踐證明非常正確的政策，同時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確定了分片負責、對口支援的原則。最初是15個省市對口支援西藏的7個地市。目前則是18個省市和15個全國大型企業對口支援西藏，西藏的每一個縣都有對口支援單位。9年來對口支援單位投入的資金已經達到70個億，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

胡錦濤同志來到西藏工作時，分裂分子正在西藏策動騷亂，局勢不穩定。錦濤同志受命于危難之時。他有極高的領導能力和水平，穩健的工作作風，對西藏人民有發自內心的感情。他在西藏工作期間，根據西藏的情況，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大事、三個確保」的治藏方針，至今仍是西藏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方針原則。「一個中心」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件大事」就是發展和穩定；「三個確保」是確保經濟的發展、確保社會政治局勢的穩定、確保西藏人民的生活儘快得到改善。西藏由此實現了由亂到治，由治到變。因此，西藏最好的歷史時期就是從他到西藏工作之後開始的。西藏人民對他的工作非常滿意，給予極高評價。

關於達賴問題，各位都很清楚。中央對達賴的政策是非常明確的、公開的、

一貫的。正如小平同志講的，關鍵是要愛國。達賴要回來，也只能作為中國公民回來，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在這個原則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放棄、兩個承認」，即達賴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從事一切分裂活動；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以此來體現他的愛國。中央政府一直沒有關閉與達賴商談的大門。1979年之後，達賴的親屬大多回來過，渠道一直是暢通的。特別是1989年十世班禪圓寂的時候，經中央批准，佛教協會曾邀請達賴回來參加班禪大師的追悼會。但達賴誤判了形勢，放棄了機會。

去(2003)年，達賴的二哥(嘉樂敦珠)和甲熱洛迪等人回到西藏，其中他二哥是50年來第一次回西藏。我們跟他們說，你們可以到處看一看。我們光明正大，沒有任何需要遮掩的地方。當時，我是拉薩市委書記，請他們在八廓街人最多的時候去看看。危房改造、生態保護和傳統文化等，他們都可以去看。我們對藏胞的態度是明確的，愛國不分先後，回來看一看，談一談，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至於我們同達賴談什麼，主權問題不容談，這是鐵板釘釘的；人權問題，達賴沒有資格談。達賴主政的時候，西藏人權是個什麼樣子，大家都清楚。要談，就談達賴的前途，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Q: 印度總理瓦傑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訪華期間，中印雙方簽訂了一系列合作協議。在西藏自治區有哪些具體措施？

A: 中國和印度都是發展中的大國，兩國的密切關係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當然歷史上雙方也有過一段坎坷。現在我們很高興看到兩國關係向好的方向發展。

西藏自治區跟印度有很長的邊境線，中印關係的改善對兩國、特別是對西藏的發展和穩定有很大好處。西藏希望成為祖國內地面向南亞、特別是印度的通道，目前正在加快開放口岸，修建道路，希望有所作為。

Q: 西藏經濟發展的重點:

A: 西藏發展，突出抓好以下六個重點：

(一)是強化農牧業的基礎地位，發展高原特色農牧業，提高農牧民收入。我們現在通過興辦農區畜牧業、鄉鎮企業，推進農業產業化疏通流通渠道等多種措施，促進農牧業增產、農牧民增收，使老百姓在解決溫飽問題的基礎上過上更加寬裕的日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最大限度地啟動內需、開拓農村市場。

(二)是突出抓好交通、能源、通信和城鄉公共設施建設，務實大開放、大開發、大發展的基礎。「九五」期間，中央為西藏共投入了三百個億，支撐西藏經濟社會的發展，由於投資的主要拉動，西藏 GDP 年均增長達到了 10.7%；「十五」期間，中央的投入將會有較大增加，GDP 增長速度將會達到 12% 上。我區「十五」期間的項目建設，將會有效改變基礎設施落後的狀況，對於拉動全區國民經濟的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增強西藏與內地的聯繫，保持社會穩定，將發揮巨大作用。

(三)是加快實施特色追趕戰略，大力發展旅遊業、藏醫藥業、高原特色生物產業和綠色食(飲)品業、農畜產品加工和民族手工業、礦產業、建築建材業，帶動和促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查。我區將建立藏醫藥、高原綠色食品產業的原料生產基地，採取「公司+農戶」的產業化模式，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吸引區外技術、管理、管銷人才，銜接好原料供應、生產加工、產品研發和市場管銷四個環節，在發展優勢產業上取得新的突破。

(四)是大力實施科教興藏戰略，優先發展教育，開發利用好人才資源和科技資源，以科技創新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西藏經濟社會要在西部大開發中獲得快速發展，關鍵在人才。我們要通過政策導向，使用好現有人才。培養食和引進急需人才，建立科學有效的、有利於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用人機制。

(五)是積極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協調環境、資源和人口發展的關係。重點實施天然林保護工程，加強自然保護區建設與保

護的示範工程；加強對青藏高原資源、環境生態系統的監測和科研力度。國家將加大投入，有力地加強西藏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

(六)是以思路創新和體制創新為先導，打破封閉，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隨中央和自治區制定的擴大西藏對內對開放政策的落實，我區與國內外的經濟文化交流將日益增強，凡到西藏投資的企業也必將得到更大的實惠。以上六個方面，既是我區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十五」期間乃至今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區大開發中最主要的商機。在西藏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社會事業全面進步、政治局勢日益穩定的新形勢下，熱情好客的西藏各族人民將努力營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以使眾多的投資者得到豐厚的回報。

Q: 西藏加快對外技術交流如何?

A: 西藏自治區科委負責人日前接受此間媒體採訪時說，今年以來，西藏自治區已接待來藏考察、學術交流的外國科學家七十多人次，接待內地重點科研院所專家十多批，通過開展科技交流合作以促進西藏的科技進步。

據介紹，去年西藏在科技方面加強了同內地省市和有關國際組織的交流合作力度，並取得進展。西藏與美國新一代基金會合作開展的四江（雅魯藏布江、瀾滄江、怒江、金沙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專案已完成保護規劃的初稿，美方用於規劃的初期投資已到位；爭取國際援助資金 30 萬美元，與德國 PK 公司議定了太陽能設備和技術推廣合作專案。

此外，日本 JICA 計畫與西藏合作開發羊八井深層地熱，日方預計投資一點 5 億日元；與加拿大山地中心達成投資 100 多萬元人民幣建設西藏科研考察資訊網協定。

同時，西藏與各省市的交流日益廣泛，科技援藏工作得到深化。以廣東、四川、北京等省市為代表的智力援藏，為西藏培養了一批科技管理幹部；以廣州、上海、江蘇、北京、山東等省市為代表的技術、物質、資金援藏工作力度逐年加大，有力地促進了西藏科技事業的發展。

日喀則地區從上海市爭取科技援藏資金達 380 萬元人民幣。科技援藏專案——江孜人工防雹自動監測系統建成投入使用後，有效地防止了雹災帶來的損失。林芝地區積極爭取廣東、福建兩省的援助，建成地區科技培訓中心，已培養科技人員二百多人。湖南援助山南地區太陽能灶一萬台，緩解了當地薪柴砍伐與生態保護的矛盾。

